

國際問題研究

2023年第4期（总第216期） 双月刊 2023年7月15日出版

■ 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

- 1 全球安全倡议对全球人权治理的启迪及意义 刘 卿
- 17 全球文明倡议的核心要义与推进路径 吴志成

■ 国际政治

- 36 权利政治：国际政治的现代性转化 徐 坚
- 64 “全球南方”崛起与世界格局演变 徐秀军 沈 陈
- 79 新一代通用人工智能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探究 余南平

■ 区域与国别

- 97 拜登经济民族主义：形态、根源及影响 刘飞涛
- 120 乌克兰危机下美西方与俄罗斯的舆论战及其启示 林斯娴

Table of Contents

Implications of the Global Security Initiative for Human Rights Governance

LIU Qing

Core Elements and Approaches of the Global Civilization Initiative

WU Zhicheng

Politics of Rights: Trans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with Modernity

XU Jian

The Rise of the Global South and the Evolution of World Structure

XU Xiujun & SHEN Chen

Impact of the New Generation 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YU Nanping

Forms, Roots and Implications of Biden's Economic Nationalism

LIU Feitao

The Battle for Public Opinion on the Ukraine Crisis and Its Implications

LIN Sixian

Abstracts

全球安全倡议对全球人权治理的 启迪及意义

□ 刘 卿

〔提 要〕全球安全倡议是新时代中国关于全球安全治理的核心理念，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安全领域的具体体现。全球安全倡议贯通了人的安全、国家安全和全球安全三个层面的安全关系，强调安全的重点不仅包括国家安全，还包括个人和集体意义上的人民福祉。它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安全，并向更广泛的非传统安全和发展领域延伸，成为多层面的安全概念。全球安全倡议与联合国宗旨和原则一致，致力于解决国际冲突的根源，认为只有坚持共同、综合、可持续的安全观，消除不平等，才能实现持久的和平与繁荣。中国秉持安全共同体理念，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倡导国际社会协力应对各种传统和非传统安全挑战，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关键词〕习近平外交思想、全球安全倡议、全球人权治理

〔作者简介〕刘卿，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D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2 8832 (2023) 4 期 0001-16

安全问题事关各国人民的福祉，没有安全就没有基本人权。实现世界持久和平，让每一个国家享有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让每一个国家的人民都能

安居乐业，人民权利得到充分保障，是我们的共同愿望。^[1] 全球安全倡议系统阐释了中国促进世界安危与共、维护世界和平安宁的立场主张，强调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对促进和保障人权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为丰富全球人权治理路径和方法提供了中国智慧。

一、人权与安全密不可分

生命权和生存权是最基本的人权，安全是人权的基础和保障。全球安全倡议深刻思考当前世界面临的突出安全问题，回应全人类共同安全关切，凸显立足人类整体利益、应对人类共同挑战、实现人类共同安全的天下情怀。

（一）安全的目的在于守护人权

安全是人类最基本的需求，安全的目的在于守护人权。没有和平稳定，人权无从谈起。生活在免于匮乏与恐惧、普遍安全和持久和平的环境中，是全世界各个国家和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世界人权宣言》第三条明确指出：“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2] 《联合国宪章》序言开宗明义写道：“我联合国人民同兹决心：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重申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与大小各国平等权利之信念；创造适当环境，俾克维持正义，尊重由条约与国际法其他渊源而起之义务，久而弗懈；促成大自由中之社会进步及较善之民生。并为达此目的：力行容恕，彼此以善邻之道，和睦相处；集中力量，以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接受原则，确立方法，以保证非为公共利益，不得使用武力；运用国际机构，以促成全球人民经济及社会之进展。”^[3]

《联合国宪章》规定联合国三大使命：实现国际和平与安全、经济和社

[1] 《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外交部网站，2023年2月21日，http://newyork.fmprc.gov.cn/web/wjbxw_new/202302/t20230221_11028322.shtml。

[2] 《世界人权宣言》，联合国网站，https://www.ohchr.org/sites/default/files/UDHR/Documents/UDHR_Translations/chn.pdf。

[3] 《联合国宪章》，联合国网站，<https://www.un.org/zh/about-us/un-charter/full-text>。

会进步与发展、尊重人权。其中，实现和平与安全是基本前提，经济和社会进步与发展是根本要求，尊重人权是最终落脚点。联合国将促进和保护人权确定为其工作的重要目标，而人身安全以及和平与安全的权利是人权的核心组成部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于1994年在《人类发展报告》中最先提出并界定了“人的安全”：“人的安全包括两大方面。其一是免受诸如饥饿、疾病和压迫等长期性的安全；其二是在家庭、工作或社区等日常生活中对突如其来的、伤害性的骚扰的保护。”^[1] 鉴此，联合国通过相关人权决议，将和平权宣布为重要人权原则之一，与发展权、平等和不受歧视原则、公正审判权、平等参加公务和选举的权利以及各项自由权利并提。联合国还专门就和平权所涉及的特定主体权利规定了人权保护的重要内容，如对武装冲突中的儿童、难民和失所人民，同时，将和平权的实现条件和方式规定为保障人权的重要举措，如打击恐怖主义、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和民主秩序等。

（二）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类是一个相互依赖的整体。人的安全、国家安全、全球安全相互关联，紧密联系。人的安全是核心，国家安全是前提，全球安全是基础。保障人权离不开国家安全，没有国家安全就难以实现集体人权，也就难以保障个体人权。实现共同安全、普遍安全既是集体人权的本质要求，更是对个体人权的保证。早在《世界人权宣言》起草过程中，中国代表张彭春作为起草委员会的副主席，就提出要在宣言中体现中国文化中“仁者爱人”的理念，主张在宣言第一条保留“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表述，呼吁人们相互宽容、彼此尊重，以手足情谊的精神和平相处，充分体现了通过推进集体人权来实现个体人权的价值观念。^[2]

人的安全、国家安全、全球安全是不可分割的。人的安全寓于国家安全

[1] 张洪波：《作为人权的安全权：比较、内涵及规律》，《南京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

[2] 常健：《为什么发展人权必须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中国新闻网，2023年2月16日，<https://www.chinanews.com.cn/gn/2023/02-16/9954916.shtml>。

之中。每个国家的安全又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任何国家都不可能超脱于世界整体而拥有绝对的安全，更不能将自身安全建立在他国不安全的基础之上，只有实现共同安全才能确保持久的安全。“安全不可分割”已被普遍认为是国际社会一项重要原则。欧安组织和北约—俄罗斯理事会明确“安全不可分割”原则，声明各国以国家身份参加欧安组织，承诺不以牺牲他国安全为代价强化自身安全。这一原则已载入1975年《赫尔辛基最后文件》、1990年《新欧洲巴黎宪章》、1997年《北约—俄罗斯基本协定》、1999年《欧洲安全宪章》等重要文件。^[1]安全一旦被分割，安全平衡就会被打破，国家间关系出现信任危机，将冲击集体人权，从而影响个人人权。

（三）中国积极促进人人享有和平权利

和平基因源于中华传统文化。无论是孔子的“以和为贵”，还是孙子兵法的慎战，都是和平思想的经典表达。联合国大厦悬挂的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名言，被标定为国家之间处理相互关系的黄金法则，也彰显了这一思想的普世性和国际意义。1954年，中国与印度、缅甸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5年，在中国推动下，万隆会议通过《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提出和平共处十项原则，将“尊重基本人权”列为第一条。70多年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走出亚洲走向世界，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准则，也为国际人权治理提供了重要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以来，积极促进在联合国人权文件中反映和平价值观。中国参与《和平权利宣言》的制定工作，支持联合国大会通过有关“促进和平作为人人充分享受所有人权的必要条件”“人民享有和平权利”“采取具体行动彻底消除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不容忍行为”“在反恐中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等一系列人权决议。^[2]当前国际安全形势严峻，局部战争、武装冲突、集团政治仍在发酵，战争与和平问题

[1] 《2022年4月25日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主持例行记者会》，外交部网站，2022年4月25日，https://www.fmprc.gov.cn/fyrbt_673021/jzhsl_673025/202204/t20220425_10673513.shtml。

[2] 常健：《为什么发展人权必须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

再次成为国际舆论的焦点，人类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全球人权治理面临严峻挑战，危机、冲突、动荡等不安全因素不仅妨碍各项人权的实现，而且破坏当前的人权状况，甚至造成各类情形的人权危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出席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4次会议时表示：“我们越来越看到，民粹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反常现象与种族主义、仇外心理……许多人因战争而逃难，国际社会不能逃避其责任。”^[1]

在此背景下，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强调“和平是人民的永恒期望，犹如空气和阳光”，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2]并明确提出“推动形成更加公正、合理、包容的全球人权治理，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创世界美好未来”，^[3]回应了国际社会维护世界和平、防止冲突战争的迫切需要，为消弭国际冲突根源、促进人人享有和平权力提供了中国方案。

二、保障人权是全球安全倡议应有之义

全球安全倡议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全球安全治理中的具体化，是全球人权治理的重要抓手。习近平主席指出：“以安全守护人权，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同走和平发展道路，践行全球安全倡议，为实现人权创造安宁的环境。”^[4]全球安全倡议彰显了以人为本的安全观，将极大地推动全球人权治理体系朝着公正合理方向发展，是中国向世界提供破解全球人权治理

[1]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4次会议在日内瓦开幕》，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网站，2017年2月28日，<https://news.cri.cn/uc-eco/20170228/224279b6-c039-c4c9-8bd0-4cbdd1d32282.html>。

[2] 《习近平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司法部网站，2023年6月14日，http://www.moj.gov.cn/gwxw/ttxw/202306/t20230614_480724.html。

[3] 《习近平总书记谈全人类共同价值》，求是网，2021年8月23日，http://www.qstheory.cn/zhuanku/2021-08/23/c_1127786124.htm。

[4] 《习近平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

困境的安全公共产品。

（一）国家主权原则是国际人权保护制度的基础

联合国宪章将尊重人权列为三大宗旨之一的同时，还明确规定联合国及其成员国在实现其宗旨时应遵循一系列国际法原则，其中首要原则就是国家主权平等，以及由这一原则引申出来的不干涉别国内政原则等。

全球安全倡议明确指出，坚持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是基本前提，强调了国家主权对保障国民人权的极端重要性。人的社会属性决定人权保障的集体属性。没有抽象的人权，只有具体的人权，即公民权。而公民权是国家赋予的，没有国家的安全，公民权也就难以实现。主权国家作为国际体系的基本单元，是人权保障和发展的首要责任者。国家通过立法形式保障本国公民权利，保护公民免受暴力侵害，推动实现个人、社会发展。国家主权遭践踏的人民难有基本的人权保障，这已经被无数的历史和现实所证明。如果世界陷入动荡不安、地区战乱频发、人民颠沛流离，人权就失去了基本的保护，遑论自由、公正和发展。因此，全球安全倡议将“坚持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置于首要位置。

坚决反对以人权为由侵犯他国主权，损害他国人民的人权。社会存在具有多样性和差异性，人权状况也同样如此。人权植根于各种不同文明之中，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历史文化，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人权的内涵亦各具特色，不可能强求一致。世界各国人民有权自主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人权问题不应该成为破坏地区安全的工具，不应该成为单边主义、霸权主义联合博弈下的牺牲品与政治武器。任何国家都不应将自己的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强加于他国，更不能通过暴力威胁或武力侵略达成一己之私。西方提出“人权高于主权论”，是对人权本义的篡改。个别国家假借“保护责任”之名，肆意干涉别国内政，使当地人权遭到系统性破坏，甚至造成严重的人道危机，伊拉克、阿富汗、叙利亚等国家的遭遇即是如此。

发展人权是全人类共同的事业。人权保障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各国都有权利自主选择人权发展道路，不同文明、不同国家应该相互尊重、相互包容、

相互交流、相互借鉴。^[1]任何国家都没有资格当人权“判官”，人权不能成为干涉别国内政、遏制别国发展的借口。

（二）统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改善全球人权治理

全球安全倡议坚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协调推进安全治理。当前，安全的内涵和外延更加丰富，呈现突出的联动性、跨国性、多样性特点，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人权保障面临严峻的挑战。

具体来说，当前人权保障面临两方面的安全威胁。第一，军事对抗、局部战争、武装冲突等传统安全威胁严重影响人的基本生存权和发展权。联合国难民署《2021 全球趋势报告》显示，因冲突或迫害而逃离本国的难民、难民申请者和流离失所者等总人数突破 1 亿。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调查数据显示，截至 2021 年底，因冲突、暴力和其他危机而流离失所的儿童人数达到 3650 万，创二战以来新高。有数据显示，美国在“9·11”事件后发动战争所制造的难民数量在 4900 万至 6000 万之间。其中，仅阿富汗就有 1100 万人沦为难民。^[2]美国布朗大学沃森国际和公共事务研究所“战争代价”研究报告显示，“9·11”事件后，美国先后拘禁数十万人，仅在伊拉克就关押超过 10 万人。^[3]第二，气候变化、环境恶化、能源危机、流行性疾病、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威胁严重影响人类福祉，甚至引发人道主义危机。联合国难民署指出，受气候变化和气候灾害影响，每年有超过 2000 万人被迫在境内迁移或跨境避难。世界银行 2021 年 9 月发布报告预测称，2050 年前，气候变化将造成约 2.16 亿人

[1] 《习近平：发展人权是全人类共同的事业》，求是网，2022 年 11 月 10 日，http://www.qstheory.cn/2022-11/10/c_1129116647.htm。

[2] 《2022 年 6 月 20 日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主持例行记者会》，外交部网站，2022 年 6 月 20 日，https://www.fmprc.gov.cn/web/fyrbt_673021/jzhsl_673025/202206/t20220620_10706553.shtml。

[3] 《把反恐做成“生意”——起底美国海外“黑狱”践踏人权》，搜狐网，2023 年 7 月 6 日，https://www.sohu.com/a/695131691_99910418?scm=1019.20001.0.0.0&spm=smprc.csrpage.news-list.1.1690796611874O6qRyqO。

在其本国境内迁移。^[1]

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紧密联系、相互渗透、共同作用，使人权保障问题越发复杂。全球范围内与人权密切相关的治理问题增多，如战争与人权、反恐与人权、气候与人权、环境与人权等，这些问题不断向国际政治领域扩散，形成复合性的安全问题，影响全球和平与发展。全球安全倡议倡导各国在国际安全领域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共同应对地区争端和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生物安全等全球性问题，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度，加强全球安全治理，防范化解安全困境，改善人类安全环境，共同维护国际生态安全、网络安全、生物安全等，减轻其对社会生产生活与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危害，以更好地保障人权。^[2]

（三）强调安全与发展是维护和保障人权的一体两面

全球安全倡议认为，安全与发展相辅相成、密不可分。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发展和安全是维护人权的一体两面，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战争和暴力无疑将导致发展受挫，没有安全就没有发展。粮食危机、极度贫困等是导致地区动乱、冲突的主要原因。同样，没有发展也难以确保安全。而没有安全和发展，人权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1986年《发展权利宣言》将发展定义为“不可剥夺的人权，由于这种权利，每个人和每个民族都有权参与促进和受益于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发展，在这种发展中，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都可以充分实现”。^[3]1994年《人类发展报告》对什么是安全做出了新的定义：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世界不再有冲突当然是和平的绝对基础，但还不足以实现安全。该报告认为，人们不仅在他们的人身安全没有受到威胁时感到安全，在他们能够确信有足够的食物、医疗服务以及

[1] 林子涵：《极端天气频发 “气候难民”激增》，《人民日报》（海外版）2022年4月28日。

[2] 陈向阳：《全球安全倡议促进全球人权治理》，中国网，2023年6月15日，http://www.china.com.cn/opinion2020/2023-06/15/content_87564678.shtml。

[3] 《发展权利宣言》，联合国网站，<https://www.un.org/zh/documents/treaty/A-RES-41-128>。

有遮风避雨的房子时也感到安全。不仅免于恐惧，当然还要免于匮乏。^[1]

当前，世界处在一个技术突飞猛进、经济日益相互依存、全球化及地缘政治巨变的时代，安全、发展和人权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相互影响，共同作用，越来越成为新型国际治理体系和联合国安全议程的关键议题。人权与安全环境、资源可持续发展问题日益紧密。一些国家因内战陷入四分五裂，国力耗尽，发展停滞，民不聊生，艾滋病、吸毒等问题蔓延。一些国家面临资源匮乏、失业率高企、贫富差距拉大等发展危机，导致极端思潮产生，诱发内乱，地区冲突，引发人道危机。目前，全球仍有几十个国家陷于极度贫困，严重的经济危机使几百万家庭陷入贫穷，人民陷入生存危机。联合国发布的《2022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显示，2020年全球陷入极端贫困的人口新增9300万人，四年多的减贫进展化为乌有。该报告指出，气候危机、COVID-19大流行和世界各地冲突增加，使得联合国17项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实现处于危险状态。这些相互叠加和交织的危机对人类的食物和营养、卫生、教育、环境以及和平与安全状况产生了连带影响。^[2]

世界各国聚焦发展、减少贫困将大大降低局部战争、武装冲突的爆发，使更多的资金和资源得以用于改善和发展人权，进而提高共同应对流行传染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挑战的能力。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已完全消除了极端贫困，8亿多人摆脱了贫困，4亿多人迈入中等收入群体，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迹，对全球人权治理具有深远意义。中国人民的安全权、生命权得到充分保障，民众的安全感十年来持续保持高位，安全感指数由2012年的87.55%上升到2021年的98.62%。英国基金会发布2023年全球安全感指数，中国的安全感知指数排名在前十。^[3]

全球安全倡议强调安全与发展互为关联，将其作为促进和保障人权的一

[1] 刘志军、刘民权：《人类安全：概念与内涵》，《国际观察》2006年第1期。

[2] 《2022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搜狐网，2023年3月5日，https://roll.sohu.com/a/649080727_121649899。

[3] 《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开幕》，人权网，2023年6月19日，<https://www.humanrights.cn/html/zt2023/2/14/2023/0619/71033.html>。

体两面，主张发展和安全并行推进。同时，强调每个国家的发展和安政策不仅要考虑本国公民的需要，而且要考虑其他国家公民的关切。只有共同发展、共同安全才能确保公正的人权。全球安全倡议将安全的内涵从关注安全事务本身向经济社会等发展领域延伸，体现了人权保障意义的厚度和深度。

三、重点合作方向体现以保障人权为基本方针

《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以下简称《概念文件》）强调，中国将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根本遵循，在全球安全倡议框架下开展与世界各国和国际、地区组织的双多边安全合作，积极推进安全理念对接和利益共融。《概念文件》所涵盖全球安全治理的重点合作方向，体现了以保障人权为基本方针。

（一）强调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是唯一有效途径

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是《联合国宪章》的重要原则，是国际人权保护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联合国宪章》第一条明确规定：“要以和平方式且以正义及其国际法的原则，来调整 and 解决足以破坏和平的国际争端和情势。”针对地区热点，应该通过和谈方式缓和紧张、化解争端，反对拱火浇油、趁火打劫，反对滥用制裁、动辄施压。全球安全倡议强调：“战争和制裁不是解决争端的根本之道，对话协商才是化解分歧的有效途径。”《概念文件》倡议从两个方面促进和平解决国际争端。

一是铸剑为犁，主张彻底销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反对使用和扩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概念文件》坚决维护“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共识，敦促遵守五核国领导人发表的《关于防止核战争与避免军备竞赛的联合声明》，加强核武器国家对话合作，降低核战争风险。维护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为基石的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在联合国安理会防扩散委员会、《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等框架下开展合作，推动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概念文件》同时强调，支持全球常规武器军控进程，支持落实“消弭非洲枪声”倡议。积极开展人道主义扫雷国际合作及援助，

为相关国家提供更多力所能及的帮助。

二是和平谈判，通过政治途径解决热点问题。战争只会造成更多的人员伤亡，加深民族仇恨，解决不了旧问题，还将产生新的不可预知的问题。只有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进行和平谈判，才能将生命和财产损失降至最低。《概念文件》鼓励当事国通过坦诚对话沟通化解分歧，寻求热点问题的解决之道；支持国际社会在不干涉内政前提下，以劝和促谈为主要方式，以公平务实为主要态度，以标本兼治为主要思路，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的政治解决。《概念文件》支持通过对话谈判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等热点问题，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反对双重标准，反对滥用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

（二）坚定支持联合国在全球安全治理中的核心作用

联合国作为二战后成立的最重要政府间国际组织，在维护和平与安全方面被赋予特殊责任和权力。两次世界大战带给世人的惨痛记忆，催生了这一全球性的安全机制。《联合国宪章》规定，安理会对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负有首要责任，应断定任何和平之威胁、和平之破坏或侵略行为是否存在。随着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增多，安理会做出“和平之威胁”的决议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国际关注，尤其体现在其对严重侵犯人权事件的回应。^[1]

冷战结束以来，一些大国奉行霸权思维，无视联合国宗旨与原则，绕开安理会，武装入侵他国，造成一系列人道问题；为一己之私，退出联合国相关机制，大行单边主义，严重损害联合国权威；纠集同盟国抹黑他人权，籍此实施“长臂管辖”，打压他国。面对当前国际安全形势新变化，《概念文件》强调联合国在全球安全治理的权威性、不可替代性，呼吁各国坚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摒弃冷战思维，反对单边主义，不搞集团政治和阵营对抗，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维护联合国权威。

《概念文件》强调要支持联合国在全球安全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积极参与联合国秘书长“我们的共同议程”报告关于制定“新和平纲领”等建议

[1] 张国斌：《论人权因素之于安理会断定“对和平之威胁”的影响》，《法治与社会》2013年第23期。

的工作；支持联合国加大预防冲突努力，充分发挥建设和平架构的作用，帮助冲突后国家开展建设和平工作；支持联合国提高维和行动履行授权能力，坚持当事方同意、保持中立、非自卫或履行授权不使用武力的维和行动三原则。

（三）主张综合治理是解决全球安全问题的长远之道

针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安全形势，《概念文件》强调要多管齐下、综合施策、标本兼治。

一是维护人类基本生存环境安全。支持各国在气候变化、供应链产业链稳定畅通等领域合作，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以可持续发展促进可持续安全；维护全球粮食安全，避免将粮食安全问题政治化、武器化；强调能源安全，共同维护全球能源市场和能源价格稳定；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中发挥领导作用，共同应对包括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在内的全球性重大传染病；加强生物安全风险管控，共同倡导负责任的生物科研，降低生物安全风险。

二是确保有序的社会安全环境。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共同打击所有安理会列入的恐怖组织和人员，反对将恐怖主义与特定国家、民族和宗教挂钩；打击跨国犯罪行为，全面、有效落实《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携手打击海盗、武装抢劫等海上跨国犯罪；共同应对毒品问题，维护国际禁毒体制，构建不受毒品危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三是防范新兴领域的不确定风险。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领域国际安全治理，预防和管控潜在安全风险；坚决反对外空武器化和军备竞赛，支持谈判缔结外空军控国际法律文书；共同应对各类网络威胁，构建开放包容、公平合理、安全稳定、富有生机活力的全球网络空间治理体系。

四、践行全球安全治理，促进和保护人权

全球安全倡议直面当前世界多重安全挑战，呼吁国际社会携手消弭国际冲突根源，完善全球安全治理，促进全球发展繁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中国积极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坚决捍卫联合国权威，积极开展斡旋外交，推进安全合作与对话，携手国际社会共同促进和保护人权。

（一）维护联合国权威，发展和保护国际人权

中国是联合国最早的创始成员国之一，也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一直是联合国人权事业的坚定支持者和积极参与者。2006年5月，中国当选人权理事会首届成员，此后又多次当选。中国积极配合和参与人权理事会普遍定期审议机制，履行国际人权条约缔约国义务。中国提出的推动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国际社会引起热烈反响，多次被写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联合国安理会等机构的决议，为推动国际人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蓝盔”成为联合国维护和平的关键力量。1990年，中国向联合国派出军事观察员，拉开了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帷幕。1992年，中国派出首支成建制“蓝盔部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30多年来，中国军队已派出官兵5万余人次，赴2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加维和行动，先后有27名维和人员献出宝贵生命。目前，中国是联合国第二大维和摊款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第一大出兵国，共有2200多名中国官兵在8个维和任务区执行任务。中国维和官兵恪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守护世界和平与安宁。^[1]

（二）开展斡旋外交，推动政治解决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

中国积极开展斡旋外交，为推动相关热点问题的政治解决不懈努力。中国发布《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对缓解乌克兰人道主义局势提出六点倡议。中国派欧亚事务特使积极斡旋，就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同各方深入沟通。中国发布《关于阿富汗问题的中国立场》文件，搭建阿富汗邻国外长会议，敦促塔利班政府履行改善人权尤其是妇女权益的承诺。

中方用实际行动向世界表明“支持中东国家通过对话协商推动热点问题

[1] 《2023年5月30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外交部网站，2023年5月30日，https://www.mfa.gov.cn/web/fyrbt_673021/jzhsl_673025/202305/t20230530_11085939.shtml。

的政治解决”这一承诺。2023年3月，中国促成沙特和伊朗签订和解协定，助力恢复外交关系。沙伊复交明显推动了中东国家之间关系的缓和潮流。更多的国家选择与伊朗、叙利亚缓和关系，叙利亚领导人访问阿联酋，土耳其和埃及表示和解等，这些密集的和解进程可谓是沙伊复交的“和平红利”。“中东大和解”是全球安全倡议的一次生动实践，为推动相关国家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历史恩怨、实现睦邻友好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创新国际协调合作机制。近一年来，中国与印尼、巴基斯坦等国签署了《关于建立国际调解院的联合声明》，决定以条约为基础、由各方共同协商建立国际调解院。2023年7月成立国际调解院筹备办公室，相关国家开始就建立国际调解院的国际公约等事项组织开展政府间谈判。国际调解院的建立将打造更加开放包容、公平普惠的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新平台。

（三）推进安全对话，守护世界和平与安宁

中国致力于“促进大国协调和良性互动”，“推动构建和平共处、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格局”。2022年1月，中、俄、美、英、法五个核大国领导人共同发表《关于防止核战争与避免军备竞赛的联合声明》，将避免核武器国家间爆发战争和减少战略风险作为核大国的首要责任。中俄建立战略安全磋商机制，为完善全球安全治理作出共同努力。中美举行高级别安全对话会，促进中美关系企稳。

中国积极推动地区安全对话。中国提出“非洲之角和平发展构想”，推动非洲地区国家举办首届“中国—非洲之角”和平会议；提出中东安全稳定五点倡议、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四点主张、落实巴以“两国方案”三点思路等方案，积极参与中东安全治理。中国反对无视地区国家意愿强施单边制裁、强推政权更迭、强加所谓“解决方案”、强迫地区国家选边站队。中国成功主办两届中东安全论坛，就国际社会共同推动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提出建议。此外，中国还在上海合作组织、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东亚合作各机制等多边平台，积极推动各方开展安全领域交流合作，汇聚国际社会应对安全挑战的共识与合力。

（四）坚持以人为本，全面促进和保障国际人权

中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权理念，始终把生存权和发展权作为首要基本人权，以发展促安全，以安全保发展，全面促进和保障国际人权。

中国致力于同世界各国一道，携手推进国际减贫进程。习近平主席指出：“消除贫困，自古以来就是人类梦寐以求的理想，是各国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的基本权利”，“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减贫交流合作关系，是消除贫困的重要保障”。中国秉持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原则，建设性参与饥饿、难民、疾病、冲突等问题的解决。设立“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和“全球发展—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全面落实中方在南南合作圆桌会上宣布的“100个减贫项目”。中国不断深化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同共建“一带一路”对接，打造减贫和发展新引擎。世界银行报告指出，共建“一带一路”将使相关国家760万人摆脱极端贫困，3200万人摆脱中度贫困，为国际减贫事业提供强大动能。^[1]

中国扩大紧急人道主义援助规模和范围。2018年至2022年，中国共开展822项对外紧急人道主义援助，总金额约152亿元人民币。援助对象以亚洲和非洲面临较高人道主义风险的发展中国家为主，还包括拉丁美洲、南太平洋和欧洲等地区。中国企业、社会组织等主体越来越积极地参与到对外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尤其是在针对自然灾害的援助中，成为官方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的有力补充。例如，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在28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了国际人道主义和发展援助项目，总投入超过3.6亿元，惠及约195万人口。^[2]2020年底以来，中国助力全球抗击新冠疫情，开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援助时间最长、涉及范围最广的紧急人道主义救援行动。三年多来，中国向全球151个国家和13个国际组织提供检测试剂、防护服、口罩等抗疫物资数千亿件，累计发

[1] 《合力建设远离贫困、共同发展的美好世界》，《人民日报》2020年12月19日，第3版。

[2] 《国际发展合作的中国实践》，国际发展合作署网站，2023年5月18日，http://www.cidca.gov.cn/2023-05/18/c_1212189005.htm。

运物资 5246 吨。^[1]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中国向乌方提供了多批次人道主义物资援助，支持乌克兰人民渡过难关。

五、结语

全球安全倡议是破解全球安全困境的重大理论创新，既为推进全球安全治理和应对地区热点指明方向，也为保障和发展人权、促进全球人权治理注入了新内涵，提供了新思路。全球安全倡议融通了人的安全、国家安全和全球安全三个层次的安全关系。保障人权是国家安全和全球安全的目的，不受外部干涉的国家主权是维护各国人权的前提，全球安全治理保障全球人权治理。全球安全倡议倡导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强调致力于普遍安全、统筹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通过对话合作实现安全、统筹发展和安全。这一安全观是缓解全球安全赤字、共同应对安全挑战、摆脱安全困境的治本之策，也是促进世界和平、地区稳定与人权事业的解决之道。全球安全倡议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安全方略，也为破解全球人权治理困境提供了重要指引。

【责任编辑：李静】

[1] 周太东、余璐：《中国式国际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在发展中化解危机》，中国日报网，2023 年 6 月 1 日，<https://cnapp.chinadaily.com.cn/a/202306/01/AP64794a0fa31054839e1a448a.html>。

全球文明倡议的核心要义与推进路径

□ 吴志成

〔提 要〕历史发展表明，包容共存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主旋律，交流互鉴是一切优秀文明保持创新活力的重要途径。随着百年大变局的加速演进与全球化进程的深刻调整，不同文明的交汇、碰撞甚至冲突更加频繁，全球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日趋激烈。面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性选择，中国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倡导坚持平等、互鉴、对话、包容原则维护人类文明多样性，坚持以全人类共同价值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知，坚持通过传承和创新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坚持以国际人文交流合作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充分彰显了中国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为促进全球文明治理、推动人类文明进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中国智慧和力量。

〔关键词〕全球文明倡议、文明多样性、全人类共同价值、全球文明治理

〔作者简介〕吴志成，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中图分类号〕D820；K1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2 8832（2023）4 期 0017-19

当今世界，百年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多极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全球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加剧，不同文明的交汇、碰撞甚至冲突日趋频繁。站在人类历史的十字路口，是唯我独尊还是平等互鉴，是隔阂冲突还是对话包容，成为人类文明发展面临的历史性选择。对此，习近平总书记郑重提出

全球文明倡议，强调在各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的今天，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在推动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繁荣世界文明百花园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1] 习近平总书记以四个“共同倡导”阐释全球文明倡议的核心要义，呼吁各国政党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共同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推进世界现代化进程、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了中国智慧。全球文明倡议是对“人类文明向何处去”“不同文明怎样交往”等关乎人类文明前途命运重大问题的深刻回答，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文明领域的重大创新发展，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也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的责任担当，成为促进新型全球文明建设、加强全球文明治理的行动指南。

一、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

文明多样性是当今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重要源泉。伴随着全球化与现代化进程的深化，不同主体参与全球交往网络的不对称性和获取影响的不平衡性加剧，^[2] 使得多元文明的自身特色逐渐褪色，不同文明被西方定义的现代性及其普遍标准划归为不同层级，世界文明的同一化和西方化成为文明等级格局的逻辑延伸。这一基于西方中心的文明等级观既无视文明多样性的客观现实，也不理解多元文明的价值意义，更无法为人类文明进步提供正确指引。在全球化深刻调整与百年大变局交织叠加的时代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倡导坚持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为尊重多元文明发展的客观性，释放多元文明发展潜力，维护文明多样性提供了方向指引。

[1] 《习近平出席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并发表主旨讲话》，《人民日报》2023年3月16日，第1版。

[2] 戴维·赫尔德等：《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杨雪冬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译序第11-12页。

（一）尊重世界文明差异性的客观现实

在历史发展的漫长进程中，处于不同地理和人文环境中的多元主体创造了极具自身特色和标识的多彩文明，共同构成绚丽丰富的人类文明百花园。无论是从多元文明存在发展的逻辑，还是全球化时代人类文明共存共生的趋势看，人类文明多元并存都将长期存在，正视与尊重文明差异性的客观现实也是维护世界文明多样性的前提与基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没有多样性，就没有人类文明。多样性是客观现实，将长期存在。”^[1]

第一，文明都有其生成存在的深厚底蕴。“每一种文明都扎根于自己的生存土壤，凝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非凡智慧和精神追求，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2]无论是起源于黄河流域、两河流域的农耕文明，还是萌生于地中海的海洋文明，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都扎根于本国本民族的土壤之中，必然是同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和价值观念深度融合在一起，因而都有自己的本色、长处、优点。不同文明反过来塑造了特定群体的思维方式和文化理念，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演进起到重要的引领推动作用。因此，多元文明都有其自身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都是人类文明百花园中不可或缺的精神瑰宝。

第二，共生并存是历史发展的常态。历史地考察，各国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差异自古就存在，这是人类文明的内在属性。人类社会发展演进的历史就是多元文明共生并进的历史，不同文明多元共生才是普遍状态。无论是中华文明、古希腊文明、古埃及文明和古罗马文明交相辉映的古代历史，还是现代社会由亚洲文明、非洲文明、欧洲文明等构成的世界文明百花园，多元文明共生共存都是人类社会文明演进的常态和历史发展的主旋律。

第三，多元共进是世界文明的发展趋势。共生共进是人类文明历史演进

[1] 习近平：《让多边主义的火炬照亮人类前行之路——在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的特别致辞》，《人民日报》2021年1月26日，第2版。

[2] 习近平：《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9年5月16日，第2版。

的重要特征，也是世界文明存在的客观现实和未来发展的重要趋势。“不同历史和国情，不同民族和习俗，孕育了不同文明，使世界更加丰富多彩。”^[1]人类共同居住在同一个星球上，这个星球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500多个民族、80亿人口，搞清一色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以智能化和数字化为特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为全球多元行为体普遍赋能，从整体上缩小了不同文明之间的发展差距。那种企图建立一统天下的单一文明的愿望与企图，越来越成为一种不切实际的迷思和四处碰壁的幻想，多样性而非同一性、多元化而非同质化愈加成为世界文明发展的客观趋势。

（二）理解人类文明多样性的价值意义

在人类社会荣损共担的全球化时代，应对全球性风险挑战尤其需要正确理解人类文明多样性的价值意义，充分汲取多元文明对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智慧和力量。

第一，多样性是人类文明的魅力所在。“人类文明多样性赋予这个世界姹紫嫣红的色彩，多样带来交流，交流孕育融合，融合产生进步。”^[2]世界上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文明，也不存在一无是处的文明，文明之间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只有特色、地域之别。从茹毛饮血到田园农耕，从工业革命到信息社会，不论是农业文明还是工业文明，不论是东方文明还是西方文明，都是人类文明图谱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都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不同国家、地区、民族，不同历史、宗教、习俗，彼此交相辉映、相因相生，共同擘画出这个精彩纷呈的世界。”^[3]

第二，多样性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文明存在差异是客观现实，但差异不应该成为世界冲突的根源。不同文明要相互尊重、和谐共处、共同进步，文明交流互鉴应该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成为推动人类社会

[1] 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人民日报》2017年1月20日，第2版。

[2] 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9月29日，第2版。

[3] 习近平：《携手努力共谱合作新篇章——在金砖国家领导人巴西利亚会晤公开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9年11月15日，第2版。

进步的动力，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无论是四大发明全球传播带来的历史变局，还是玄奘等人西行取经推动的文化融合，历史都不断证明：不同文明、制度、道路的多样性及交流互鉴可以为人类社会进步提供强大动力。“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化解人类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需要依靠物质的手段攻坚克难，也需要依靠精神的力量诚意正心。”^[1]

第三，多样文明是世界发展的深层指引。不同文明是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探索中开拓和发展的丰厚积累，也是当前及未来时期世界各国发展的深层指引。随着当今世界多元主体间相互依赖共生特征不断强化，应对世界性危机和普遍性挑战，不仅需要经济科技等物质性力量，更需要文化文明和精神价值的指引。文明多样性既是人类文明图谱更加绚丽的重要基础，也是推动多元文明前进发展的精神指引。“世界万物万事总是千差万别、异彩纷呈的，如果万物万事都清一色了，事物的发展、世界的进步也就停止了。”^[2]

（三）维护人类文明多样性的基本原则

尊重人类文明多样性客观现实，正确理解文明多样性价值，必须坚持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基本原则。

第一，强调文明平等。平等是维护人类文明多样性的基础和前提。不同文明从来都是平等的，世界上没有哪种文明天生具有主宰其他文明的权力。“人类只有肤色语言之别，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认为自己的人种和文明高人一等，执意改造甚至取代其他文明，在认识上是愚蠢的，在做法上是灾难性的！”^[3]多元文明间的互动相处应建立在相互尊重、求同存异的基础上，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提供指引。具体来说，坚持文明平等观就是要理性处理本国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差异，认识到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都是独特的，坚持求同存异、取长补短，不攻击、不贬损其他文明。

[1] 《习近平复信希腊学者》，《人民日报》2023年2月21日，第1版。

[2] 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25日，第2版。

[3] 习近平：《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

“差异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傲慢、偏见、仇视，可怕的是想把人类文明分为三六九等，可怕的是把自己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强加给他人。”^[1]

第二，倡导文明互鉴。文明的传承延续与发展创新都需要交流互鉴。维护文明多样性，就要加强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借鉴，而不应该相互隔膜、相互排斥、相互取代。各国都应该以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秉持兼收并蓄心态，通过交流互鉴，在思想观念上摒弃傲慢和偏见，共同消除现实中的文化壁垒，共同抵制妨碍心灵互动的错误观念，共同打破阻碍人类交往的精神隔阂，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要促进不同文明不同发展模式交流对话，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交流互鉴中共同发展，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2]

第三，坚持文明对话。对话是缓和与化解不同文明之间矛盾和冲突，进而推动人类文明前进发展的理性路径。任何一种文明，不管它产生于哪个国家、哪个民族的社会土壤之中，都是流动的、开放的。文明对话尤其强调不同文明之间地位的平等，坚持在平等基础上对话沟通，有助于释疑解惑，消减隔阂误解，避免冲突对抗，应该将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明对话”视为应对人类困境最基本最重要的路径选择。^[3]“文明之间要对话，不要排斥；要交流，不要取代。人类历史就是一幅不同文明相互交流、互鉴、融合的宏伟画卷。我们要尊重各种文明，平等相待，互学互鉴，兼收并蓄，推动人类文明实现创造性发展。”^[4]

第四，促进文明包容。包容是维护人类文明多样性的核心要义。“在21世纪人类文明的大家园中，各国虽然历史、文化、制度各异，但都应该彼此

[1] 习近平：《让多边主义的火炬照亮人类前行之路——在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的特别致辞》。

[2] 习近平：《迈向命运共同体 开创亚洲新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5年3月29日，第2版。

[3] 吴志成、李佳轩：《新时代文明交流互鉴观析论》，《世界经济与政治》2022年第6期，第16页。

[4] 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

和谐相处、平等相待，都应该互尊互鉴、相互学习，摒弃一切傲慢和偏见。唯有如此，各国才能共同发展、共享繁荣。”^[1]尤其是在百年大变局加速演进的动荡变革期，多元文明更应该兼容并包，通过和谐共生、相得益彰共同为人类发展提供精神力量。“我们要尊重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和平共处、和谐共生，不能唯我独尊、贬低其他文明和民族。人类历史告诉我们，企图建立单一文明的一统天下，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我们要倡导交流互鉴，注重汲取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取长补短，兼收并蓄，共同绘就人类文明美好画卷。”^[2]

二、理解全人类共同价值

在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演进过程中，多元文明塑造并发展了具有内在共通性的价值追求与理念共识。“各国历史、文化、制度、发展水平不尽相同，但各国人民都追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3]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在长期社会化过程中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结果，也是各国实现现代化、建设美好世界的共同价值信念。全人类共同价值不仅承认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各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价值观念，而且主张把全人类共同价值与各国人民的价值追求有机统一起来，不断培育具有广泛文化共识和情感共鸣的全球共同价值，成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最基本最持久的精神力量。^[4]

（一）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人类自身价值共识发展的必然结果

价值强调客体对于主体的效能、需要、作用和意义，共同价值则是不同

[1] 习近平：《共倡开放包容 共促和平发展——在伦敦金融城市长晚宴上的演讲》，《人民日报》2015年10月23日，第2版。

[2] 习近平：《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建设合作共赢美好世界——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6月29日，第2版。

[3] 习近平：《加强政党合作 共谋人民幸福——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7月7日，第2版。

[4] 吴志成：《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中国方案》，《光明日报》2023年4月24日，第12版。

主体间基于共同需求和认同，为维护共同利益而形成的价值共识。^[1]因此，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基于共同的需求利益、理想愿望和前途命运，超越国家民族、文化历史、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发展水平的差异，人类整体共同追求的价值和意义，包含世界各国人民对一些基本理念、基本价值的普遍认同和重要共识。它贯通个人、群体、国家、区域、世界等不同层面，既反映了各国人民普遍认同的价值理念的最大公约数和人类作为整体对安全、稳定、生存、发展、平等、自由的普遍价值共识，也凝聚着国家之间处理彼此关系时应该遵循的价值准则。人类社会产生以来，人类共同价值因素即已历史地存在于人类交往互动的过程中，并在长期实践中不断丰富，成为不同国家的人民交流往来、共处发展的价值观念基础。从本质上说，全人类共同价值体现了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需求，是立足人类根本需求和共同利益基础之上所达成的普遍价值共识。^[2]

（二）全人类共同价值是深化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必然要求

由于价值是从社会主体对待满足其自身需要的物的关系中产生，是人的思维活动的产物，对同一事物的价值认识也会因时代不同而不同，因人群不同而存在差异。随着全球化的深化，特别是世界市场体系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基本确立，国家之间的相互联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密，利益融汇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休戚与共。如何认识和处理多元价值与文化差异，成为全球化时代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人们必须面对的时代问题。近年来，尽管遭遇逆全球化与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脱钩断链”的短暂逆流，但世界不会退回到彼此隔绝的“孤岛”，全球化和共生合作的时代大势不可改变。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表明，人类变得更加安危与共，后疫情时代人类将迎来粮食短缺、气候变暖、地缘冲突等多重风险挑战的交织叠加，世界各国唯有团结合作方可有效应对全球危机，因而增进国际社会破解集体行动困

[1] 汪亭友：《“共同价值”不是西方所谓“普世价值”》，《红旗文稿》2016年第4期，第8页。

[2] 吴志成：《深刻理解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丰富内涵》，《国际问题研究》2022年第5期，第13-14页。

境、加强协同行动的价值共识显得更为迫切，也更加重要。可以说，全人类共同价值本身就是人类解决共同面临的重大问题和加强全球合作治理的价值诉求的体现，也是回应全球化时代客观要求的必然选择。

（三）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对西方“普世价值”的批判超越

长期以来，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基于“价值一元论”和“西方中心”的偏狭认知，将西方价值标榜为“普世价值”，将其宣扬为指引人类历史和社会发展的终极价值，反映了西方国家基于现实实力和先发优势的价值霸权和思想强权。西方国家打着所谓“普世价值”旗号，肆意干涉别国内政，甚至通过战争、“颜色革命”等方式，向非西方社会推行资本主义文明。他们以“和平”之名挑起冲突，以“发展”之名进行掠夺，以“公平”之名歧视非西方文明，以“正义”之名悖逆国际公道，以“民主”之名维护霸权地位，以“自由”之名搞乱世界秩序，充分暴露出霸凌和唯我独尊的本质，其结果必然将人类社会推向冲突对抗的境地。^[1]与之相反，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在尊重各国历史文化差异的基础上提出的，它反映不同个体、民族、国家之间的价值共性，不是对某些地区、某个国家自身价值的人为提升和刻意打造，也不强加给别的国家、民族和人民，而是人类在长期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不同文明求同存异、交流融合的产物，实现了普遍性、历史性、时代性和民族性的有机统一，是对西方“普世价值”的超越。

（四）全人类共同价值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精神力量

全人类共同价值赋予人类文明明晰的核心价值，是引领各国人民共同促进人类文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遵循，有助于实现中国价值理念与世界价值共识的对接共鸣。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深刻把握了当今时代潮流和世界发展大势，为人类文明进步指明了价值方向，也夯实了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基础。世界各国都应该本着对人类前途命运高度负责的态度，做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倡导者、弘扬者、实践者，以宽阔胸襟包

[1] 吴志成：《为弘扬和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贡献中国力量》，《现代国际关系》2022年第7期，第7页。

容不同文明的价值认识，尊重不同国家人民对价值实现路径的探索，把全人类共同价值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实现本国人民利益的实践中去，推动世界不同文明共同进步；应秉持平等尊重、摒弃傲慢偏见，坚持开放合作、不搞封闭对抗，坚持互利共赢、不搞零和博弈，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在文明交流中设定“普世价值”，搞自命不凡、高人一等，反对将自己的价值观和制度模式强加于人，真正成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力量。

三、传承与创新

人类文明发展历史表明，任何文明的发展都必须与时偕行，传承创新，善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种创造性转化就是充分挖掘历史文化的时代价值，深入了解和把握各种文明的悠久起源和丰富内容，撷取百家之精华，融汇各方之优长，根据时代特点和要求改造那些至今仍然具有借鉴价值的文明内涵和形式，赋予其新的时代载体和传播渠道，以时代精神激活其现代生命力，让一切文明的精华造福人类。创新性发展就是要把握时代大势，放眼世界未来，按照时代的新进步和新进展，补充和完善文明的内涵，创新文明的传播形式，增强其影响力感召力，让文明保持生生不息，焕发勃勃生机。可以说，当下世界的各种优秀文明，都具有不封闭、不僵化的创新精神，都是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的结晶，都是在尊重传统文明实践积淀的基础上再创新再创造的产物。^[1]

（一）正确处理传承与创新的关系

现代从传统走来、从历史中孕生。推动文明创新与发展必须科学对待传统文化，处理好继承传统与扬弃创新的关系。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也是这个国家和民族奋发和创新的精神命脉。如果丢掉了传统，抛弃了优秀传

[1] 吴志成：《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中国方案》，《光明日报》2023年4月24日，第12版。

统文化，就割断了精神命脉。面对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我们要善于守正创新，在继承中学习和发展，在发展中创新和超越，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第一，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是特定主体基于特定时期的历史条件和环境所形成的价值与理念共识，既包含积极有用的精华，也存在消极过时的成分。如果对传统文化不加取舍、照搬照用，既无助于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也可能引发“文化虚无主义”“文化复古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等错误倾向。因此，科学对待传统文化，既要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深入探究传统文化精髓与发展规律，充分挖掘和运用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加强对优秀文化基因的传承与发展，又要以能否回应时代需求和全球性挑战、能否转化为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财富作为评价标准，^[1] 不断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

第二，创新发展现实文化。世界文明发展规律表明，文明永续发展，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顺时应势、推陈出新，不断吸纳时代精华。应该立足时代发展的新特点新要求，补充、拓展优秀传统文化新的时代内涵，创新其现代表达形式，激活其生命力和发展力，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在历史文化的深厚沃土上培植出新时代的文明之花。由于传统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也必然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这就要求人们在学习、研究、应用传统文化时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进行辩证取舍，而不能简单教条地一股脑儿照套照用。

第三，促进传统文化与现实文化融通。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与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科学对待文化传统的一体两面。实现传统文化的永续发展需要将这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共同激发文化的磅礴力量。我们要善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紧密结合起来。“要

[1] 张述存：《新时代如何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光明日报》2019年1月24日，第6版。

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1]

（二）正确处理本土文明与外来文明的关系

尊重和维护多元文明需要处理好本土文明与外来文明的关系，既要传承弘扬本国本民族的思想文化智慧，也要兼收并蓄别国别民族的思想文化精华，通过多元文明间的交流、借鉴，促进世界文明的绚丽多姿。

第一，坚持不忘本来，维护本国本民族文明。文明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根与魂，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如果不珍惜自己的思想文化，丢掉了思想文化这个灵魂，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立不起来的。尊重各国各民族文明，首先要珍视和维护本国本民族的思想文化，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成果，推动其创新性发展转化，保持自身的理念向度、精神气度和思想特色，这不仅有助于推动本国本民族文明的传承与创新，对于始终保持人类文明多样性也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坚持借鉴外来，尊重别国别民族文明。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其思想文化也不存在高低、优劣之分，它们共同构成人类文明进步的精神指引，都应该得到承认和尊重。各国各民族都应该虚心学习和借鉴别国别民族思想文化的长处和精华，为本国本民族文明发展注入活力，也为人类文明的共同进步贡献力量。这是增强本国本民族思想文化自尊、自信、自立的重要条件。世界各国都应该坚持胸怀天下，兼收并蓄，多一些相互尊重和包容、少一点居高傲慢和偏见，努力做到求同存异、取长补短，谋求和谐共处、合作共赢。

（三）积极促进文明交流与互学互鉴

文明因交流互鉴而丰富多彩，文明交流互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

[1] 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

对人类社会创造的各种文明，无论时空地域，我们都应该采取辩证扬弃、学习借鉴的态度，都应该吸取精华、去其糟粕，使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中的优秀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优秀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第一，秉持学习借鉴的态度。文明开放的内在属性与文明发展的阶段特征，要求不同文明通过交流互鉴实现共同发展。尤其是在全球化不断深化的时代，人类处于同一个命运与共的地球村，如果各国重新回到一个个自我封闭的孤岛，人类文明就将因老死不相往来而丧失生机活力。“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发展史充分说明，无论是物种、技术，还是资源、人群，甚至于思想、文化，都是在不断传播、交流、互动中得以发展、得以进步的。要用文明交流交融破解‘文明冲突论’。”^[1]

第二，坚持从本国实际出发。面对人类文明百花园中绚丽多彩的文明成果，要坚持从本国本民族实际出发，坚持取长补短、择善而从，做到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讲求兼收并蓄、兼容并包。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中国人民始终立足本国国情，坚定文化自信，按照新的时代要求和实践需要，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全面协调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建设，开创了人类文明的新形态。

第三，注重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在多元文明共存共生的时代，传播方式与手段的便捷化多元化为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更大方便。促进文明互学交流，不仅要秉持多元包容的态度和为我所用的原则，深入了解和把握各种文明的悠久起源和丰富内容，还要提高兼收并蓄的鉴别力，广泛借鉴吸收各国各民族思想文化的长处和精华、剔除其弊端和糟粕，使之本土文化建设注入新的发展活力。^[2]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人民日报》2022年7月16日，第1版。

[2] 张述存：《新时代如何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四、拓展国际人文交流合作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中外人文交流是党和国家对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夯实中外关系社会民意基础、提高我国对外开放水平的重要途径。”^[1]人文交流合作推动不同文明相互理解与共同繁荣，为深化双多边合作扩大民意共识，对于促进经贸合作、政治互信、文化交流、民心相通和改善国际关系都具有基础性、广泛性和持久性作用。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国际人文交流合作也遭遇严峻挑战。因此，倡导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必须通过加强和拓展人文交流合作，消除文化交往的隔阂与误解，打破文明交流融合的壁垒和藩篱，加深不同国家人民的相互理解与彼此认同，促进各国民心相知相通相亲，推动构建全球文明对话合作网络，共同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

（一）完善双边人文交流合作机制

人文交流是人与人之间情感和心灵沟通的桥梁、国与国之间加深理解和信任的纽带。国家之间的人文交流是国际人文合作的核心部分，中国始终将国家间人文交往置于对外关系的重要位置，逐渐建立起宽领域、高水平、多层次的双边人文交流机制，为推动国际人文合作发挥指引作用。

第一，织密全方位人文交流合作网络。中国拥有人文交流的悠久历史和优良传统，从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开拓古丝绸之路，唐代玄奘西行求法东传佛教，明代郑和七下西洋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到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传入中国，再到实行对外开放，不仅有力推动了不同文明间的交流合作，中华文明自身也在交流交融中壮大辉煌。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国际人文交流合作，将其作为党和国家对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1]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外人文交流工作的若干意见〉》，《人民日报》2017年12月22日，第1版。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际人文交流工作坚持走出去和引进来双向发力，与我国建立人文交流机制的国家数量持续扩大，合作领域不断拓展，合作内容更加深入，合作机制不断创新，形成了覆盖世界主要国家、联系多元文明主体的人文交流合作网络。

第二，发挥高级别人文交流的带动作用。进入新世纪，我国已建立了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中欧高级别人文交流对话机制、中英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中法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等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党的十八大以来，这些机制不断走深走实，示范带动作用进一步凸显。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是我国建立最早、级别最高的人文交流机制，目前已召开23次会议，交流合作领域从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拓展至旅游、媒体、电影、档案等诸多领域。^[1]在这一机制的带动下，中俄先后举办以地方合作、科技创新、体育交流为主题的国家年，开展各类活动近2000项，双方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增加到116个，建成联合实验室、研究中心80个，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化。^[2]

第三，扩大人文交流合作领域。在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的带动促进下，科学、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不同领域的人文交流合作蓬勃发展，提升了中华文明的世界影响力与感召力。在教育领域，中外留学生成为促进人文交流的重要载体。2019年在海外留学的中国学生超过100万人，^[3]稳居全球最大留学生生源国、亚洲最大留学目的国和亚太区域研究生教育中心。^[4]在卫生领域，医疗合作成为人文交流合作的重要方面。自1963年中国首次医疗援非以来，累计向非洲派出医疗队员超过2万人次，诊治患者达2.3亿人次，为非洲各国培训各类医务人才2万人次，中国医疗队被誉为“白衣使者”“南

[1] 许华：《中俄人文交流合作为大国文明互鉴树立典范》，《光明日报》2023年3月24日，第12版。

[2] 《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召开》，《人民日报》2022年11月23日，第3版。

[3] 彭博：《提升国际话语权 留学青年当有为》，《神州学人》2023年第4期，第23页。

[4] 《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我国2020年研究生在学人数预计突破300万——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智慧引擎》，《人民日报》2020年7月29日，第6版。

南合作的典范”和“最受欢迎的人”。^[1]在文化领域，中外文化交流年、文化和旅游年、欢乐春节、合拍影视作品以及“艺汇丝路”访华采风等交流活动持续推进，“欢乐春节”活动已连续举办22年，覆盖全球100多个国家，成为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共享中华文化的重要平台。^[2]

（二）拓展多边人文交流合作平台

中国将人文交流合作融入现有多边合作机制，发挥人文交流促进多边合作的作用，积极拓展多边人文交流机制，充分利用新手段创新人文交流方式，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提供多元载体。

第一，利用好现有多边合作机制。多边机制是国际合作的重要平台和载体，也是多元主体互动交往的实践场域。面对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国将人文交流融入“一带一路”倡议、“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合作，有效增强了多元文明主体间的交流互鉴。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中国与沿线国家开展丰富多彩的双多边文化交流互动，丝绸之路国际剧院、博物馆、艺术节、图书馆、美术馆联盟相继成立，形成“丝路之旅”“中非文化聚焦”等文化交流品牌，打造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海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等一批大型文化节会，在沿线国家设立一批中国文化中心。^[3]这些交流合作增进了沿线各国人民对彼此文化的了解、包容和学习，让沿线各国各民族文化焕发新的生机，努力将“一带一路”建设成中外文化交流互鉴、国际人文交流合作的共同繁荣之路。

第二，搭建多边交流合作新平台。推动多元文明交流合作，离不开专门性的多边交流合作平台。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积极担负推动文明互鉴的大国责任，创建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中拉文明对话论坛、中欧文明对话会、中阿关系暨中阿文明对话研讨会、中法文明对话会、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中非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时代的中非合作》，《人民日报》2021年11月27日，第7版。

[2] 《2023年“欢乐春节”全球活动启动》，《中国文化报》2023年1月16日，第1版。

[3]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进展、贡献与展望》，《人民日报》2019年4月23日，第7版。

文明对话大会、中非媒体合作论坛等一系列以文明交流对话为宗旨的多边合作平台。随着这些交流平台的常态化、机制化运行，其在推动不同文明主体交流互动中的重要作用已经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来自亚洲 47 个国家以及域外其他国家政府官员和相关领域代表 2000 余人参加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签署一系列多边、双边倡议和协议，发布一批重大项目成果和研究报告，形成了 4 大类 26 项推动文明交流互鉴的务实举措和合作成果。^[1]

第三，创新多边交流合作方式。随着国家综合实力不断增强，中国不断深化与有关国际组织和机构的交流合作，向国际社会积极提供人文公共产品，加强中外人文交流传播能力建设，改进传播方式方法，做大做强“互联网+人文交流”，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影响力。近年来，中国互联网企业与博物馆、博物院等文博机构合作，巧用云计算、小程序、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新技术赋予传统文化以更加鲜活色彩。在数字技术的推动下，故宫博物馆、敦煌研究院等文化传播实体打破时空局限，将数字化信息直接传递给受众，实现优秀传统文化数字信息共享，拓展了文化传播的受众空间。故宫博物院利用数字技术开发《全景故宫》等多项数字产品，将数字创意与传统文化深度结合，让传统文化“活起来”，取得良好社会效果。^[2]

（三）构建多元互动的人文交流大格局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外人文交流，将其与政治互信、经贸合作一同视为中国外交的重要支柱，并逐步形成元首外交示范引领、中央地方统筹联动以及官方民间合作并举的人文交流合作大格局。

第一，坚持元首外交引领带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决定了中国外交的最大优势，即元首外交战略引领和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对外工作大协同。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出访 40 多次，足迹遍及五大洲 70 多个国家，接待访华国际政要数百位，开展了精彩纷呈的元首外交，为外交全局提供战

[1] 《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筹委会负责人发布本次大会成果》，《人民日报》2019 年 5 月 25 日，第 3 版。

[2] 叶秀端：《中华文化数字传播：媒介、共享与认同》，《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 年 5 月 7 日，第 A03 版。

略引领，我国建交国数量也从172个增加到182个，对外建立伙伴关系从40多对增加到110多对。^[1]在国内出席和主持一系列重大主场外交活动，接待来访的国际政要数百位；以电话、信函、视频等方式广泛开展“云外交”。^[2]仅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和出席10余场重要国际多边会议，与60多位外国领导人及国际组织负责人举行会谈会见，同近30位外方领导人通电话、视频会晤，就双边关系发展和重大国际问题等深入沟通。^[3]

第二，促进中央地方统筹联动。在充分发挥元首外交示范引领作用的基础上，中央部委与地方政府坚持统筹规划、协同发力、各负其责、协同联动的工作机制基本形成。进入新时代，中央各部委积极出台推动中外人文交流合作的相关政策，为各领域、各层级政府主体深入开展人文交流合作提供资金、技术和人才便利。随着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对外交流格局的发展完善，地方政府在中外文化交流合作中扮演重要角色，地方对外开放也在更广范围、更宽领域和更深程度上推进，以更加积极主动的作为与总体外交相配合相促进，形成了多种模式共同发展的新局面。地方政府主动对接国家对外战略，充分利用具有地方特色的外事资源，在参与国际交往中更加主动。中国已经与五大洲136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2629对友好城市和省州关系，增进了民间交流，推动了民心相通。^[4]

第三，支持社会力量积极参与。随着社会力量在外交决策中影响的上升，对外交流主体的多元化特征日益明显。中国国际交流协会、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等从事民间交流的社会力量的作用不断增强，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文艺院团、高校科研机构等

[1] 外交部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奋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征程的思想武器和科学指南》，《人民日报》2023年6月2日，第6版。

[2] 《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写在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十周年之际》，《人民日报》2023年3月23日，第1版。

[3] 《谱写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华章——2022年中国元首外交综述》，《人民日报》2022年12月31日，第2版。

[4] 孙琪：《地方合作分论坛签署十四项中外地方合作协议》，《光明日报》2019年4月26日，第2版。

参与的积极性和便捷性进一步提高，社会力量成为中外人文交流合作的活跃主体。据统计，2016年至2021年仅中国文联及全国文艺家协会各组织开展对外文化交流项目就达480个，组织出访、接待来访5623人次，举办主题展演超过240项，成功举办今日中国艺术周、中国—东盟文化艺术节、艺术心桥展演、中韩日戏剧节、中华曲艺海外行、汉字之美书法展、中国—东盟青少年舞蹈交流展演、中国国际民间艺术节、“一带一路”国际音乐季、国际美术双年展、“丝路花语”中国民族音乐演奏会、中国瓷器艺术展等品牌活动，^[1]精心开展形式多样的对外民间文化交流，中华文化影响力感召力持续扩大。

五、结语

全球文明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后，中国为国际社会提供的又一重要公共产品。这一重大倡议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顺应世界历史进步潮流，汲取全球文明发展经验，着眼人类美好未来，并以全新文明理念体现了中国作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的大国担当，必将促进人类不同文明美美与共，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责任编辑：肖子璇】

[1] 李屹：《开启新征程 奋进新时代 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出更大贡献——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工作报告》，《中国文艺评论》2022年第1期，第20-21页。

权利政治：国际政治的现代性转化

□ 徐 坚

〔提 要〕世界大变局背景下大国博弈加剧，国际政治在权力政治的道德困境与道德政治的权力困境中越陷越深。国际政治陷入思维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们长期以来混淆了前现代国际关系和现代国际关系的本质差异，即前者是权力政治，后者是权利政治。权利政治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是推动国际政治发生现代性转变的强劲动力，这在国际关系史和政治思想史中得到充分证明。以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为标志，17世纪是国际政治从前现代转向现代的历史分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将现代性价值观和权利观注入国际政治，围绕国家主权构建起一个现代国际法体系，确立了现代国家主权的合法性、权力边界和主权间平等关系，塑造了一个基于契约关系的国际权利政治社会。权利政治被注入国际政治后，权力的滥用和野蛮生长受到越来越多的制约，国际政治生态逐步从野蛮走向文明。同时，权利政治也使国际政治变得更加复杂，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影响力上升，国际冲突越来越多地表现为权利冲突，权利冲突可能转化为权力冲突，权利包装下亦可能隐藏新型强权政治。权利政治为超越当前国际政治的思维困境提供了出路，也体现了当代国际政治学科的理论突破方向。

〔关键词〕国际政治、大国冲突、权利政治、权力政治

〔作者简介〕徐坚，山东大学讲席教授、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常务副会长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2 8832 (2023) 4 期 0036-28

伴随世界大变局，国际关系进入动荡变革期，大国博弈加剧，在地区冲突中的对抗不断升级，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严峻考验。处在这种形势下，国际政治似乎在倒退，回到丛林政治时代。国际政治议题进一步聚焦于权力政治，国家间特别是大国间权力的此消彼长与相互制衡成为热门话题。然而，权力政治升温也使国际政治在闭环思维困境中越陷越深，形成百年大变局下亟待解决的一个悖论。从权利政治视角重新审视现代国际政治的本质，对于探索避免大国冲突，为大国关系跳出丛林政治与零和逻辑的死循环寻找出路，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权力政治的困境

在围绕权力政治展开的国际问题叙事话语中存在一种悖论：一方面，处于对立和冲突的国家之间对于霸权主义、冷战思维等强权政治行为与观念的道义谴责与相互攻讦越来越激烈；另一方面，对于以权力政治界定的大国博弈来说，以权力制衡权力、用强权对抗强权成为合乎理性的必然选择，无可指责。这种悖论反映了人们在国际问题认知上的双重逻辑：一方面，从国际道义看，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进行谴责在当今时代是理所当然的，代表着正义；另一方面，在以权力政治定义的国际政治中，国家追求自身权力最大化并将其转化为国际影响又是合乎理性的逻辑。将这两种逻辑中的任何一种单独考察，都没有问题，但将它们放在一起，便形成一种闭环思维困境：冲突国家间的相互指责常常变成了自话自说，双方对于对方说的话在心理上是关闭的，因为已经预设对方所说都是错的。在这种情况下，冲突大国中每一方都会发现，真正驱动自身行为的逻辑往往同自己谴责对方奉行的逻辑是相同的，即所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道义实际变得无足轻重，重要的只有实力的比拼与较量。权力政治此时面临一种通过彰显自己来否定自己的悖论，因为权力政治使大国冲突成为国际政治的宿命，而对包括冲突大国在内的世界来说，这是应尽一切可能加以避免的悲剧。这揭示出当前有关权力政

治的叙事所面临的双重困境：权力政治的道义困境与道德政治的权力困境，道义在权力政治中既是无足轻重的，又是无法回避的，既是虚妄的，又是真实的。两种困境叠加，构成无解的闭环悖论。任何一方不论是通过谋求更强实力还是声称自身占据更多道义，都不能超越或消除这种悖论，如同任何人都不能揪着自己的头发来拔高自己。

要摆脱国际关系认知的思维困境，不得不追问一个基础性学术问题：国际政治的本质是什么，是权力政治吗？在国际政治领域，这是现实主义和观念论^[1]两个学派长期争论的一个核心问题。重提这个问题，并非要加入这场争论，而是力图超越门户之见，从新的视角重新审视这一基本问题，从而为国际政治跳出丛林政治与零和逻辑的死循环寻找出路。

首先要注意，国际问题的本质并非是一成不变的静态问题，而是一个历史性的动态问题。只有为我们探讨的问题找到合适的历史维度，才能得到有说服力的答案。对于当代国际问题来说，最重要的历史维度就是现代性。我们栖身于现代性，对现代社会的人和事来说，现代性无处不在。现代性这个概念是相对于前现代社会产生的。现代性既指现代化的过程，又是现代社会赖以存在的环境和状态。^[2]现代性开拓的历史空间体现在方方面面：以科学形式呈现的认知理性成为知识的标准、基于现代科技的工业化、资本主义的全球性扩张、全球化市场经济体系以及基于主权平等观念的民族国家体系，等等。现代社会的发展动力是前现代社会不可想象的。现代性塑造了一个加速发展、日新月异的世界，不仅社会变迁的速度远远快于前现代社会，而且其社会变迁的广度和深度也与以前迥然有别。^[3]现代性发端于15世纪前后的

[1] 在不同学科领域，realism和idealism有不同译法，如在哲学领域分别译为唯实论和唯心论，在国际政治领域则通常译为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兼顾二者词根意涵与其在国际政治领域的通用性，这里对realism从习惯译法，仍译作“现实主义”，但idealism译作“观念论”更为恰当。参见弗朗西斯·马尔文等：《西方文明的统一》，屈伯文译，大象出版社2013年版，第80页。

[2] 史蒂文·史密斯：《现代性及其不满》，朱陈拓译，九州出版社2021年版，第3页。

[3]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夏璐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5页。

欧洲文艺复兴，经由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进入19世纪的强劲发展期和全球扩展期。20世纪后半期，现代性一个重要特征体现为新一轮全球化高潮。现代性是超越文化、宗教界限，具有普遍意义的发展趋势，是人类社会所有民族和国家都难以回避的宿命。现代社会与前现代社会既有相通之处，但在很多方面又是不连续的。现代国际政治的逻辑植根于现代性之中。现代国际政治问题与其说是前现代国际问题的延续，毋宁说是现代性的创造物。现代性以多维创新塑造国际关系，用国际法体系和权利观念为现代国际体系奠基，使国际政治在新旧逻辑的碰撞和冲突中开辟适应现代性大趋势的道路。以下我们将分别用国际关系史和政治思想史的变迁来认识理解国际政治发生的这些现代性转化。

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现代国际政治的起点

1648年签署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被普遍视为现代国际政治的开端，主权平等观念被首次提出并付诸国际政治实践。不过，有关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对国际政治的影响，有一些歧义与误解需要澄清。比如，现实主义学派常常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提出的一些概念视为权力政治学说的基础和依据；与此相关，现实主义的批判者则由于同样的概念而把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斥责为一个无视道德准则、玩弄权术的体系。这两种态度都误读或忽略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精髓：为国际政治的合法性立基。基辛格是中外学界中注意到这个问题的为数不多的人士之一，尽管他被许多人视为一个现实主义者。基辛格在《世界秩序》这部著作中对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解读，几乎看不到现实主义学派对权力政治常见的那种陶醉、狭隘与肤浅，更多展现的是冷峻思考与理性洞见。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非同寻常之处，首先在于“把用于结束一场战争的实际手段转化为世界秩序的一般概念”。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初衷是为了结束“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这场战争为争夺神圣罗马帝国皇位而起，当时的皇位继承权不仅涉及参与竞争的不同王朝之间的利益，而且事关

教权与俗权的关系问题。“波希米亚信奉天主教的国王、哈布斯堡王朝的斐迪南是最有希望的接班人。波希米亚的贵族发起了一次‘政权更迭’，主动把本国皇冠——连同皇帝握有的决定性一票，拱手让给了一位信奉新教的德意志君主。这一结果意味着神圣罗马帝国不再是一个天主教体制。”哈布斯堡帝国和教皇试图压制对自己权威的挑战，新教徒则起而捍卫自己的新信仰。战争爆发后，同时兼任红衣主教和法国首席大臣的黎塞留秉持遏制中欧统一的外交韬略。在黎塞留影响下，14世纪以来一直享有“最虔诚的天主教国王”称号的法国国王支持挑战哈布斯堡王朝的新教联盟，使这场起源于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之争的战争变成一场混战。“三十年战争”期间，参战各方结成敌友关系错综复杂的联盟，各方势力不断分化组合，各方都有过被自己“天然”盟友遗弃的时候。用基辛格的话来说，“三十年战争”彻底打碎了天下一统或同一信仰的团结一致的假象。^[1]对于欧洲国际政治来说，这是向中世纪传统告别，是石破天惊的大事。

如果说“三十年战争”在实践上打破了欧洲中世纪的传统，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则以成文国际条约的形式为构建不同于传统的现代国际体系奠基。在这方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要义，并非像现实主义学派流行的解读那样是为强权政治立基，恰好相反，是为限制权力立法。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包含一系列制度创新，旨在确立现代国家主权的合法性、权力边界与主权间关系。“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建立的架构是人类首次尝试把一个建立在普遍接受的规则和约束之上的国际秩序体制化，并且该架构以众多国家为基础，而不是以一个势压各国的单一国家为基础。首次出现的‘国家理由’和‘国家利益’等概念没有赞美权力，而是试图限制权力并使其合法化。”^[2]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为国家主权的合法性打下的第一根支柱，是将王权与神权剥离。鉴于“三十年战争”反映的教派争端背景，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在

[1] 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胡利平等译，中信集团2015年版，第14页、21-22页。

[2] 同上，第25页。

界定国家主权概念时，肯定了各签署国不受外来干涉选择本国制度和宗教信仰的权利。同时增加若干新条款，用以确保宗教少数派可以平安地信仰自己的宗教，不用担心被强迫皈依其他宗教。教随国定，由 1555 年的《奥格斯堡宗教和约》首开先河。该和约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在与德国新教诸侯进行的战争失败后，与后者签订的。该和约中的“教随国定”条款规定，德国诸侯有权决定其臣民的宗教信仰；诸侯信什么，其臣民也就跟着信什么。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使“教随国定”成为国际关系中具有普遍意义的一项条款，在国家观念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如果不对中世纪欧洲社会有所了解，当代人很难理解上述两种权力的分离为何意义如此重大。中世纪欧洲社会有“两个不同的权力体，王国和神国，这两个权力体却统治着同一个社会”^[1]。王权和宗教神权以不同方式分别管理欧洲社会的世俗事务与精神生活。11 世纪以前，神圣罗马皇帝始终牢牢控制罗马天主教会。随着教会势力增强，教宗格里高利七世 1073 年即位后围绕封立主教权力发起“教皇革命”，罗马教廷以欧洲精神领袖自居，非但不再屈居世俗王权之下，而且有权通过“革除教籍”等方式罢黜君主、皇帝。这场历时半个世纪的宗教革命，使欧洲王权与神权的平衡关系向有利于教会的方向倾斜，统一的神权对应多个王权。国王作为封建领主，可以通过提供武力保护和指定财产继承人等手段对其领地上的教会施加影响。但神权对于俗权的制约更为有力和广泛。12 世纪教会法学家图尔奈的史蒂芬（Stephen of Tournai）说，“他只知道在‘一个’国王领导下的‘一个’社会。这个‘社会’是教会，这个‘国王’是基督。”教会的权力贯穿各个社会阶层，从国王到平民；教会力图控制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包括战争与和平、贸易和商业、学术与教育。在罗马教皇的普世主导权下，中世纪欧洲至 13 世纪出现了一种英国学者恩斯特·巴克所说的“文明的统一”：中世纪只有一个单一的社会，一个不可分割的基督教世界。该社会在那时同时是教会和国家。在这种社会，

[1] 弗朗西斯·马尔文等：《西方文明的统一》，第 4 页。

教徒身份和公民身份是一回事。公民权利和宗教地位相互包含、相互渗透。“教会之外无拯救”是真理，“教会之外无法律”也接近于真实。巴克认为，很难说中世纪存在任何“国家”观念。在德国社会学家特勒尔奇看来，中世纪“不存在对于国家的感情，不存在对一个权力中心的共同、一致的依赖，不存在无所不能的主权，不存在一套对所有人都有效力的公民法律”。王国发展为国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后世法学家们努力的结果。^[1]“胡果·格劳秀斯等游走各国的学者兼谋士在交战期间制定的国际法，现在成为一个内涵不断扩大、被普遍接受的理论体系，旨在促进以威斯特伐利亚各项条约为核心的和谐关系。”^[2]教随国定，神权反过来受制于世俗王权，自然成了欧洲政治史上的惊天之变，是欧洲告别中世纪、走向现代社会的标志。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使主权国家摆脱神权自立的同时，确立了主权平等原则，这是国际体系又一意义重大的创制。主权平等意味着“昔日尊卑分明的等级制度被悄悄地抛到了一边，代之而起的是主权国家无论强弱、无论实行何种制度都一律平等的体系”。^[3]这在外交礼宾上得到充分体现：凡是国王，一律称为“陛下”；凡是大使，一律称为“阁下”。基于主权平等的现代国际体系从此诞生。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还有一项非常重要但却容易被人忽略或误解的制度创新，这就是契约政治或权利政治。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由三个互为补充的协议构成：1648年1月签署的《明斯特和约》，同年10月签署的《明斯特条约》和《奥斯纳布鲁克条约》。这是一套具有开创意义的国际多边协议体系，来自天主教和新教大小国家的二百多位正式使节参与谈判。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是参与各方经过平等协商，在自愿基础上签署的具有深远世界影响的国际多边协议。其形成过程表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是契约政治的产物，是所有签

[1] 弗朗西斯·马尔文等：《西方文明的统一》，第82-84页。

[2] 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第23页。

[3] 同上，第22页。

署方通过谈判共同为国际关系构建的原则。这些原则把权利政治引入国际关系的规范设计。接受这些原则，就意味着承认参与各方在国际体系中享有的平等权利。“这一体系妙就妙在它的各项规定不是实质性的，而是程序性的”，^[1]因为实质性内涵就体现在程序细节设计中。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在礼宾程序上将主权平等概念推到了极致。为了体现绝对平等，各国代表团想出了各自通过不同入口走进谈判会场的办法，甚至为此修建了很多会场入口。同时还规定各国代表团以同等速度入席，从而任何一方不至于因为坐等姗姗来迟的另一方而受辱。契约政治就是权利政治。只有在权利政治基础上，才有可能提出主权平等。在国家的基本权利中间，平等权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2]国家间权力（实力或能力）不平等或不均衡历来是常态，能够将平等作为一项规范原则用于制度设计并具有可操作性的只能是权利。如同个人在能力上存在差异是必然的，人与人之间只能在人格和权利上才有平等可言，国家只有作为一个权利主体，也才有平等可言。主权平等、教随国定，都不是赞美权力，而是为权力设置边界。教随国定，限定了神权的边界；主权平等，则设置了世俗权力的边界。权利政治就是对权力设界，这正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精髓所在。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的国际关系准则，将现代社会至今仍普遍认可的诸多共同价值注入国际政治，塑造了一个基于契约关系的权利政治社会：一是自由，体现在教随国定和不干涉内政原则；二是平等，体现为不以权力强弱为转移的主权平等原则；三是民主，通过建构契约政治实现；四是和平，以多边协商形式结束战争；五是正义，在融合上述价值基础上，将正当性原则植入国际政治，使国际政治开始告别丛林时代。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之所以被普遍视为国际政治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主要原因就在于它蕴含上述人类共同价值。

[1] 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第23-24页。

[2] 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280页。

三、主权再造与现代国家观念的酝酿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并非突然从天而降的历史偶然，而是欧洲现代性意识逐渐成长壮大的产物，是欧洲思想领域现代性革命的结晶。如果说欧洲近代政治思想史可以写成一部国家观念再造史，那么国家观念的核心就是主权观念。这个过程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自由、平等、公平、正义、民主等现代性意识的萌芽和酝酿阶段，始于中世纪中晚期；二是为基于这些价值的权利观念提供哲学证成与政治分析框架阶段，以17世纪格劳秀斯、霍布斯、洛克等近代思想家的突破性成就为代表。主权再造工程臻于成熟有两项标志：一是“国家用它自己两只脚就能站立，不必教会这支拐杖”^[1]；二是国家观念为自己找到了一个牢固的立足根基——现代权利政治。

主权再造是从权利观念的萌芽开始的。现代自然权利观念是从接受了基督教并且重新发现了亚里士多德等古希腊先哲的欧洲中世纪后半期萌生的。首先是承认所有人的平等。基督教有关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原罪的存在、惩罚的恰当、人之顺从的正当等教义，为平等价值的生成提供了土壤。此外，从中世纪臣民反抗权中，萌生出了个体权利观念。中世纪世俗权威受制于上帝律令权威，臣民对世俗权威的服从义务受限于最高统治者的命令正当性。臣民负有义务反抗违背上帝律法的世俗权威发布的命令。这种义务促进了个体自然权利意识的成长，为17世纪后自然权利的现代理论在欧洲全面绽放播撒了种子。^[2]

欧洲13世纪经院哲学的代表人物托马斯·阿奎那的政治哲学思想对自由和正义价值的论证，对后世宗教改革和政治思想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1] 约翰·麦克里兰：《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册），彭淮栋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144页。

[2] 加里·B·赫伯特：《权利哲学史》，黄涛、王涛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79-90页。

阿奎那认为，人类的自由是道德思想的前提。^[1] 他通过亚里士多德，重新将自然引入人类，提出了基于自然、契约或君主代表三种方式实现“正当”的观念。^[2] 阿奎那的思想被后世称为托马斯主义，在西方思想界影响深远。

平等、自由、正义等价值在欧洲的萌生和发展与基督教有着密切关系。但讽刺的是，基督教催生的这些价值在进一步转化为现代自然权利观念之前，必须首先脱离其神学支柱。14世纪意大利政治思想家马西利乌斯撰写的《政治论》（*Defensor Pacis*, 又译《和平保卫者》），开启这项工程的先河。这部著作称世俗权威在教外事务上优于教会权威，马西利乌斯通过托马斯主义迂回批评教会，认为基督教会和亚里士多德在政治上出现差异的主要原因是教皇和教会误解了《圣经》。他认为政府存在的目的是提供和平与秩序，甚至提出主权在民，认为尘世主权不是上帝透过教皇授予的，而是“来自人民”；政治权力来源于人民的意愿，而不是天主教会或君主，必须通过公民投票来行使。^[3] 马西利乌斯因其主张被认为是现代民主和权力分立原则的先驱之一。《政治论》完成于1324年，不久后马西利乌斯被教会斥为异端，该书在马西利乌斯去世后才流通于地下，直至宗教改革期间才首度刊行，据称德国宗教改革领袖路德及17世纪英格兰护国公克伦威尔均曾受此书鼓舞。

对于脱离神权支柱论证人的自然权利，14世纪欧洲另一位思想家威廉·奥卡姆有突出贡献。人们在其政治学著作中“发现了现代主观权利的首次表达”。他提出，一个人有关自身福祉的自然权利不能被正当地忽视，属于所有人的原初自由这个先决条件使人的自然权利成为必要：“理性造物本质上以他的自由为特征，这就是自愿选择原则”，“自由在此意义上是一项自然权利”。奥卡姆将财产的法律所有权和世俗管辖的权利自然化，坚持人是自由存在者、自愿行动者，有能力按照自己的意志做出多种选择。康德将意志自主作为道

[1] 约翰·马仁邦主编：《中世纪哲学》，孙毅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82页。

[2] 加里·B·赫伯特：《权利哲学史》，第93-94页。

[3] 约翰·麦克里兰：《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册），第137-156页。

德前提，而奥卡姆被认为是预见康德哲学产生。奥卡姆的意志权限论与后世洛克的人格自由论亦有所相通。奥卡姆赋予人以意志自主，有助于推动中世纪欧洲大步走向一种对人的自然化解释。^[1] 奥卡姆的意志自由论，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近代欧洲哲学的先声。

欧洲思想观念的革命性变化和巨人时代则要等到文艺复兴的到来。恩格斯认为，文艺复兴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化。马基雅维利是这个时代政治思想领域的重要人物之一。马克思肯定马基雅维利及其后的一些近代思想家在国家观上摆脱神学的束缚，认为他们“已经用人的眼光来观察国家了，他们是从理性和经验中而不是从神学中引伸出国家的自然规律”。^[2] 马基雅维利对现代国际政治的思想贡献不在于其无视道德的阴谋论，也不在于谈论权谋、欺诈与暴力时使用的惊世骇俗的语言，而在于把国家作为独立于神权、具有自身存在价值的抽象的政治实体看待。这种国家观念随着日后霍布斯的契约政治思想与洛克的权利政治思想走向成熟，再经康德的“永久和平”观念进一步推动了现代国际关系权利理性的强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将马基雅维利视作开创政治学的先驱并不为过。但同时应该看到，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和《论李维》等著作中并没有提出什么系统的政治理论。他开创的与其说是政治科学，不如说是政治博弈艺术。^[3] 换句话说，他只是独立于神学和伦理学提出了需要政治学解答的问题，并未建立起分析问题和解答问题的理论框架，这一任务要到17世纪的政治思想家出现才得以实现。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人文精神对于培育现代个人观念具有前卫性意义。在这方面，1487年皮科在罗马的哲学辩论会上以“论人的尊严”为题的讲演非常具有代表意义。皮科相信人所以异于动物在于自由，而不在于社会生活和公共价值。他声称，任何动物都受其本性限制，只有人没有自身限制的本质。

[1] 加里·B·赫伯特：《权利哲学史》，第101-104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8页。

[3] 赵汀阳：《坏世界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12-213页。

人能够选择和创造各种生活，人是自己的主人，所以人能够是并且应该是自由的。^[1]皮科以自由去定义人，与奥卡姆赋予人的意志自由异曲同工。不同的是，皮科以自由定义人的方式更加直率，更好地定义了现代人，更能反映现代人的共同心声，也更彻底地摆明了现代问题。

德国宗教改革运动进一步动摇了教会在欧洲精神世界的垄断地位。马丁·路德发起的宗教改革，核心理念是强调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对于促进欧洲现代权利意识来说，个人平等借宗教改革之势传播，取得了一次决定性的突破。个体平等赋予每个人一种超越社会关系的新身份，使每个人拥有独立于他人的自我意识成为可能。个体平等是“个人”独立价值形成的基础，而个体权利观念是现代意识社会的标志性特征。因而，虽然路德宗教改革的本意是恢复原教旨，客观上却“使人向现代意义上的个人逼近了一步”^[2]。由于新教精神明显比天主教精神更接近现代，韦伯甚至把新教精神看作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决定性来源。^[3]

在宗教改革和人文主义精神的合力冲击下，西方世界变得越来越世俗化。这种变化的一个后果是政治冲突导致了更多的战争，政治战争叠加宗教战争，吞噬了欧洲。法国思想家博丹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的16世纪欧洲政治哲学思潮的又一重要代表人物。作为王室近臣，博丹对于因连年征战而造成的国家治理濒临崩溃的危局深感忧虑，主张建构强大王权为社会秩序的基石，提出“主权”绝对不可分割的观念，成为日后国家主权观的嚆矢。^[4]

四、现代国家观念的形成

至17世纪，欧洲从前现代社会迈入现代社会各方面的条件都臻于成熟。当时欧洲被似乎永无休止的战争困扰，“三十年战争”使欧洲人迫切需要一

[1] 赵汀阳：《坏世界研究》，第222页。

[2] 同上，第220页。

[3] 马克斯·韦伯的这种思想集中体现在其代表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

[4] 陈方正：《现代世界的建构》，南方出版传媒、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4页。

种新的国际政治观念来约束战争，缔造和平。与此同时，1640年到1688年，英国发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场现代革命，现代社会的构建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哲学提供理论支撑。一方面是历史呼唤现代政治思想，另一方面则是欧洲三大思潮在17世纪形成合力，提供了将现代性价值观念转化成社会变革巨大动力的条件。欧洲科学思潮以哥白尼、第谷、开普勒、伽利略、牛顿、莱布尼茨等人的伟大科学发现为主轴，显示了理性对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力量。欧洲哲学思潮在培根、笛卡尔的新科学观念推动下，在斯宾诺莎的泛神论冲击下，全面动摇了基督教信仰与道德的基础，改变了西方人对于自然世界的观念。在上述历史呼唤与思想积淀基础上，欧洲政治哲学思潮在格劳秀斯、霍布斯、洛克等人引领下，正式开启进入现代政治社会之门，并为通往18世纪的启蒙运动铺平了道路。^[1]

荷兰政治思想家和法学家格劳秀斯1625年发表的《战争与和平法》，围绕如何结束战争以及在可能的条件下如何消除战争中的不义展开。“整个基督教世界在战争问题上都不守规矩，即使最野蛮的民族也会对此感到羞愧：他们因非常琐屑之事，甚至有时无任何理由，就兵戎相见。而当战争一旦发动，对权利的尊重就荡然无存，无论是神的法律还是人世的法律。就好像从那时，遵循着一种普遍法令，人们公开地释放出实施罪恶行为的狂热。”^[2]教会因卷入战争而失去了道德权威，人们无法指望从教会那里为避免战争获得宗教启示或道德指引。格劳秀斯转而寻求世俗办法，试图将自然权利和自然法从古典神学中解放出来，将“人的自然社会性”作为其学说的基础。在他看来，即使没有任何需求，人的真正本性“仍然会指引我们走向互助的社会关系”，人性“是自然法的母亲”；从基于人性的自然法中可以提炼出人的社会性，即人们的相互依赖，这种社会性使和平得以可能。格劳秀斯认为，人的社会性以及人类存在的共同体是敌意和暴力的制动器。从人性中提炼出人的社会

[1] 陈方正：《现代世界的建构》，第33-42页。

[2] 转引自加里·B·赫伯特：《权利哲学史》，第111页。

性，演绎出人类共同体，进而抽象出一个权利概念。格劳秀斯的学说被认为是“从权利而不是法的角度重构一个法律体系的首次尝试”。^[1] 格劳秀斯从人性外推的“自然社会性”，在伦理哲学上带有“性善论”色彩。他相信人类有能力辨别是非善恶并做出正确选择。当然，单纯用性善或者性恶解释人性是否成立，向来是存疑的。尽管如此，格劳秀斯仍然在推动政治科学摆脱神学、独立建构自己的分析体系方向上前进了一大步。

主权再造的思想理论体系是由两位英国思想家完成的：霍布斯与洛克。在政治理论上，霍布斯是近代第一位思想巨人。他的《利维坦》被视为堪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遥相匹比的经典之作。他的理论都是从他的自然权利学说和人性论推导而来，自然权利的现代学说从霍布斯这里首次得到充分发展。在其自然观的基础上，霍布斯提出了具有革命意义的新权利观。霍布斯为现代政治权利和国家观念构建的理论分析框架根基坚实，体系宏大，对于现代国际政治影响深远。

霍布斯以个人的自然权利而非义务作为定义现代社会政治的基础，是一项革命性的突破，开创了“权利为本”的现代政治。^[2] 他认为，人的生存欲望是人的自然权利的来源。为了生存，人的自然本性首先在于自保，因而贪生怕死、自私自利、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处于自然状态中的人与人相互防范，每个人都是每个人的敌人。人在自然状态下都享有“生而平等”的自然权利，为了和平与过上安定的生活，出于理性，人们相互间同意订立社会契约，将各自的自然权利托付给某一个人或某个多人组成的集体（如议会），大家的自然权利被转化为合法的统一意志和权力，这就是主权；通过这种方式建立的主权实体就是国家。霍布斯将人的生存愿望和对安康生活的追求作为自然权利的基础，使自然权利成为一种无需证成的“天理”，因为人的自然权利产生先于人的社会和道德存在，并且是后者的先决条件。人的自然权

[1] 加里·B·赫伯特：《权利哲学史》，第113-117页。

[2] 赵汀阳：《坏世界研究》，第227页。

利不依赖于先前存在的人与人之间的约定，也不依赖于一个逻辑上先行确立的正当概念。如此形成的自然权利被赋予了个体性、主观性、平等性，即承认个体的福祉或“权利”是首要的，个体的主观判断具有权威性，所有人的自然权利都是平等的。主权个体观念是霍布斯对主权再造作出的奠基性贡献。个人成为权利的主体，主权个体产生，是现代社会意识区别于前现代社会意识的第一标志性特征。霍布斯抨击教皇拥有超越世俗政权的权力，坚决主张教会必须臣服于世俗政权，甚至呼吁教会势力撤出大学。

霍布斯对于建构现代社会的第二个贡献在于揭示了自然权利的内在矛盾。一方面，在自然状态下，为了自我保存，人会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恐惧那些威胁自己安康的东西。人的自然权利反映了“人类共有的普遍倾向”：得其一思其二、死而后已、永无休止的权势欲。^[1]这意味着，人的想象能走多远，人的不受限制的自然权利就有多少。另一方面，他人的存在对于每个人实现自己的自然权利就是一种限制，人的权势欲愈大，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和对立就越大。这种悖论使人制造混乱和自我毁灭的自然能力变得几乎无限。“霍布斯式自然权利具有通过彰显自己而否定自己的内在矛盾性。”^[2]人的权势欲带来的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和对立，反映了自然权利虽然是无需证成的“天理”，但因无法遏制冲突而存在一种自我否定的悖论。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自我毁灭的能力趋于无穷大，自然权利的这种悖论变得更加突出。遏制人的权势欲带来的社会冲突是现代社会政治的核心问题。

霍布斯的第三个贡献在于提出了两种主权观念，即主权个体与主权国家。个体的主权来自无需证成的自然权利，国家的主权来自个体通过社会契约的授权。换言之，个体的主权是天赋的，国家的主权是人设的；个人是天造之物，国家是“人造的人”；前者是后者的基础，没有前者就没有后者。霍布斯在《利维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号称“国民的整体”或“国家”（拉丁

[1] 霍布斯：《利维坦》，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72页。

[2] 加里·B·赫伯特：《权利哲学史》，第140页。

语为 Civitas) 的这个庞然大物“利维坦”是用艺术造成的，它只是一个“人造的人”；它远比自然人身高力大，以保护自然人为目的；在“利维坦”中，“主权”是使整体得到生命和活动的“人造的灵魂”；官员和其他司法、行政人员是人造的“关节”；用以紧密连接最高主权职位并推动每一关节和成员执行其任务的“赏”和“罚”是“神经”，这同自然人身上的情况一样；一切个别成员的“资产”和“财富”是“实力”；人民的安全是它的“事业”；向它提供必要知识的顾问们是它的“记忆”；“公平”和“法律”是人造的“理智”和“意志”；“和睦”是它的“健康”；“动乱”是它的“疾病”，而“内战”是它的“死亡”。最后，用来把这个政治团体的各部分最初建立、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公约”和“盟约”也就是上帝在创世时所宣布的“命令”，那命令就是“我们要造人”。

为了论述这个“人造人”的本质，我们将考虑：第一，它的制造材料和它的创造者；这二者都是人。第二，它是怎样和用什么“盟约”组成的；什么是统治者的“权利”、“正当的权力”或“权威”，以及什么是保存它和瓦解它的原因。^[1] 霍布斯这段话揭示了权利与权力在现代国家政治中的关系：权利关乎权力的正当性或权威；正当的权力来自权利；权力存在的目的在于维护公民的权利，防止权利的冲突转化为“动乱”和“内战”。在论证权利与权力的过程中，霍布斯多次使用“主权权利”、“管辖权的权利”或“主权者的权利”这样的概念。这些概念的共性在于，现代社会中的任何正当权力都是“人造”之物，都有边界，这种边界来自权力的创造者所赋予权力的权利。超越权利的权力不具正当性。据此可以推论，任何无限的权力都不具正当性，因为权力的创造者为了维护自身基本权利，不会将自身利益保障托付给一种无边界的权力。

对于现代政治来说，上述概念有双重意义：其一，当被用于指涉一个国

[1] 霍布斯：《利维坦》，第1-2页。

家内部的关系时，这些概念体现了权利对于权力正当性的重要性；其二，当被用于指涉国家外部关系时，“主权权利”概念为国家之间的平等关系奠定了基础，这就是主权间的权利关系。主权平等向来指涉也只能指涉主权间的权利平等，而不是主权国家的力量对比关系，将主权平等与国家实力对比混为一谈是国际政治认知上的逻辑混乱。

霍布斯的第四个突出贡献在于揭示了国家主权的两种生成方式：以建制创造主权与以征服创造主权，并把以这两种方式生成的国家主权作为现代社会和前现代社会之间的根本区别。^[1]霍布斯认为，对于依靠社会契约创造的主权来说，每个人都有三个人格：第一种是自然人格；第二种是主权者，主权者是人造人格，这种人格是虚拟的，主权者也被称为代理人，其言语和行为由他代表的那些授权人所有；第三种是公民人格，^[2]自然人通过承认（服从）主权者的行为，反思性地将自己转化为公民人格。与建制创造主权不同，以征服创造的主权不仅依靠武力，而且不存在上述三重人格。被征服者出于对征服者的恐惧而服从后者，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间的关系是主人与臣仆或奴隶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奴役关系，而不是契约关系。当然，霍布斯非常清楚，在他那个时代，国家并非起源于契约，自愿缔约之事或从未发生，或罕见之至，大多数国家都是靠征服而形成。以征服创造主权，是当时的历史常态，但这并不妨碍他表达这样一种历史观点，即人类社会要自拔于自然状态，就必须建构基于社会契约的主权，以建制方式创造国家。从现实世界演变看，这不仅是霍布斯的政治理想，也的确反映了近代以来世界政治发展趋势。

霍布斯是现代国际政治理论的奠基人。如果说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在实践上开启了基于主权平等的现代国际政治先河，那么三年后成书的《利维坦》则是霍布斯为现代国际政治创建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理论大厦。

[1] 约翰·麦克里兰：《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册），第206-209页。

[2] 霍布斯：《利维坦》，第123-127页。

霍布斯政治哲学围绕权利政治而不是权力政治展开，不论是有关国内政治的社会契约理论，还是有关国际政治的“人设主权”思想，背后的核心命题都为权利政治这条主线所贯穿。霍布斯的权利政治思想对于后世有双重深远影响。一方面，权利政治为主权平等实践提供了合理证成。主权平等只能是权利平等，不能是权力平等，因为国家间权力（实力）不平等是常态，平等是例外，正如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只能体现为权利平等，而不能要求人与人的能力平等。这意味着，在权利观念被证成以前，平等（国家间或人与人之间）找不到载体或表现形式，没有立足之地。因而，对于现代国际政治的主权平等关系来说，权利政治观念绝非可有可无，而是不可或缺。离开了权利观念，主权平等或人与人之间的平等都成了悬置的空话。另一方面，霍布斯用权利政治将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贯通，理一分殊，也具有重要意义。后世有所谓“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云云，贯通其中的深层逻辑离不开权利政治。

霍布斯的政治哲学也存在历史局限，其社会政治学说在一些论证上有失偏颇。他的人性论似乎走向了人性恶的极端，对人的社会性有所忽视，后世对霍布斯关于自然状态下社会生活的假设存疑颇多。一个更为突出的理论缺陷是论证国家起源时的自相矛盾。他一方面认为主权者的权力是人们通过订立社会契约授予的，另一方面又强调主权者一旦获得授权，其权力就是绝对的、至高无上的、不可转让的，人们一旦授权就不能反悔。这种立场在逻辑上不通，在道义上不当，在历史上也得不到证成，后世对此多有诟病。如何克服霍布斯学说中的极端性，完善他提出的现代权利理论，成为后世政治哲学家聚焦的问题。在这方面，洛克的贡献最为显著。

同霍布斯一样，洛克从自然状态开始解释政治权力的起源。但洛克对霍布斯的自然状态进行了修正，使其看上去不再像霍布斯所描述的那样充满恶意。洛克认为，自然状态是一种自由状态，但不是放任状态；自然状态同时“也是一种平等状态”。在自然状态中，“一切权力和管辖权都是相互的，没有一个人享有多于别人的权力”；人们遵从理性，也就是自然法行事，任何人“不

得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或财产”。^[1]与霍布斯相似，洛克将自然状态与政治社会相对。他把政治社会定义为存在一位权威性共同裁判者的社会状态。洛克基于权利论解释政治权力，认为“政治权力就是为了规定和保护财产而制定法律的权利，判处死刑和一切较轻处分的权利，以及使用共同体的力量来执行这些法律和保卫国家不受外来侵害的权利；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公众福利”。^[2]在自然状态与战争状态的关系问题上，洛克与霍布斯有根本区别。霍布斯认为，自然状态意味着所有人同所有人的战争，自然状态与战争状态大体被视为同一状态。而洛克看到了“自然状态和战争状态的明显区别”，认为不论在自然状态下还是在政治契约社会中，“自由是其余一切的基础”，凡是企图夺走他人自由的行为，必然被假设企图夺走他人的其他一切，都造成一种战争状态。“谁企图将另一个人置于自己的绝对权力之下，谁就同那人处于战争状态”；“凡是图谋奴役我的人，便使他自己同我处于战争状态”。洛克强调战争状态下的自卫权，“人应该尽量保卫自己”，“我享有毁灭那些以毁灭来威胁我的东西的权利”。^[3]相对于霍布斯，洛克对人性的解释更显温和、更具社会性。在洛克看来，人要温顺得多，不会那么着魔般地怀疑他人，对自己脆弱性也不是那么敏感。^[4]

洛克的人性观与霍布斯有所差异，与他们对所有权的理解有关。霍布斯认为，在自然状态中，每个人都享有对一切东西的无限所有权，这使一切人都是其他一切人的自然敌人，也导致霍布斯式自然权利必然是排他性的。在洛克看来，一切所有权都是由劳动创造，财产权是劳动的直接产物。土地和自然界自发生产的一切果实，都归人类所共有，“没有人对于这种处在自然状态中的东西原来就具有排斥其余人类的私人所有权”。然而，由于“每人对他自己的人身享有一种所有权”，他的劳动“是正当属于他的”。一个

[1] 洛克：《政府论》，商务印书馆2022年版，第145-146页。

[2] 同上，第144页。

[3] 同上，第153-154页。

[4] 加里·B·赫伯特：《权利哲学史》，第159页。

人将其劳动混入一个目标物，就使该物脱离了自然状态而变成了此人的劳动果实，此人就获得了对该物的所有权。“我的劳动使它们脱离原来所处的共同状态，确定了我对于它们的财产权。”^[1] 尽管劳动创造所有权学说带来一些争议问题，但它对消解或弱化霍布斯权利理论的极端排他性具有重要意义，其也是辨析洛克与霍布斯权利理论之间差异的一个关键。

洛克对霍布斯权利思想的完善和发展还有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对人格与人的区分。在 1690 年发表的《人类理解论》中，洛克为其新自然权利学说提供了关键论证。他认为，人是活着的生物存在；而人格则不同，人格与意识相关，只能属于有智慧的主体。“人格之所以能够超过现在，而扩及过去，只是因为有意志。借着这种意识，它便可以关心过去的动作，对过去的动作负责，并且把过去的动作认为是自己的，一如其在现在的动作方面所可能的那样。”^[2] 当自然人将他过去和现在的行动划归给自己，将它们归因于自己时，他就通过自己的意识自反活动转化为人格。人单方面地通过意识的劳动，对所作所为主张所有权，进而对其负责。他是自己意识的自我构成性劳动的产物，也就是说，人格是自我意识的产物，人对自己的人格享有独占的权利。洛克在《政府论》中说：“每人对他自己的人身享有一种所有权，除他以外任何人都没有这种权利。”^[3] 需要说明的是，上引洛克这句话的中译本其实翻译有误，“人身”对应的原文是 person，这个词应译作“人格”。有关研究洛克的文献特别强调，“不能混淆洛克政治学中单纯的人（a mere man）与人格（person），两者的差异是洛克权利思想的一个关键”。所以该文献引用洛克这句话时，将 person 译作“人格”而非“人身”。^[4]

洛克对人与人格的区分，在某种意义上是对霍布斯有关自然人和人造人的区分的发展和升华。洛克的人格理论在哲学和政治学上衍生出多方面意蕴。

[1] 洛克：《政府论》，第 160-161 页。

[2] 洛克：《人类理解论》（上册），商务印书馆 2017 年版，第 348 页。

[3] 洛克：《政府论》，第 160 页。

[4] 加里·B·赫伯特：《权利哲学史》，第 66 页。

首先，人作为自然存在和人作为人格存在的区分，消解了人的自我所有与上帝对人的所有之间的矛盾，而这个矛盾在 17 世纪的欧洲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个非同小可的问题。其次，作为人格存在，人对自身的排他性权利表明，人是自由的，人的自由在这里仅仅指它是一个理性存在，能够用理性进行创造性思考。人在精神上的这种自由是不可被剥夺的，想左右他人的人格即自我意识是徒劳的。有关人格独立自由的观念是人类理性解放的重要反映，是人类摆脱精神依附状态、成为现代人的重要标志。此外，人格拥有自身，就是拥有自己的行为并对其负责，这也是人作为人格存在所独有的特征，因为人们从不会要求或期待动物或物件对其行为负责。人们在对自身责任的反思中，一旦形成人格的自我约束，就意味着人格的自然权利能够自发生成出人格的自然义务，从而化解了个人权利与个人义务之间的紧张与对立，洛克将其称为“人格的同一性”。人格的同一性使洛克的权利理论比霍布斯的权利理论更具包容性。^[1] 洛克的人格学说蕴意深刻，使基于权利观念的现代国家与现代国际政治理论获得更加坚实的哲学基础。

把法治置于政治社会的核心地位，是洛克政治思想的突出特征，也是洛克对霍布斯政治哲学的一项重要矫正。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洛克是三权分立学说的首创者。他认为，“人民的福利是最高的法律”；立法权“是最高的权力”；政府首脑“是被赋予有法律权力的公仆”；应“由有资格的著名法官来执行司法和判断臣民的权利”。^[2] 洛克拒绝霍布斯提出的主权者权威的绝对性，认为超越法律“滥用职权并违反对他的委托而施强力于人民，这是与人民为敌”；“暴政便是行使越权的、任何人没有权利行使的权力”；对于越权的强力，“人民便有权用强力来加以扫除”。^[3] 洛克将契约政治理论与法治社会思想延伸运用到国际政治，完善了霍布斯的主权再造理论。“只

[1] 加里·B·赫伯特：《权利哲学史》，第 166-177 页。

[2] 洛克：《政府论》，第 242、238、227 页。

[3] 同上，第 239、269、240 页。

有在正义和合法战争中捕获的俘虏才受制于专制权力，这种权力既非起源于契约，也不能订立任何契约，它只是战争状态的继续。因为同一个不能主宰自己生命的人怎能订立什么契约呢？他能履行什么条件呢？如果他一旦被许可主宰自己的生命，他的主人的专制的、专断的权力也就不再存在。凡能主宰自己和自己生命的人也享有设法保护生命的权利；所以，一经订立契约，奴役就立刻终止。”^[1] 洛克的这段话带来的启示是，在政治社会中，契约与奴役本质上互不兼容。征服制造奴役，法治鼓励契约，征服创造的主权与契约建制的主权造就两种本质不同的政治实体。洛克的分析进一步体现出霍布斯区分征服创造主权与建制创造主权的意义所在。

霍布斯和洛克都是英国革命和 17 世纪欧洲政治变革的产儿，他们的学说标志着现代政治科学的诞生。从历史积淀看，霍布斯与洛克的学说不仅是 13 世纪后欧洲人文与科学现代性精神荟萃的结晶，而且是欧洲政治哲学思想自古典文明以来的集大成之作。18 世纪西方思想家如卢梭、休谟、伏尔泰、康德、费希特等人物在政治哲学上的建树，大体都没有脱离霍布斯和洛克确立的分析框架。他们的理论不仅适应了当时欧洲政治的现实需要，在日后被进一步转化成建设现代国家的强大社会动力，为推动北美摆脱英国殖民统治和法国大革命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武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历经三百多年经久不衰，成为写入《联合国宪章》的当代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说明 17 世纪是现代政治社会和现代国际体系形成的一个关键时期，也是相应的政治哲学思想走向成熟的时期。英国革命、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及霍布斯与洛克的理论成果，都是现代性在人类历史中开始登场的标志性事件。

五、国际政治的现代性转化

17 世纪是现代政治与前现代政治的分水岭，在其两端的人类历史呈现

[1] 洛克：《政府论》，第 252 页。

出截然不同的社会气象与发展趋势。一端是现代社会，以权利为本，是由权利政治和契约文明塑造而成的法治社会；另一端是前现代社会，或以美德（伦理）为本，或以义务（宗教）为本，实质都是基于等级秩序和奴役关系的人治社会。在国际政治领域，这种差别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上。

（一）国际体系的基础：由权力体系向法理体系转型

前现代国际政治中没有权利的位置，只有权力的较量。由于权力的使用不受限制，国家间关系是蛮力拼搏的结果。蛮力征服是前现代国家立国强国的基本方式，征服能力强弱与国家生存能力成正比。因此，历史上征服能力强的国家几乎都演变成了巨型帝国。帝国形态在人类前现代数千年文明史上长盛不衰，与权力政治的野蛮生长环境是分不开的。前现代的国际体系有几个基本特征：一是与巨型帝国相伴生的各种帝国意识形态。帝国意识形态有宗教型的，也有宗法道德型的。帝国意识形态的共同特征是等级观念。帝国就是由等级观念和等级制度组成的等级秩序，其组织形式多种多样，有松散型的，也有紧密型的，多数是二者的混合体。二是疆土经常变动，很不稳定，随帝国实力消长而涨缩，界限也很不清晰，基本上都是疆无界，与现代基于国际法理的边界与版图划分有本质差异。三是国家间关系由强权主宰。权利意识尚未注入国际政治，权力尤其是武力的使用不受制约，无需考虑正当性与合法性，唯有势均力敌或遭遇天然屏障、重大自然灾害，强权方可能被遏制。

现代国际体系是法理体系。以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为起点，经历几个世纪的建构与完善，如今形成了一个使强权受到多方面约束的国际法律与道义共同体。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塑造的主权国家体系本质上是一套国际法体系，从法理上对国家的三要素（领土、人民和权力）作了界定，规定了每个国内社会秩序的属地效力范围、属人效力范围、属时效力范围。自此以后，国家无论是作为合法垄断暴力的统治权、作为有组织的社会、作为国内统治秩序的人格化还是作为国际法律共同体中的权利主体，均被越来越有效地纳入国际法理规范体系中，并被这个体系赋予一系列现代主权国家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包括生存权、自卫权、平等权、独立权、属地和属人的优越权、交往权、名誉权和管辖权等。^[1]近代以来国际关系游戏规则演变大多围绕上述权利展开的。离开国际法体系，现代国家主权无从说起。国际法理规范与国际道义准则是相通的，都是影响国际权利观念的重要因素，分别从低标准和高标准反映国际社会的价值取向。

（二）国际政治的性质：从权力为本转向权利为本

基于法理和道义的权利政治被注入国际政治后，权力的滥用和野蛮生长受到越来越多的约束和制约。许多人认为国际法是弱法，抑制不了强权，国际道义的影响微不足道。此说大谬。弱法也是法。国际法被认为是弱法，主要是因为法律规范通常由属事要素和属人要素构成，前者规定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后者规定谁应该做或不应该做。“国际法规范通常只决定属事要素，在这个意义上它们是不完全的，有待国内法规范补充。”尽管如此，国际法作为“一种原始的法律”^[2]仍然对国际政治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其一，在现代国际政治中，对任何国家来说，只有形成权利的利益才是正当的、合法的，这体现出国家利益在现代与前现代两种国际政治环境中完全不同的生成条件。对前者来说，国家利益首先要转化为权利，方才具有正当性或合法性，对后者则不存在这个问题。其二，强权不能自然生成权利。现代国际政治的权利以国际公认为准则为基础，其权源是国际法和国际社会共同价值。这两方面的影响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政治的性质，权利政治被注入国际政治后，每个国家追求权力的本性固然不会改变，但谋求权力的方式却不得不变，从一味靠蛮力争抢逐步转向依法依规有序竞争。这推动了国际政治生态从野蛮逐步走向文明。

以上论述表明，在国际社会，弱法也能创造秩序，弱法与无法能产生完全不同的环境。在这方面，长期存在一个认识误区，即把国际社会是否有序

[1] 参见《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第二篇第二章“国家的要素”。此书对现代国际政治的法理基础所作的论述被国际学界公认为权威之作。

[2] 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第372页。

与是否存在一个世界政府混为一谈，将国际秩序与世界政府等价。实际上，这二者之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社会秩序的形成可以有多种方式，可由政府自上而下设计，或由社会自下而上推动，亦可在行为主体之间相互约定。每一社会秩序的功能，“就是促成人们的一定的互惠行为：使他们不作出根据某种理由被认为有害于社会的某种行为，并使他们作出根据某种理由被认为有利于社会的其他行为”，“秩序可能对服从行为予以某种利益，对违反行为赋予某种不利，并从而使所约许利益的欲望或对威胁不利的恐吓成为行为的一个动机”。^[1]在许多情况下，行为主体平等约定形成的秩序往往比其他方式形成的规则更具可持续性。因而，世界政府的存在并非国际秩序形成的必要条件，对国际规则的遵守和执行并不依赖于超国家的世界政府存在。契约政治以信誉为基础，在缺乏世界政府或超国家强制性权威机构的情况下，契约政治必然以国际公信和国家间认同为保障。这种保障虽然从个别案例看有其脆弱的一面，但其整体有效性非常强韧，具有可持续性。一个一味投机欺诈、完全不讲公信的国家，终将为国际社会所孤立或边缘化，使自己陷入困境。国际社会一旦通过协商形成行为规范，每个国家对国际行为准则的态度，必然受到国际普遍共识和国家间相互认同的制约。契约政治是典型的权利政治。在契约政治体系中，国家追求权力最大化与接受权利政治的制约并不矛盾。每个国家都希望提升自己的权力和影响力，但追求权力并不意味着要以牺牲自身信誉作为代价去做违反国际准则的事。相反，维护自身国际信誉有利于一个国家的长远发展，而因失信陷入孤立无援境地从长期看必然会损害自身权力和利益。所以，权利政治与践踏国际准则的强权政治是对立的，而与诚信守则的正当权力追求却相辅相成，这是基于权利政治的现代国际政治逻辑。基于这一逻辑，弱法才能创制秩序。

国际政治向权利为本演变，为近代历史发展充分证明。从国际关系史看，权利政治对权力政治的制约和改造是一个渐进曲折的过程。权利政治被注入

[1] 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第15页。

国际政治后，强权政治并未消失。相反，在近代以来的某些历史阶段，强权政治还曾甚嚣尘上。近代西方列强的殖民扩张，20世纪法西斯主义势力发动的多场侵略战争，都是典型案例。这些曲折反映权利政治演进经历了从低到高的进步历程。近代形成的国际体系一开始具有双重性质。主权平等的国际体系最初被限制于西方国家范围内，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亚非拉地区被排除在现代主权国家体系之外，在国际政治中与西方列强之间处于不平等地位。然而，殖民主义体系只是暂时遮蔽了权利政治的影响。西方殖民统治在奴役殖民地人民的同时，也不自觉地将现代权利意识输入到殖民地半殖民社会，唤醒了被压迫民族争取独立和解放的意识。其结果是二战后殖民体系土崩瓦解，基于平等主权的国际体系范围不断扩大，享有独立主权的国家由二战前的区区数十个发展到今天的近两百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公理战胜强权是现代国际政治发展的历史大趋势。《联合国宪章》将二战后的国际政治带入一个更加进步文明的新时代。进入21世纪后，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国际社会权利意识进一步增强，都为制约强权政治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条件，使那些公然践踏国际法、赤裸裸的强权政治四处碰壁，进一步走向没落。

（三）当前国际政治的主要挑战：权利冲突转化为权力冲突

权利政治使国际政治变得更加复杂。一方面，权利政治通过制约强权，推动国际政治生态走向进步。另一方面，权利政治并不必然意味着国际冲突和国际争端的减少。权利意识的增强可能增加人类社会的权利冲突，而权利冲突可能加剧国际争端，并演化为权力对抗。在权利冲突与权力对抗相互转化的过程中，有几个问题值得注意。

一是要警惕新型强权政治，即经过权利包装、看似合法而实际并不正当的强权政治。与不加掩饰的传统强权政治相比，新型强权政治更加隐蔽，国际社会识别起来更加困难，遏制和战胜这种强权政治往往更加困难，因而也更加危险。同时，权利冲突可能涉及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等妥协余地很小的深层问题，这类权利冲突引发的权力对抗，可能比围绕某些物质利益的传统权

力对抗更加激烈。

二是要意识到许多权利冲突不仅关乎国际法，而且涉及价值观和意识形态。随着权利政治的发展，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影响力趋于上升，价值观与国家利益的内在联系更加密切。国际政治领域曾经流行一种看法，认为可以脱离价值观谈论国家利益，国家间关系应淡化意识形态。这种看法恐脱离实际，是传统去权利化的国际关系理论误导人们认识的结果。在权利政治时代，不涉及价值观的国家利益问题越来越少。协调国家间利益冲突，往往需要各方就价值观问题展开深入沟通而不是回避。

三是要注意国际冲突正越来越多地表现为权利冲突。权利冲突并不一定引起权力对抗。相反，在多数情况下，权利冲突可以通过对话谈判或第三方仲裁等和平方式加以解决。但某些涉及核心价值观的权利冲突往往难以调和，可能转化成权力冲突，甚至引发全面的权力对抗。如何避免这种由权利冲突引发的激烈权力冲突，是未来大国政治面临的重点课题。

六、余论

国际政治的现代性转化趋势，给国际关系理论建设带来两点启示：

第一，人们常说，经济决定贫富，政治决定生死。经济科学着眼于“财富的创造和分配”，政治科学聚焦于“少数人的权力”和“多数人的权利”。如果说这种界定的合理性无可非议，那么多年来以政治现实主义为代表的国际关系理论由于只讲权力不讲权利，至多只能算作一种“被阉割了的”政治学理论。不仅如此，鉴于在现代国际政治中，所有国家享有的权利要比少数大国享有的权力具有更基础的地位，政治现实主义研究的问题愈发显得是在舍本逐末，是术而不是道，称不上政治科学，只是政治权术。用这种理论分析认识百年大变局国际政治发展大势，误导颇多，亟待从根本上匡正。如同经济科学考察财富的形成，并不研究如何抢劫偷盗而是研究市场等影响财富正常生成的因素，国际政治科学考察权力的生成和运用，也应将研究重心放

在权利政治等能够揭示国际政治发展规律的对象上。

第二，以政治现实主义为代表的国际政治学变成了一门视野越来越狭窄的学科。^[1] 受其影响，人们热衷于计算有关大国间各种力量对比，同时对国际关系中的各种阴谋论与诈术诡道津津乐道，而对那些决定世界潮流和人心向背的因素往往不够重视。国际政治学领域耳熟能详甚至被一些人顶礼膜拜的人士主要是摩根索、华尔茨、米尔斯海默等美国学者，鲜闻人们谈论近代以来享誉世界的一批人类先哲的学说。然而，当人们认识到权利政治反映现代国际政治的本质，并将权利观念中的核心价值如自由、平等、公平、正义、民主等看作现代性的产物和促进现代化的动力，国际政治学的视野就会陡然开阔起来了。在现代性问题上，从霍布斯、洛克到康德、马克思、韦伯、涂尔干，都有一席之地，他们在国际政治科学中亦绝非无足轻重。从这个意义上说，权利政治不仅给超越当前国际政治的思维困境提供了出路，而且体现了当代国际政治科学的理论突破方向。

【责任编辑：李静】

[1] 这一点有关西方学者有同感。参见阿米塔·阿查亚、巴里·布赞：《全球国际关系学的构建——百年国际关系学的起源和演进》，刘德斌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

“全球南方”崛起与世界格局演变

□ 徐秀军 沈 陈

〔提 要〕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乌克兰危机持续胶着和大国地缘竞争显著加剧的背景下，“全球南方”在经济、政治和国际地位等方面全方位崛起进程加速，展现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力，并已成为决定世界格局走向的关键变量之一。在世界格局深度调整和变革的进程中，“全球南方”扮演了多极世界格局的平衡手、多维世界格局的博弈者和多元世界格局的指示器等重要角色。但也应该看到，“全球南方”发挥与其实力相称的影响力仍面临诸多挑战：外部干扰过大与抗干扰能力不足、力量整合需求上升与机制化平台缺乏、维护共同利益与满足诉求多样化的矛盾。作为“全球南方”的当然成员，中国坚定维护“全球南方”的共同利益，积极参与和引领南南合作，未来将继续为“全球南方”的发展与合作注入强大动力，推动“全球南方”成为未来世界格局更加重要的力量。

〔关 键 词〕全球南方、世界格局、南南合作

〔作者简介〕徐秀军，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沈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2 8832 (2023) 4 期 0064-15

作为一种国际力量，“全球南方”并非一个内涵明确的概念。一般认为，“全球南方”融合了新时代世界格局演进的两大特征：“全球”凸显了全球化背景下各国不断增强的相互联系，以及由此得到不断提升的发展中国家的整体性；“南方”凸显了世界经济中心加速向南方转移，尤其是亚洲、非洲和拉美等发展中地区不断扩大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近年来，随着大国博弈日益加剧，“全球南方”的战略自主不断增强，战略价值不断上升，并成为影响世界格局走向的重要变量之一。

一、百年变局下“全球南方”的全方位崛起

从历史来看，“全球南方”的兴起与发展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冷战时期，“全球南方”通过发起万隆会议、不结盟运动和77国集团等合作机制，逐步形成了相互之间的身份认同和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价值取向，并以此表示对美苏两极格局的不满。冷战结束后，随着苏东剧变和两极格局的终结，“全球南方”受到国际社会日益广泛的关注。尤其是中国、印度等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大幅改变了人们对“全球南方”的认识，“全球南方”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大幅提升。乌克兰危机后，“全球南方”不仅没有全面倒向西方，还公开表达独立自主的政治立场。乌克兰危机也被视为“全球南方”政治觉醒的重要标志。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乌克兰危机持续胶着和大国地缘竞争显著加剧的背景下，“全球南方”全方位崛起进程加速，成为百年变局深度演变的推动力量。

（一）“全球南方”的经济崛起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出现快速增长，拉开了“全球南方”经济崛起的序幕。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统计数据，按购买力平价计算，1990年发达经济体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63.1%，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只占36.9%；2008年新

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 GDP 占全球的份额达 51.3%，实现了对发达国家 GDP 总量的超越；2022 年这一份额进一步提升至 58.3%，比发达经济体的份额高 16.5 个百分点。从未来发展趋势看，全球经济还将延续双速增长格局，“全球南方”的经济崛起进程还将继续，预计 2028 年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的 GDP 总量将达到发达经济体的 1.6 倍。^[1] 作为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的代表，金砖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高于七国集团成员的总和。其中，中国将在可预见的未来继续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最大贡献者。

随着全球经济重心加速从发达经济体向“全球南方”转移，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的地位也发生了相应变化。长期以来，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其中又以发达国家相互间的贸易为主。1948 年，发达国家占国际货物贸易出口总额的比例为 62.9%，1993 年这一比例更是达到 72%。此后，“全球南方”作为一个整体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不断提升。2010 年，“全球南方”占国际货物贸易出口的比例上升到 37%。尽管新冠疫情大流行对国际贸易带来巨大冲击，2020 年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货物和服务出口较上年分别下降约 9% 和 15%，但“全球南方”贸易快速增长态势迅速恢复。2022 年，“全球南方”国家贸易总额创历史新高，超过 13.3 万亿美元，出口贸易占全球份额上升至 42% 左右。^[2] 未来 5 年，东南亚、南亚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有望成为“全球南方”乃至全球贸易额增长最快的地区。

“全球南方”的经济崛起不仅改善了全球经济与贸易发展不平衡问题，还使全球贫困问题得到较大缓解。在“全球南方”经济快速增长的 30 余年里，全球贫困人口从 1990 年占总人口 38% 下降到 2019 年的 8.4%；预计到 2030 年，世界上 80% 的中产阶级人口将生活在发展中国家。值得注意的是，新冠疫情大流行导致约 7000 万人陷入极端贫困，这是自 1990 年开始全球贫困监测以来增幅最大的一年。2020 年底，估计有 7.19 亿人每天的生活费不足 2.15 美元，

[1] 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A Rocky Recovery,” April 11, 2023.

[2] UNCTA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Progress Towards the SDGs Through Trade,” January 1, 2023, <https://sdgpulse.unctad.org/trade-developing-economies/>.

全球 60% 的极端贫困人口生活在撒哈拉以南非洲。^[1] 尽管实现 2030 年消除贫困的目标可能因疫情等原因出现迟滞，但撒哈拉以南非洲以及其他“全球南方”国家的经济已逐渐恢复，其减贫进程也将随之重回正轨。

（二）“全球南方”的政治觉醒

近年来，“全球南方”的政治觉醒成为世界格局演变的重要表现之一。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在获取发展中国家政治认同和政治支持的同时，对发展中国家在债务、粮食、移民、气候变化等问题上的需求反应迟缓甚至置之不理，或者采取双重标准制造矛盾和分歧。例如，在始于 2020 年的埃塞俄比亚提格雷战争中，多达 50 万人死于战争和饥荒，西方不仅对此视而不见，还以各种理由干涉其内政。2022 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西方国家向俄罗斯实施的制裁和向乌克兰提供的援助都达到空前水平，数百万乌克兰难民在舆论上受到欧洲国家的热烈欢迎，这也与 2015 年非基督徒难民导致欧洲民粹主义泛滥形成鲜明对比。乌克兰危机让国际社会重新认识到，西方国家追求绝对安全带来的必然是绝对的不安全以及自身合法性的日益丧失。尽管美国等西方国家试图把乌克兰危机变成一场所谓“民主对抗威权”的意识形态之争，但“全球南方”国家认为西方国家的呼吁充满自私和伪善，主张重点关注因新冠疫情大流行、乌克兰危机导致的经济发展难题。从一定意义上讲，乌克兰危机成为“全球南方”对西方国家鼓吹的所谓“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普遍觉醒的开端。

“全球南方”的政治觉醒还体现为对自身发展模式的自信与自觉。为推广西方发展模式和所谓“普世价值”，西方国家故意无视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并将普世主义和西方主义混作一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西方试图以西式甚至美式现代化理论重塑“全球南方”的发展模式和道路。然而，经过数十年的实践，所谓的现代化理论、“华盛顿共识”等西方发展理论并没有改变“全球南方”的发展困境。与此同时，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

[1] World Bank, “Global Progress in Reducing Extreme Poverty Grinds to a Halt,” October 5, 2022, <https://www.worldbank.org/en/news/press-release/2022/10/05/global-progress-in-reducing-extreme-poverty-grinds-to-a-halt>.

经验表明，“全球南方”国家应结合自身国情，独立自主探索一条适合本国发展的现代化道路。很多“全球南方”国家的政策制定者高度认同中国式现代化的借鉴意义，通过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和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等多种途径推进本国现代化进程。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打破了西方国家对现代化理论和道路的禁锢，意味着“全球南方”有能力摆脱西方资本和外部政治势力的干涉，追求自主的发展道路，制定自主的发展计划，打造自主的政治模式。

（三）“全球南方”的国际地位提升

长期以来，“全球南方”被视为国际事务中的次要角色，或只是地缘政治危机和大国博弈加剧时的“棋子”。随着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并在全球事务中发挥日趋重要的作用，西方国家越来越侧重于从整体视角看待“全球南方”问题，并寻求与之开展合作。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主编拉维·阿格拉瓦尔（Ravi Agrawal）撰文称，从气候谈判到体育再到外交，“全球南方”国家都越来越引人注目，也越来越有影响力。^[1]2023年2月，慕尼黑安全会议设置“南北合作”专场讨论，会上公布的《2023年慕尼黑安全报告》重点关注了“全球南方”议题，50余次提及“全球南方”一词。^[2]5月举行的七国集团广岛峰会将加强同“全球南方”合作作为会议重要议题之一，并邀请巴西、印度、印尼（东盟轮值主席国）、越南、科摩罗联盟（非盟轮值主席国）、库克群岛等“全球南方”国家作为对话伙伴与会，提出在贸易、供应链弹性、外交和安全政策等领域加强以七国集团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与“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的联系。

乌克兰危机以来的事实证明，美国试图通过施压或胁迫使“全球南方”站在西方一边的效果微乎其微。自联合国大会对乌克兰危机的第一次投票以来，发达国家与“全球南方”围绕是否将特定国家排除在联合国及其下属机

[1] Ravi Agrawal, “Why the World Feels Different in 2023,” *Foreign Policy*, January 12, 2023.

[2] Tobias Bunde et al., *Munich Security Report 2023: Revision*, February 2023, <https://securityconference.org/publikationen/munich-security-report-2023/>.

构之外等问题产生了明显分歧和争论。2022年3月，当联大召开特别紧急会议就一项谴责俄罗斯的决议进行投票时，有37个“全球南方”国家表示反对或弃权。同年4月，当联大就一项暂停俄罗斯人权理事会成员资格的决议进行投票时，反对或弃权的国家增加到82个，其中包括中国、印度、巴西、印尼、南非等主要“全球南方”国家。此外，“全球南方”国家很少参与联合国安理会授权之外的惩罚行动，即便是作为北约成员国的土耳其，也明确拒绝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或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这与美西方国家单方面发起针对俄罗斯的经济战形成鲜明对比，也意味着越来越多“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上不再附和西方国家的霸权霸道霸凌行径，而是本着客观公正的态度和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独立自主地表达自身立场。非西方世界将不再接受“被排除在全球决策之外”^[1]。

二、世界格局演变中的“全球南方”新角色

冷战时期，参与“不结盟运动”的国家曾试图在美苏两极之间保持中立，但在美苏霸权的施压下，很多国家不得不在两个阵营之间做出选择。随着“全球南方”在经济、政治和国际地位等方面的崛起，越来越多“全球南方”国家相信，卷入所谓“民主对抗威权”的意识形态之争没有任何好处，因此拒绝在大国对抗中选边站队。“全球南方”的复兴反映了当代地缘政治的发展态势，美国也将其视为挑战，并难以找到全面的应对之策。^[2] 在世界格局深度调整和变革进程中，“全球南方”作为一种国际力量，扮演了日益重要的角色。

[1] Andrew Sheng and Xiao Geng, “The Irresistible Rise of the Rest,” Project Syndicate, July 26, 2023,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china-india-surpass-us-gdp-great-power-competition-by-andrew-sheng-and-xiao-geng-2023-07>.

[2] James Jay Carafano, “America’s Response to the Global South,” GIS Reports, August 3, 2023, <https://www.gisreportsonline.com/r/global-south-united-states/>.

（一）多极世界格局的平衡手

从综合国力的对比变化来看，世界格局多极化趋势日趋明显。一些发达国家为维护自身优势地位，毫不掩饰发动一场“新冷战”的想法，并试图拉拢“全球南方”以便在地缘竞争中取得优势甚至“胜利”。历史表明，冷战时期的两极对抗会给“全球南方”带来巨大的安全风险，而冷战结束后的单极霸权同样会损害“全球南方”的权利和利益。因此，“全球南方”更倾向于构建一个能给自身带来不同战略选项的多极世界。“全球南方”反对加入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等国的制裁与打压，而寻求在大国之间构建灵活、平等的伙伴关系。例如，在经贸、卫生、气候等发展议程上，印度反对从美欧发达国家角度制定规则，主张团结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共同推动公正民主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与此同时，印度又积极迎合美、日等国推出的“印太战略”，强化自身与西方国家在政治安全领域的捆绑。

在越来越多的国际事务上，“全球南方”在平衡大国博弈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例如，在乌克兰危机上，即便在加入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后与“全球北方”关系愈发密切，印度仍不愿对俄罗斯采取外交和经济制裁。巴西、南非、印尼、巴基斯坦、墨西哥和阿根廷等“全球南方”国家也采取了平衡稳健立场，认为乌克兰危机属于欧洲的问题，而非世界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全球南方”采取的平衡稳健立场与外交中立并不完全一致。外交中立意味着不采取立场，在政治上与大国保持等距；平衡稳健立场则代表了积极、有活力和建设性的对外政策。中国、巴西、南非、沙特等“全球南方”国家或提出与西方立场迥异的和平方案，或往返于俄罗斯、乌克兰之间劝和促谈。2023年2月，在全世界纪念乌克兰危机一周年之际，南非坚持在本国夸祖鲁—纳塔尔省海岸与俄罗斯、中国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在全球舞台上展现了不屈服于西方霸权的立场。

除了乌克兰危机外，“全球南方”在其他国际事务上的自主性也在上升。在安全领域，2023年3月中国斡旋伊朗和沙特恢复外交关系以后，中东地区国家的对话协商进程出现连锁反应，卡塔尔同巴林、土耳其同埃及、伊朗同

阿联酋、叙利亚同阿联酋等双边关系得以恢复或改善，也门局势也出现了一定转机，自西方国家鼓动“阿拉伯之春”以来的地区乱局逐步得到扭转。在经济领域，尽管面临来自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压力和警告，绝大多数“全球南方”国家仍根据本国发展利益考虑选择合作伙伴，深化经贸往来和产业链合作。在外交领域，印度借机举行“全球南方之声峰会”，积极响应发展中国家的意愿和诉求，以便在自己作为主席国的二十国集团（G20）峰会上表达“全球南方”的声音，进而展示自身在“全球南方”的引领作用。^[1]

（二）多维世界格局的博弈者

从不同领域的功能作用来看，世界格局是复杂多维的，拥有某一领域优势的国家或国家集团也会成为重要的国际力量。在各国高度相互依存的世界中，衡量国家力量和影响的维度更加全面立体。这为综合国力相对较弱但某一领域优势突出的小国成为国际博弈的重要参与者提供了可能。

由于资源禀赋有限，“全球南方”国家往往选择本国的优势领域，重点塑造小范围、专业性的利基（niche）。^[2]在原料生产方面，印尼拥有全球22%的镍储量，智利拥有世界26%锂储量，刚果民主共和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钴矿床。锂、镍、钴是生产电动汽车、新能源电池等产品所必需的矿产，印尼、智利、刚果民主共和国因此成为全球供应链的关键环节。在生产加工方面，越南、菲律宾、孟加拉国等东南亚、南亚国家在全球贸易中具备明显的劳动力优势，能够以较低成本生产和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从而吸引众多跨国企业在其境内设立生产基地。当然，也有部分实力较强的中等强国兼具多种利基，如沙特阿拉伯是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的领导国，同时在世界宗教事务中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巴西是全球矿产资源的主要生产地，同时又以亚马逊雨林保护为抓手引领气候减排和生态保护合作。

[1] 沈陈：《新兴大国对“全球南方”的政策立场与行动》，《世界知识》2023年第12期，第19-22页。

[2] “利基”一词来自商业术语，即通过更窄地确定某个群体，从中构建一个细分市场并作为获取利益的基础，进而用专业化经营来获取最大限度的收益。

在多维世界格局中，利基是“全球南方”在其中拥有话语权和影响力的关键。与西方大国不同，“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非常有限，与自身实力很不匹配，而只在其具备优势、资源集中的利基上发挥影响力。这种依托各自优势资源的外交模式被称作“利基外交”（niche diplomacy）。保加利亚自由战略中心主任伊万·克勒斯特夫（Ivan Krastev）认为，大国对立在给那些处于中间地带的中等强国带来威胁的同时也提供了机会，“美国和中国必须管理一个被中等强国行动主义重塑的世界”。^[1]当前的地缘政治竞争使“全球南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更多能动性，它们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利用利基优势在全球追求自己的利益和价值观。例如，尽管石油减产可能会加剧发达国家严峻的通胀问题，并被美国视为在乌克兰危机中“站在俄罗斯一边”，但沙特主导的OPEC仍顶住压力，在2022—2023年多次与俄罗斯做出联合减产的决定。再如，2023年召开的七国集团峰会推出所谓“关键矿产俱乐部”，将印尼、土耳其、秘鲁等资源丰富的“全球南方”国家作为重点争取的对象，客观上提升了这些国家在全球供应链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三）多元世界格局的指示器

从价值理念的发展演进来看，世界格局是多元文明与文化的共存，并且全球价值体系呈现出多元化趋势。“全球南方”的崛起则是这一趋势的重要指示和代表。从冷战时期开始，“全球南方”国家就有意识地塑造不同于美国和苏联的价值体系，主张平等性和包容性，反对一元化和普世性。万隆会议是历史上首次由亚非国家自主组织和召开的会议，反映了亚非国家掌握自己命运、与世界其他国家平等合作的愿望。中国、印尼、印度等发展中大国在万隆会议发挥了引领议程和凝聚共识的作用，不仅提出“求同存异”这一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交往方式，还成功将中印等国共同坚持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纳入“万隆十项原则”，开启了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南南合作框架。在

[1] Ivan Krastev, “Middle Powers Are Reshaping Geopolitics,” *Financial Times*, November 18, 2022.

此框架下，“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的合作不仅取决于发起国的意愿和努力，更取决于东道国如何利用这种合作来满足其国内需求，从而为“全球南方”国家在资源、产业和技术等方面的平等包容合作打下基础。

与20世纪的南南合作相比，“全球南方”国家明显减少了带有反西方色彩的激进意识形态话语或规范，而是从自身利益和需要出发提出不同于发达国家的国际议程，并且逐渐拥有将这些议程变为现实的意愿和能力。在南南合作方面，阿根廷、印尼、伊朗、埃及、墨西哥、尼日利亚、巴基斯坦等20多个国家表示有兴趣成为金砖国家正式成员，沙特、阿尔及利亚等国申请加入金砖国家开发性金融机构新开发银行。随着越来越多的“全球南方”国家的加入，金砖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影响力日益上升。在南北对话方面，“全球南方”积极追求全球治理过程的多元性，推动“真正的多边主义”。例如，一些拉美国家提出“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不仅适用于穷国、弱国或债务国，也应适用于富国、强国和债权国，以此让IMF中的发达国家信守承诺。^[1]总之，“全球南方”的崛起意味着多元力量的崛起，更是多元文明和价值观共存的标志。

三、“全球南方”推动世界格局演变的制约因素

随着“全球南方”的全方位崛起和自主性提升，世界格局的主要矛盾绝非所谓“民主对抗威权”的意识形态之争，而是发达国家与“全球南方”之间的利益与立场分歧。同时，“全球南方”仍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在西方话语的塑造下，可能成为分化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武器。因此，“全球南方”要在未来世界格局演变发挥更加重要作用仍面临很多现实挑战。总体来看，“全球南方”主要面临外部干扰过大与抗干扰能力不足、力量整合需求上升与机

[1] J. Luis Rodriguez and Christy Thornton,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the Global South: A View from Latin America,”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35, No.5, 2022, pp.626-638.

制化平台缺乏、维护共同利益与满足诉求多样化三个方面的矛盾。这也是“全球南方”推动世界格局演变的主要制约因素。

（一）外部干扰过大与抗干扰能力不足的矛盾

在国际舞台上，发展始终是“全球南方”的核心诉求。然而，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全球南方”总体上同主要发达国家形成了不对称依赖关系，凸显了“全球南方”发展的脆弱性。近期，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的加息举措也给“全球南方”带来很大冲击。联合国贸发会议发表的《2022 贸易与发展报告》估计，约 90 个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对美元贬值，其中超过三分之一的国家贬值超过 10%。^[1] 加上近期全球食物和能源等必需品价格飙升，导致发展中国家进口价格进一步上涨。虽然现有 46 个最不发达国家的出口基础有所巩固、出口额有所增长，但其中多达 38 个国家仍然依赖商品出口，60% 以上的商品出口依赖初级商品，对大宗商品出口的高度依赖使这些国家极易受到贸易冲击。自 2011 年以来，最不发达国家在世界货物和服务出口中的份额一直徘徊在 1% 左右，到 2020 年在全球出口中所占份额比 2011 年翻一番（2%）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未能实现。^[2] 虽然在供应链的关键环节，部分“全球南方”国家具有竞争优势，使其可以利用自身资源禀赋获得一定的地缘政治重要性。但是，这种地位提升主要来自发达国家的需求，很大程度上是外生的，缺乏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足够能力。

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最贫穷的群体承受了疫情最沉重的代价，最贫穷的 40% 人口平均损失 4% 的收入，是收入分配中最富有的 20% 人口平均损失的两倍，全球不平等现象几十年来首次加剧。^[3] 乌克兰危机对粮食等大宗商品的供应构成挑战，“全球南方”亦是主要受害方。联合国发布的《2023 年世

[1] UNCTAD, *Trade and Development Report 2022*, Geneva: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2023, p.46.

[2] UNCTAD, “Trade in Goods and Services in Developing Economies and LDCs Reached a Record Level in 2022,” October 11, 2022, <https://sdgpulse.unctad.org/trade-developing-economies/>.

[3] World Bank, “Poverty and Shared Prosperity 2020: Reversals of Fortune,” October 7, 2020, <https://www.worldbank.org/en/publication/poverty-and-shared-prosperity-2020>.

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指出,2022年全世界有6.91亿至7.83亿人面临饥饿,西亚、加勒比和非洲各次区域的饥饿水平仍在攀升。非洲大陆首当其冲,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人食不果腹,饥饿人口比例是全球平均的两倍多。^[1]2022年11月,国际粮农组织发布的一份题为《应对乌克兰危机:利用社会保护促进粮食安全和营养》的研究报告指出,如果乌克兰危机持续下去,2022—2023年全球营养不足人数可能会增加800万至1300万,其中亚太地区的增长最为明显,其次是撒哈拉以南非洲、近东和北非。^[2]总体来看,“全球南方”对外依赖的不对称性仍很突出,抗击外部影响与冲击的能力仍很有限,塑造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内生动力的任务仍很艰巨。

(二) 力量整合需求上升与机制化平台缺乏的矛盾

从内部看,“全球南方”不是一个国际组织或政治集团,也没有明确的成员构成,不足以将松散力量凝聚成统一的机制化平台。^[3]不结盟运动、77国集团等冷战时期的南南合作多是非正式的对话平台,并未形成目标明确、规则健全、行动高效的机制或机构。由于“全球南方”国家众多,彼此之间的价值观念不同、发展水平各异,各方除了就发展等原则问题达成指导性决议外,在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WTO)等国际组织内部缺乏稳固的立场协调机制。为整合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的力量,金砖机制应运而生。金砖机制的成立以及“金砖+”合作的持续推进,为提升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的国际话语权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提供了重要平台。包含主要“全球南方”国家的G20机制等多边平台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加强“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的政策协调提供了渠道。但是,作为一个整体,“全球南方”仍缺乏有效的机制依托,在世界格局演进中的影响力因此难以得到

[1] FAO, “The State of Food Security and Nutrition in the World 2023,” August 3, 2023, <https://www.fao.org/documents/card/en/c/cc3017en>.

[2] FAO, “Response to the Ukraine Crisis: Social Protection for Food Security and Nutrition,” April 7, 2022, <https://www.fao.org/3/cc3321en/cc3321en.pdf>.

[3] 徐秀军:《“全球南方”热潮的缘起与影响》,《世界知识》2023年第12期,第14-16页。

有效发挥。

从外部看，冷战后的全球治理机制主要按照发达国家的价值和利益取向设计的，对“全球南方”的多样化背景和需求考虑不足，发展中国家的力量优势分散于不同的功能领域，难以形成有效的集体行动。由于全球治理机制固有的非中性，治理规则制定权常常集中在少数发达国家手中，发展中国家的实力提升难以转化为与其实力相匹配的制度性话语权。此外，发展中国家的治理能力和经验相对薄弱，在全球决策机制中的参与度较低，限制了它们在全球治理中的发言权和影响力。即便是国际地位明显上升的新兴经济体也常常只能对现有的多边机制进行选择，使其能够灵活介入关键的尤其是经济领域的制度，但在对国家利益并非至关重要的领域仍然是旁观者。^[1]在经济全球化与国家现代化进程相互叠加的背景下，“全球南方”国家业已存在的背景差异、利益竞争与机制缺失被放大，“全球南方”的力量整合面临更多障碍因素。

（三）维护共同利益与满足诉求多样化的矛盾

“全球南方”是一个有着共同利益但彼此诉求多样化的群体，彼此的利益在很多领域存在差异和分歧，甚至存在竞争和冲突。例如，在推动全球能源转型和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构建清洁美丽的世界是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符合“全球南方”国家利益，但在具体目标与标准设定、风险与责任分担等问题上，“全球南方”因立场分歧较大而无法达成共识，更难以形成一致行动。对经济发展高度依赖传统能源并且新能源技术相对落后的国家来说，激进的能源转型将给其发展进程带来负面影响。无论是传统能源的出口大国还是消费大国，在没有合适替代选择的情况下，放弃传统能源无疑将直接损害其发展权。但是，对生态环境脆弱、海拔较低的国家而言，加快世界能源转型和大幅减少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却是当务之急。如果全球气温继续上升，海平面

[1] Charalampos Efstathopoulos, “Southern Middle Powers and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the Options for Brazil and South Africa,”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76, No.3, pp.384-403.

将进一步抬升，一些地区的民众将失去栖身之地，部分小岛屿国家甚至可能被完全淹没。

自万隆会议以来，“全球南方”国家就在国际场合积极发出共同声音，维护共同利益，并以南南合作促进南北合作，以分享和借鉴经验、技术和资源，争取更多的发展援助和国际支持。但随着“全球南方”国家自主性和外交独立性的提升，其作为一个群体的内部利益诉求也日益多样化。由于群体内部成员多样化和外部势力的拉拢，“全球南方”的共同命运意识和群体归属感仍不强烈，“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仍有待增强。截至目前，“全球南方”尚未出台或商讨统一的立场文件，短期内难以提出类似于“万隆精神”的“全球南方”普遍价值，从而为维护共同利益奠定共同的理念基础。同时，“全球南方”缺乏协调不同利益诉求和实现共同利益的行动纲领，从而使彼此之间的客观差异成为认知与强化共同利益的羁绊。日益凸显的多样化诉求如果长期得不到有效协调和有机融合，“全球南方”塑造未来世界格局的力量将遭受削弱，甚至会有一定条件下形成内耗。

四、结语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全球南方”的全方位崛起大大加速。在经济方面，“全球南方”通过经济改革和开放政策的推进，在全球产业链重构中逐渐崭露头角，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全球南方”经济的快速增长扩大不仅改变了世界经贸格局，也有力推动了多极化进程的发展。在政治和外交方面，“全球南方”积极提出应对地缘冲突和全球问题的治理方案，拒绝卷入非此即彼的意识形态之争。尤其是“全球南方”对乌克兰危机的立场，超越了置身事外的外交中立和盲目跟风的外交追随，体现出一种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政治觉醒，成为其全方位崛起的重要表现。

中国是“全球南方”的当然成员。中国同绝大多数“全球南方”国家一样，遭受过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压迫，充分理解与认同探索独立自主发展道路

的重要意义。这种“天然的亲切感”长期沿袭，成为众多发展中国家认同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基础。2023年7月，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的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上中方提出，独立自主是“全球南方”的政治底色，发展振兴是“全球南方”的历史使命，公道正义是“全球南方”的共同主张。^[1]中方的立场和主张为凝聚“全球南方”合力增加了积极因素，并推动“全球南方”热潮朝着正确方向演进。

中国提出并推动落实“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等重大国际合作倡议，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全球南方”发展的内生动力、提供了“全球南方”合作的机制平台、维护了“全球南方”的实际利益，得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积极支持和响应。中国过去是南南合作的参与者和引领者，未来将继续把“全球南方”作为外交战略、知识转移、资源配置和制度建设的优先方向，不断为“全球南方”的发展与合作注入强大动力，从而推动“全球南方”成为未来世界格局更加重要的力量。

【责任编辑：宁团辉】

[1] 《王毅就加强“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提出四点主张》，新华网，2023年7月26日，http://www.news.cn/politics/leaders/2023-07/26/c_1129768124.htm。

新一代通用人工智能对国际关系的 影响探究

□ 余南平

〔提 要〕以 ChatGPT 为代表的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的突破，预示了 AGI 时代的开启。与以往“数据主义”时代讨论的弱人工智能技术对国际关系影响所不同的是，AGI 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单纯的“赋能”和“使能”工具，AGI 技术推动的人机融合，将对社会政治经济各领域进行快速与深刻的嵌入，迅速有效地改变社会生产方式，重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并通过对国家综合能力的改造来影响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同时也使全球治理出现新难题。认识新一代 AGI 的技术质变对未来国际关系变化的影响，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技术想象与空泛的技术描述，AGI 驱动的生产力底层变革，必将对国际关系产生与以往不同的颠覆性重构。

〔关键词〕ChatGPT、通用人工智能、技术自创生、国际关系

〔作者简介〕余南平，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中图分类号〕TP18；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2 8832（2023）4 期 0079-18

当下，从国际政治角度看，地缘政治危机、大国博弈加剧深刻影响着国际关系；从国际经济角度看，全球价值链重构、能源与粮食安全隐忧增加，使得全球治理困境凸显。而就在上层建筑的国际关系出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时，在全球经济基础的底层端也正在兴起一场新的历史性技术革命，其中以 ChatGPT 为代表的新一代人工智能时代开启，预示着通用人工智能（AGI）技术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快速介入人类社会政治经济舞台，必将通过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变革方式作用于国际关系未来的深层次演变。^[1]同时，更为重要和必须关注的是，当下以 ChatGPT 大模型为代表的 AGI “技术奇点”到来，^[2]与以往学术讨论中的人工智能对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影响有什么不同？新一代 AGI 又在何种程度上，以何种范式和路径改变和重塑未来的国际关系，并对全球治理产生怎样的影响？

一、新一代通用人工智能的特征

国际关系领域对人工智能影响的讨论与研究虽然不是主流，但也产生了相对丰富的成果。这些既有成果从人工智能发展阶段的视角来看，其研究基

[1] 2017 年国务院印发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的通知》指出，人工智能发展进入新阶段。经过 60 多年的演进，特别是在移动互联网、大数据、超级计算、传感网、脑科学等新理论新技术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强烈需求的共同驱动下，人工智能加速发展呈现出深度学习、跨界融合、人机协同、群智开放、自主操控等新特征。具体参见《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中国政府网，2017 年 7 月 8 日，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7-07/20/content_5211996.htm；2020 年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等五部委印发的《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标准体系建设指南》详尽列举了人工智能标准体系框架、关键领域技术、关键通用技术。具体参见《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标准体系建设指南》，中国政府网，2022 年 7 月 27 日，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08/09/content_5533454.htm。

[2] 本文将当下出现的 ChatGPT 大模型归类为通用人工智能 AGI，为了写作简便，在文中会直接使用 AGI 替代。需要指出的是：在学界有看法将人工智能发展阶段分为弱人工智能（Artificial Narrow Intelligence，简称 ANI）、通用人工智能（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 简称 AGI）和超级人工智能（Artificial Superintelligence 简称 ASI）三个等级。2023 年 4 月 28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会议新闻稿，首次出现和使用“通用人工智能”术语。参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人民日报》2023 年 4 月 29 日。关于 AGI 的历史发展与定义解释可见 MIT 技术评论文章：Will Douglas Heaven, “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 Are We Close, and Does It even Make Sense to Try?,” MIT Technology Review, October 15, 2020, <https://www.technologyreview.com/2020/10/15/1010461/artificial-general-intelligence-robots-ai-agi-deepmind-google-openai/>。

本是站在弱人工智能的角度，并以“数据主义”为出发点进行研究和分析。^[1]而探究 AGI 产生的颠覆与不同，不仅需要从人工智能发展的历史，还需要从技术本身的自创生引发的变化予以重新界定与思考。

（一）新一代通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由来

1956 年著名的达特茅斯会议揭开了人工智能的序幕。在约翰·麦卡锡（John McCarthy）等人的学术讨论会后，人工智能技术研究正式开启并呈现波折的发展历程。^[2]

20 世纪 50 至 70 年代是人工智能的黄金时代。在此期间，大量的计算机科学、生理学、心理学、哲学学科汇聚在人工智能开发旗下，人工智能成为一门前瞻性重要交叉学科。在这个具有启蒙意义的时期，主要产生了两个人工智能学派：符号主义（Symbolicism）和联结主义（Connectionism）。前者旨在使用显式的公理和逻辑体系构建和模仿人类思维；后者旨在模仿人类大脑结构，以仿生的方式用数学模型模拟神经元的连接机制。值得注意的是，在人工智能这个发展周期中，美国能源部阿贡国家实验室、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研究局（DARPA）在不同程度上分别参与和资助人工智能技术研发。^[3]

[1] 国内外学界对既有的人工智能对国际关系产生的影响进行了较为广泛的研究，选择代表性文献，国内研究可参见封帅：《人工智能时代的国际关系：走向变革且不平等的世界》，《外交评论》2018 年第 1 期，第 128-156 页；余南平：《人工智能革命背景下的大国博弈——以全球价值链的结构变化为分析视角》，《国际关系研究》2020 年第 1 期，第 3-25 页；部彦君、许开轶：《重塑与介入：人工智能技术对国际权力结构的影响作用探析》，《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23 年第 1 期，第 86-111 页。国外相关研究可参见 Michael C. Horowitz,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Bolt, Paul J., Damon V. Coletta, and Collins G. Shackelford, eds., *American Defense Policy*, JHU Press, 2018; Nicolas Mialhe, “The Geopolitic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 Return of Empires?,” *politique étrangère*, Vol.3, 2018, pp.105-117; Marry L. Cummings et al., e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Disruption Anticipated,” Chatham House, 2018, <https://www.chathamhouse.org/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research/2018-06-14-artificial-intelligence-international-affairs-cummings-roff-cukier-parakilas-bryce.pdf>。值得指出的是，在既有研究中，2022 年吉林大学学位论文作者刘冠霖明确提出“弱人工智能”技术对国际关系的影响问题，参见刘冠霖：《弱人工智能技术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吉林大学 2022 年硕士学位论文；2023 年高奇琦、张颖文在 ChatGPT 出现对全球安全影响的论述中也讨论了弱人工智能与强人工智能问题，参见高奇琦、张颖文：《主体弥散化与主体责任的终结：ChatGPT 对全球安全实践的影响》，《国际安全研究》2023 年第 3 期，第 3-27 页。

[2] 约翰·马尔科夫：《人工智能简史》，郭雪译，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

[3] 尼克：《人工智能简史》，人民邮电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1-60 页。

20 世纪 70 至 80 年代是人工智能的第一次低谷期。基于感知器的逻辑体系构建，人工智能研究者们渐渐发现单层感知器无法处理异或逻辑，而高维非线性网络又缺乏有效的训练算法，当时的存储和运算能力无法处理复杂性的计算。随着时间推移，技术上的停滞以及之前过于乐观的想法消失，使得关于人工智能的研究逐渐趋于平静，各界对相关领域的研究资金投入也逐步停止。

1980 至 1987 年是人工智能的第二次发展高潮期，标志性事件是 1981 年日本通产省拨款 8.5 亿美元支持第五代计算机项目。同时，约翰·霍普菲尔德等人重新发展了神经网络理论，人工智能开发不仅从最初的逻辑策略构建转向对具体问题的探索，逐步从理论研究走向实际应用。同时，人工智能在日本政府投入和美国 DARPA 项目重启中再次迎来了大繁荣周期。

1987 至 1993 年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寒冬期。在这个周期内，由于商业机构未能现实看到人工智能技术解决实际问题，投资热度明显下降。同时，日本的第五代计算机开发失败，包括美国 DARPA 投资转向等诸多因素叠加，使得人工智能开发面对寒冬周期。

1997 年至今是人工智能的新发展长周期。1997 年 IBM “深蓝” 战胜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开启了人工智能发展新周期。越来越多的人工智能研究者开始开发和使用数学工具，并向“简约化”发展。人工智能在产业界开始发挥重要的作用是新发展长周期重要特征，同时，海量的数据支撑，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信息技术的突破，大幅缩短了理论科学研究与实际应用之间的技术鸿沟。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自 2021 年开始，人工智能开发转向机器学习(Machine Learning)，尤其是深度学习(Deep Learning)领域的探索为人工智能发展开辟了新方向。^[1] 特别是，自 2006 年杰弗里·辛顿(Geoffrey Hinton)和他的学生提出降维和逐层预训练方法，使得深度学习实用化成为可能。而辛顿、

[1] 自 2001 年起围绕大数据分析进行的人工智能开始展开，而 2021 年深度学习开始成为主流人工智能研究方向，具体论述可参见斯图尔特·罗素：《人工智能现代方法》，张雅博等译，人民邮电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23-24 页。

约书亚(Yoshua Bengio)、杨立昆(Yann LeCun)三人同时获得2018年图灵奖,标志着卷积神经网络技术支持的大模型开发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二) 新一代通用人工智能为何与以往不同

技术发展对国际关系和国际权力的塑造与重构,完全呈现于国际关系史之中。正如前三次产业革命历史进程中对应的“霸权国家”历史更替所证。如果把上述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迭代成果同样视为一种“技术权力更替”的话,那么当下 AGI 则是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技术形式进行了质的跳跃,并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快速重塑而引发聚变,进而影响到作为上层建筑的国际关系。

首先,AGI 突出的特征是以大模型技术(Transformer)为底层技术,通过连接大量的语料库来训练模型,并在超级复杂的模型之下进行深度学习,继而以强大的自主迭代能力、自主学习和创新能力方式进行了颠覆性技术方式呈现,产生了某种真正意义上的 AGI 范式下的“人机互动”模式。^[1]目前,AGI 正以多模态的形式快速地介入了人类经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虽然目前学界尚未有 AGI 是否已经完全开启第四次产业革命的定论,但可以预见的是,AGI 技术的多模态组合,自我快速迭代与人机融合空间拓展,使之与既往认知和讨论过的人工智能技术完全不同。传统基于“数据主义”的技术被动模式将不复存在,对应地,AGI 对人类社会包括对国际关系的长远深刻影响也会以一种完全不同的另类形式呈现。^[2]

其次,与过往所讨论的人工智能概念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AGI 的自主性明显加强,迭代性显著加快,特别是其在人机互动、人机融合过程中产生的自我意识生成和反噬能力已经开始显现。在传统的弱人工智能技术语境和技术条件下,“数据”和“数字”可以作为新生产要素,但其价值仅是人类的工具性使用。AGI 则完全不同,其本身是通过数据集进行标识和训练,在与人类的人机互动过程中,包括人类大量的“投喂数据”过程中,机器会产

[1] 对于 Transformer 模型的介绍,可参见姚期智主编:《人工智能》,清华大学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184-189 页。

[2] 关于人工智能与国际关系理论的探讨可见 2023 年最新出版的学术专著: Bhaso Ndzenzde Tshilidzi Marwala,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23。

生独立的自我判断和分析，并通过强大的逻辑能力反射影响人机对话者的思维和判断，产生了强大的“机器自我溢出”。因而，从某种意义上看，AGI 与以往各种人类发明的技术所不同的是，既有技术主要是通过生产力改造而影响社会，但 AGI 则出现了“机器思维反馈”主动塑造生产关系。因此，AGI 是对弱人工智能“数据主义”范式的彻底颠覆，其必定在技术自创生实践中影响和颠覆人类已知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继而影响到国际关系。

再次，在既有的国家、社会、公民个体构造中，技术通常作为一种无意识的生产工具而在被动地被使用。而 AGI 在叠加既有已经形成的数字经济基础后，其本身可以作为独立的“第四者”介入国家、社会、公民生活的各个领域，进而形成复杂的结构而产生新的“纠缠”变化。^[1] 这种变化不仅反映在国家治理能力快速提升之中。^[2] 同时，还体现在 AGI 作为新的另类国际社会行为体，可以通过不停顿、全覆盖的“人机互动”模式，传播知识、信息，包括隐性之中塑造意识形态。与传统互联网模式下的国际传播所不同的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 Generated Content, AIGC）模式的出现，放大了特定国家的国际影响力，进而也产生了 AGI 时代特有的新型国际权力。

最后，AGI 本质上是技术推动的生产力和生产体系重构。掌握 AGI 的国家可以无限制、指数级别地发挥技术产生的“收益递增”效应，通过产业演化和场景应用扩大，全面和快速地提升全社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包括构建自循环的不依赖于外部要素的生产体系。^[3] AGI 技术强国可以采用真正

[1] 关于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对经济社会，包括人类发展本身带来的影响讨论，可参见迈克斯·泰格马克：《人工智能时代：生而为人的意义》，汪捷舒译，浙江教育出版社 2023 年版。

[2] 大卫·瓦莱-克鲁兹（David Valle-Cruz）通过研究指出，人工智能技术能够通过动态分析模型提出解决方案，在国家公共管理、灾害预防和响应、决策制定等领域发挥作用，具体可参见 David Valle-Cruz et al., “A Review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Government and Its Potential from a Public Policy Perspective,” *Proceedings of the 20th Annual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Digital Government Research*, 2019.

[3] 2023 年 3 月 27 日，投资银行高盛公司经济学家发布最新报告认为，未来生成式 AI 与人类的产出将很难区分，这将进一步提振全要素生产率，在未来 10 年间，全球 GDP 每年将提高 7%。具体可参见 James Pethokoukis, “Why Generative AI Could Have a Huge Impact on Economic Growth and Productivity,” *The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March 27, 2023, <https://www.aei.org/articles/why-goldman-sachs-thinks-generative-ai-could-have-a-huge-impact-on-economic-growth-and-productivity/>.

意义上的“机器劳动”模式，更全面地取代现有生产体系中人的劳动力，在解决人口红利和人口质量中，最大程度上解放与创造新生产力。而这种生产力“技术跨代际”的进步对国家竞争力底层能力和颠覆性塑造，既可以解决国家经济发展周期平抑难题，也可以改变经济发展和经济循环的范式。因此，国家通过 AGI 技术“跨代际差”而获得的压倒性经济和技术优势，必然直接反映国际权力结构变化层面，继而引发国家间的关系重塑和再调整。

二、对国家能力和力量的重塑

技术作用与影响国际关系的方式并不是在通常国际关系讨论的上层建筑层面发生的。ChatGPT 对于“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如何对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产生影响”的问题回答，可以给出启示，人工智能对国际关系的主要影响之一是国家间权力平衡的潜在转变。如果某个国家率先获得 AGI，它可能会对其他国家造成巨大的威胁和影响，改变世界地缘格局的方式包括政治和文化影响力、经济、社会、军事等领域的变化。因此，探讨 AGI 对国际关系重塑路径方式，必须回到国际关系中的行为主体和基本单元国家自身变化认识中，进而才能把握 AGI 对国家的国际行为能力重塑而产生的国际关系变化。^[1]

（一）国家的国际政治军事能力质变

国际社会历史进程与现实存在已经表明，国家行为体在国际层面的活动中存在着政治与军事的不可分割性，同时，历史业已证明且会继续证明，任何技术的创造或是源自于军事用途，或是其最终在某种形式上可能或可以被用于军事用途。从 AGI 用于军事，进而通过军事威慑力强化国家权力的角度看，AGI 在军事领域的应用，可以是增强人类士兵和武器系统的能力，也可

[1] 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阐释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互动关系来看，作为上层建筑存在的各种政治关系，包括国际关系固然能够影响国家的生产力发展，但本质上改变国际关系的核心动力依然是技术驱动的国家生产力进步。同时，国际关系构建的行为主体国家间不对称性权力的产生更是依赖于国家生产力变化的经济基础，研究国际关系变化不能离开国际关系的最基本单元国家。

以是开发自主决策和执行任务的自主武器系统。在目前已经开始和未来可能的应用中，在战术和战略分析层面，AGI 可以分析大量的战术和战略数据，帮助指挥官作出更加准确的决策。例如，它可以预测敌方部队的位置、规模和行动，为作战计划提供关键的情报。在无人机和自动化系统发挥层面，AGI 可以用于开发更加智能和自主的无人机和自动化系统。这些系统可以自主执行任务，例如侦察、侦测和攻击，减少了士兵的伤亡风险，提高了作战效率和精度。在智能武器和导弹系统运用层面，AGI 可以用于开发更加智能和自主的武器和导弹系统，例如，AGI 可以使导弹系统自主选择 and 攻击目标，而无需人类干预，在提高打击精度和速度的同时，还可以降低误伤风险。^[1] 因此，AGI 将使国家军事能力产生基于武器和作战能力的“代际差质变”，可以对其他军事体系产生“降维打击”能力，继而在国际政治上产生不可预测的威慑性。

（二）国家经济范式新创设下的国际竞争力重构

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包括国家间数字鸿沟存在，已经导致了国家间的经济范式和表现上产生的重大差异。而就 AGI 对国家经济范式的改变来看，可以预见的是 AGI 改写既有经济学范式的必然性出现。“技术本性”（technology-ness）也将在 AGI 技术自我迭代和强化中被进一步展现，而在 AGI 的推广和渗透中，经济本身将被重新域定。^[2] 这个“新域”更多不是表现为既有的核心技术联合而成，而是其将从一个新的现象簇中构建起来。其结果完全不同于历史上工业革命时代和冷战时代的国家全产业链模式，也不同于全球化下的全球价值链时代所展现的经济范式。AGI 可以通过生成式人

[1] 2020年7月美国兰德公司发布《现代战争中的联合全域指挥控制——识别和开发AI应用的分析框架》报告。该报告全面分析了AI对军事战争的影响和新模式塑造。报告具体可参见 Sherrill Lingel et al., “Joint All-Domain Command and Control for Modern Warfare: An Analytic Framework for Identifying and Develop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pplications,” RAND Corporation, January 1, 2020, https://www.rand.org/content/dam/rand/pubs/research_reports/RR4400/RR4408z1/RAND_RR4408z1.pdf.

[2] 具体可参见布莱恩·阿瑟：《复杂经济学》，贾拥民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10-213页。

工智能——脑机接口——人形机器人三者的组合而完成自我生产的闭环，进而产生强大的生产能力和自给自足可能。而掌握更先进 AGI 的国家不仅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劳动力、移民、资源不足等困扰问题，同时还可以形成“高维度”生产力辐射与控制全球生产、贸易网络体系。^[1]AGI 在改变国家自身的经济循环系统的同时，同时还改变着国家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包括控制和被控制关系。因此，AGI 对于既有经济范式的改变，在本质上是通过 AGI 对“旧生产场域”的嵌入与改造，新的“生产场域”构建与创新中完成，并在对经济范式改变和新创设中完成技术对经济的充分表达的同时，同步实现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全面重构。

（三）国家的国际金融权力强化与再塑造

国家在国际上的金融权力，特别是以“霸权货币”而表现的金融储备、支付，货币媒介能力是一个世界大国必须具有的，依托于经济基础的金融衍生构成。罗伯特·吉尔平引用金德尔伯格的霸权稳定论，对国际关系的国际政治经济学逻辑给出了相应的阐释。^[2]但吉尔平并没有预见的是，当下全球金融规模的急速膨胀与全球金融体系的深刻变化，已经使得金融作为国家对外的“溢价工具”功能得以充分实现，就如当下美联储货币政策变化对全球金融市场和他国货币政策产生的“辐射性与牵动性”影响那样。值得重视的是，当下数字技术领先国家已经实现了跨境支付、供应链金融、贸易金融、普惠金融等领域应用落地。构建发达的数字支付和结算体系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在被赋予了更多金融结构性权力的同时，技术和法规标准的差异也为不同支付系统和市场之间建造了隐形围栏。而人工智能则可以更进一步，在既有的数字金融发展基础上，AGI 可以帮助国家金融管理部门更精准地实施

[1] 2023 年 5 月 10 日，美国布鲁金斯基金会发布报告认为，通过 AGI 推广使用可以大幅提升劳动生产率，进而重塑经济形态。具体研究可参见 Martin Neil Baily, Erik Brynjolfsson and Anton Korinek, “Machines of Mind: The Case for an AI-powered Productivity Boom,” May 10, 2023, <https://www.brookings.edu/research/machines-of-mind-the-case-for-an-ai-powered-productivity-boom/>.

[2] 罗伯特·吉尔平：《全球政治经济学：解读国际经济秩序》，杨宇光、杨炯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0 年第 3 版，第 84-88 页。

货币政策，在准确判断全球金融市场风险和实时监控实体经济运行中，突破传统上对经济周期的滞后判断，继而可以进一步强化“霸权货币”权力属性。而这可以在眼下彭博（Bloomberg）开发的GPT大模型中看到端倪。^[1]可以相信，此类金融大模型的建立和完善必将使AGI以新方式全方位介入金融领域，并使国家金融权力的深化与扩张得到重新塑造。

（四）国家的国际传播力空前加强

与传统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技术政治互动，包括对信息安全影响所不同的是，当前AGI训练是依托于大模型、大数据集的红利，借助超强的数据和算法能力，能够实现“人机互动”交流模式，突破信息传输的时空限制。在AGI的模式下，AGI平台可以大量生成目标言论，模拟用户发言，并在用户基数庞大的互联网社交网络上进行舆论攻击。不仅如此，AGI技术还可以通过深度伪造技术编造信息，并辅以各种迷惑性材料，生成虚构事件和虚假信息，在技术操纵下对政治和社会信息的编造可以直接影响到政治态度。由机器海量生成、无法及时识别的恶意虚假信息的传播，极易煽动极端主义和对政治的质疑与不满，影响社会秩序稳定。因此，新一代AGI不仅具有一般政治意义上的影响能力，拥有强大AGI技术的国家，还可以为了自身国家利益传播、诱导、强化其国际合法性，进而获得更多的意识形态输出和话语权主导性掌控。因此，当AGI通过业已普及的互联网跃然于国际传播层面时，AGI优势技术国家的传播力、渗透力在被明显地加强和放大，由机器不间断产出的各种信息充斥于网络空间，并使人工信息被有效淹没和屏蔽，进而扩大了大国政治与意识形态博弈的新边疆。

三、引发国际关系新变革

人类社会历史进程表明，技术与政治互动性的一直存在和相互嵌入，使

[1] 彭博大模型涉及了500亿参数的语言大模型，基于彭博特有的数据集3630亿个标签，并具有全球市场、全方位的数据分析和生成功能。有关彭博GPT大模型的研究可参见Shijie Wu and Ozan Irsoy, “BloombergGPT: A Large Language Model for Finance,” *arXiv preprint arXiv:2303.17564*, 2023。

得技术的“中立性”一再被证伪。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属性，使得技术的两面性可以反复呈现，既可以将技术分享作为推进人类福祉的工具，也可以将技术作为遏制他国的战略武器与工具。这一点不仅在既有的国际关系历史中反复呈现，同时，AGI 时代则更会在技术跳跃不确定性中进一步推动国际关系未来新变革。

（一）推动非对称性国际权力极化

国际权力的非对称性已经是一个显见存在的客观事实。而技术所强化的国际权力非对称性，既在于“技术维度”差距带来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阶段不同，同时更在于对技术本身的信任构成了权力的来源基础。AGI 本质是技术的高集成，具有高门槛和高准入特点。AGI 可以通过算力和算法的融合设计连接物理世界和数字世界所有互动活动的强制性接口，其构建的底层技术基础设施将现实和数字社会置于其自身强加的逻辑之下。^[1] 突出地表现在，AGI 技术领先国家对技术、数据等资源的获取、加工、使用和产出结果之中。如 AGI 强国可以通过对算法和数据的垄断，直接决定未来“技术域”的进入准则和运行规则，并通过规模性投资人工智能相关技术的基础设施，提前锁定 AGI 的进入门槛。又如 AGI 技术领先国家科技巨头通过资本组合方式，就如 OpenAI 与微软公司不断深化合作那样，科技巨头可以获取潜在竞争对手更具战略价值的产品和技术，尽可能地减少仿效此类技术的竞争者数量，抑制他者创新，以资本与技术的叠加强化自身的垄断优势。必须认识到，AGI 本身也是具有一定闭合度的技术生态体系式构造，其体量宏大，其用户黏性和转换成本更高，这意味着强人工智能技术平台享有更强势的议价权，进一步强化人工智能技术领先国自身的数字化垄断。因此，AGI 的颠覆性和集成性，不仅塑造了 AGI 技术平台的技术性政治权力，并且空前突出和强化了其权力的非对称性，构造出新形式的数字权力和国际政治社会关系，而在这种关系

[1] 关于高科技企业技术与规则的强制性研究可参见余南平、栾心蔚：《元宇宙：从物理世界到数字世界的权力重构与挑战》，《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2 期，第 40-50 页。

构建和自我强化中，国家间非对称性国际权力将出现某种形式的“极化”。^[1]

（二）推动大国间技术竞争加剧

AGI 具有典型的“美第奇效应”，可以推动各类全新技术的随机组合与深度融合，这种技术交互性和融合性将引起从技术到内容、从硬件到软件全方位的技术和产业综合体的重构与再构，继而引发新一轮国际技术竞争。已经有西方学者明确提出，中国和俄罗斯正在通过发展人工智能技术来推进国家利益并试图“挑战”全球秩序，西方必须加速进行应对。^[2] 新美国安全中心（CNAS）2019年12月发布研究报告指出，美国人工智能发展的最大战略对手就是中国，并呼吁采取大胆的行动，确保美国在全球人工智能发展中的领先地位并消除潜在威胁。^[3] 进一步分析美国国家人工智能战略设计和近年来出台的各种法案与政策可以看到，美国俨然已经将人工智能技术开发与应用，视为确保美国未来全球领导力的关键性战略工具与手段。^[4] 而这势必强化人工智能技术的政治性和工具性在国际政治经济层面溢出，继而加剧技术大国间的竞争与博弈。^[5] 必须要看到的是，在国际层面，拥有强大AGI的国家，不仅可以通过技术改善和提升自身的经济技术竞争力，形成技术“高壁垒”

[1] 在2023年新出版的文献中，两位国际关系学者讨论了人工智能对国际权力改变和影响问题。具体可参见 Bhaso Ndzendze and Tshilidzi Marwala,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23, pp.16-17.

[2] Ahmed Shazeda et al., “AI, China, Russia, and the Global Order: Technological, Political, Global, and Creative Perspectives,” NSI, 2018.

[3] 具体报告可参见 Martijn Rasser and Megan Lamberth, “The American AI Century: A Blueprint for Action,” Centre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December 17, 2019, <https://www.cnas.org/publications/reports/the-american-ai-century-a-blueprint-for-action>.

[4] 2020年2月美国白宫发布《国家人工智能倡议年度报告》，2020年3月美国国会颁布《国家人工智能计划法案》，2021年1月美国国会通过《2021财年国防授权法》（夹带通过《2020年国家人工智能计划法》），2021年3月美国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最终报告》，2022年3月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启动人工智能 ITM 项目，2022年7月美国白宫科学技术政策办公室（OSTP）发布《人工智能权利法案》蓝图文件。

[5] 为了应对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带来的挑战并加快追赶步伐，欧盟于2020年出台了《欧盟人工智能白皮书》，2021年又出台了《欧盟人工智能法案建议稿》，具体文件可参见“White Paper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 European Approach to Excellence and Trust,” European Commission, February 19, 2020, https://commission.europa.eu/publications/white-paper-artificial-intelligence-european-approach-excellence-and-trust_en.

带来的“技术代差”而获得更多的价值链收益，同时，人工智能技术强国还可以通过 AGI 掌握网络空间的意识形态话语权。^[1] 对此，美国科学院院士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认为，中国是美国在全球人工智能技术竞赛中的主要竞争对手，美国必须要有选择地与中国脱钩，以保持美国经济和安全的全球领导优势。^[2] 2023 年 4 月新美国安全中心副董事长保罗·夏尔（Paul Scharre）在 ChatGPT 引发全球热潮后也公然宣称，美国必定会赢得与中国人工智能竞争的最终胜利。^[3] 而在这种符合美国利益的认识下，大国间围绕人工智能技术的竞争博弈肯定只会加剧。

（三）改变与重构全球地缘政治结构

在不同的技术时代，地缘政治结构与国家互动方式完全不同。航母的出现既是现代工业技术的产物，同时也是改变和重塑地缘政治的有力工具。互联网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的出现与改进，使得全球新生产网络体系以区域和跨区域的形式得以重新构建，并透过全球价值链和全球技术链不断进行组合和调整，并影响世界各国的地缘政治战略调整。^[4] 在当下的地缘政治结构中，现代技术跨越地理边界和打破区域空间，已经可以用“技术看不见的手”进行物理链接和远程输出。^[5] 而 AGI 所更为不同的是，在技术空间的拓展中，AGI 改变和颠覆的不是经济学视角中的“劳动力角色”本身，也不是全球生产分工体系经技术驱动而重新构造的问题，其本质上影响和改变的是传统地

[1] 2023 年 3 月 9 日，美国商会人工智能委员会发布报告，在描述新一代人工智能前景并建议建立监管框架时，更是提出并呼吁要最大限度地发挥人工智能的巨大潜在利益。报告可参见“Commission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ompetitiveness, Inclusion, and Innovation,” U.S. Chamber of Commerce, March 9, 2023, <https://www.uschamber.com/technology/artificial-intelligence-commission-report>.

[2] Eric Schmidt, “AI,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 National Security,” *Daedalus*, Vol. 151, No. 2, 2022, pp. 288-298.

[3] 文章可参见 Paul Scharre, “America Can Win the AI Race: It Has the Resources—Now It Needs a Plan,” *Foreign Affairs*, April 4, 2023,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ai-america-can-win-race>.

[4] 全球价值链和全球技术链组合推动全球生产网络重构研究可参见余南平：《全球价值链对国际权力的形塑及影响》，《中国社会科学》2022 年第 12 期。

[5] 在俄乌冲突过程中，可以清楚地目睹美国科技公司可以通过远程技术操作修补乌克兰信息系统漏洞，包括美国可以跨境远程向乌克兰提供全方位的情报和信息分析支持。

缘政治结构中重要地理边界和空间联系。^[1] AGI 技术强国可以无视维护传统国际关系所在乎的国家间顾忌（甚至可以发展到无顾忌），更加自我和独立地完成高效率内循环经济体系重构，并透过物质与非物质空间作用于地缘政治。^[2] 因此，当 AGI 技术主导和控制国家生产体系和经济基础重构发生，如果再叠加新能源技术发展突破以往的资源瓶颈的约束的话，那么全球地缘政治结构重构，无论未来以何种形式出现，其必然将不以现代国际政治的现实变化而到来。

（四）强化跨国公司的“技术私权”

目前，跨国公司全球化时代的全球价值链网络体系为支撑，通过产业链、价值链、技术链的整合，获得了空前增强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与结构塑造能力。全球数字化的广度和深度发展使得大型跨国科技公司崛起，催生了一种旨在数据提取和行为操纵的新的资本主义积累逻辑。^[3] 目前，数据生产、控制、不透明算法均由跨国科技公司技术平台掌控，技术平台掳获不对称性权力的快速提升已经是不可辩驳的事实。然而，由于人工智能所需技术、数据、算法门槛较普通数据生产流程门槛更高，其对技术平台的基础和能力提升也会进行一定的天然性筛选和选定。这意味着类似 ChatGPT 式的 AGI 本身并非一个开源和开放性的公共服务性平台，人工智能本质上成为各大跨国科技公司打造孤立式，抑或是联盟式的封闭技术平台的根基所在。这些技术平台在设计中可以将自身利益偏好嵌入其中，孕育特定的技术政治想象，对社会技术的发展路径、规则标准、价值判断等进行强主观性的指引和塑造，甚至能够完成一套独立的立法、行政和司法的超国家效力范围的闭环运行系统^[4]。

[1] 国际关系“法国学派”代表人物伯特兰·巴迪认为，通信革命颠覆了距离效应，网络式“社会间”关系构建超越了传统的国际关系。具体论述可参见伯特兰·巴迪：《世界不再只有“我们”：关于国际秩序的另类思考》，宗伟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38-39 页。

[2] 对于 AGI 技术发展带来物质与非物质空间影响，在 2023 年 5 月出版的新书中，麻省理工学院著名经济学教授阿西莫格鲁等人进行历史纵深和技术发展结合研究，具体见 Daron Acemoglu and Simon Johnson, *Power and Progress: Our Thousand-Year Struggle Over Technology and Prosperity*,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23。

[3] 贾森·萨多夫斯基：《过度智能》，徐琦译，中译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34-39 页。

[4] 丁玮、於兴中：《美国大科技公司反垄断及其权力规制》，《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22 年第 1 期。

因此，人工智能发展本身无疑将进一步塑造和强化 AGI 平台自身的“技术私权”。而这种“技术私权”的深度嵌入与扩散，将给既有的民族国家治理带来新问题，进而也影响到未来国际关系的塑造。^[1]

四、产生全球治理新难题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的全球治理，已经处于大国战略竞争、国际经贸治理分歧、气候生态变化、全球发展不均衡扩大等系列问题和矛盾交织中，面临重重挑战。而 AGI 的技术突破与应用，则在生产力范式和经济基础的渐次改变和未来可能的嬗变中，带来全球治理新难题。

（一）催生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新难题

人工智能技术开发需要得到人类的规范并符合人类社会伦理，是技术界的普遍共识。^[2]就人工智能技术开发的国际规范和伦理制度建设而言，2018 年本·斯科特（Ben Scott）等人就讨论过外交政策中的人工智能难题。^[3]但显然到目前，人工智能技术治理在国际治理议题中并没有形成有效的对话机制和对话空间。^[4]从更现实的角度看，人工智能技术开发在未来似乎也很

[1] 对于 AGI 出现后大公司权力进一步强化的讨论已经成为新热点问题，具体可参见 Amba Kak and Sarah Myers West, “AI Now 2023 Landscape: Confronting Tech Power,” AI Now Institute, April 11, 2023, <https://ainowinstitute.org/wp-content/uploads/2023/04/AI-Now-2023-Landscape-Report-FINAL.pdf>。

[2] 目前所有技术者开发者理论上都需要共同遵循的三条定律：第一是阿什比定律；第二是冯·诺依曼定律；第三定律则指出，任何一个简单到可以理解系统都不会复杂到可以智能化行事，而任何一个复杂到足以智能化行事的系统都会太过于复杂而无法理解。约翰·布罗克曼：《AI 的 25 种可能》，王佳音译，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57-58 页。

[3] 相关研究具体可参见 https://www.stiftung-nv.de/sites/default/files/ai_foreign_policy.pdf。

[4] 2023 年 4 月 11 日，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这是全球第一份国家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治理管理办法，具体可参见 http://www.cac.gov.cn/2023-04/11/c_1682854275475410.htm。而在随后 2023 年 5 月举办的 G7 广岛会议上，G7 集团提出在 2023 年底将在 G7 集团内部讨论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问题，具体可参见“G7 Hiroshima Leaders’ Communiqué,” May 20, 2023, <https://www.mofa.go.jp/files/100506878.pdf>，但 G7 集团并未提及与人工智能技术大国中国包括其他发展中国家共同讨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问题。

难建立起全球统一的制度规范，其原因不仅在于既有数字经济讨论中的“数字主权”和“技术主权”争论问题。^[1]更本质的问题在于，虽然人工智能在纯技术层面可以被视为人类共同进步的福祉工具，但从国家角度看，人工智能则可以被视为压制性战略工具，也是国家获得和维系国际权力的“终极武器”，因而不能也无法进行充分的技术分享。这一点已经充分体现在新版本ChatGPT对源代码的限制之中，包括其以各种理由对亚洲客户的访问进行限制。因此，正是由于人工智能隐含的不可预知的“终极武器”效应的存在，使得世界各国只能按自身的能力和意愿进行开发，在本国的行政管辖权范围内构建相应的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规范，或是在有限的排他性“联盟集团”内部展开治理问题协商，继而无法在国际社会层面达成共识，也无法展开传统意义上针对类似气候变暖等问题那样的全球治理行动。

（二）给数字经贸治理设置新障碍

数字技术的发展更使得传统国际体系内的结构性安排产生了新的相互作用，进而衍生出新的全球数字贸易规则制定问题。目前，世界各国在各自结构性权力优势下，通过数字贸易协定主张自身利益诉求已经形成了分散竞争的体系结构。^[2]由于数字经济的技术壁垒和产业“虹吸效应”存在，即便在传统贸易紧密度高的国家间也有着根本性的利益和原则分歧，特别是表现在跨境数据流动治理上。因此，数字经济“存在争议的多边主义”不仅将进一步削弱全球数字贸易规则制定的进程，并且会导致既有国际贸易体制的进一步分裂。^[3]虽然，目前已经有了美式模板USMCA协议、欧盟的GDPR和涉及人工智能技术模板的DEPA框架，但从全球数字贸易规则制定的碎片化进程可以看到，“数据难题”基于国家安全因素在数字贸易中的真实存在。而AGI技

[1] 余南平、冯峻锋：《新技术革命背景下的欧洲战略重塑——基于技术主权视角的分析》，《欧洲研究》2022年第5期，第1-28页。

[2] 余南平、栾心蔚：《结构性权力视角下大国数字贸易规则竞争与博弈》，《国际展望》2023年第3期，第20-32页。

[3] Griffith Melissa K et al., “From Great Power Politics to a Strategic Vacuum: Origins and Consequences of the TPP and TTIP,” *Business and Politics*, Vol.19, No. 4, 2017, pp.573-592.

术所产生更为不同的场景和现实是，AGI 大模型本身构建就需要大量的数据标注，同时其在与客户不间断的互动中每时每刻还在吸收来自全球各种海量的数据，而经过海量的“数据投喂”后的大模型，在变得“更聪明、更智能”的同时，其背后意味着人工智能技术强国可以在更高维度和更深层次上实现对全球数据的控制与使用，而在人工智能技术触及国家安全的背景下，本身就涉及跨境数据、数据安全问题的数字贸易则将更无从通过普通贸易所习惯的“对价”方式加以协商解决。

（三）引发非国家行为体治理新问题

非国家行为体的全球治理问题目前已经受到学术研究的充分关注，特别是跨国技术平台带来的国内反垄断与国外反垄断难题。而 ChatGPT 的横空出世则增添了新型非国家行为体的治理难题。认定 AGI 大模型作为新型非国家行为体并不是来自国际关系学界现有研究的共识，ChatGPT 对该问题回答可以给出一定的思考，其认为“人工智能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是出现了新的行为体和需要全球协调和监管的问题”。人工智能可以使各种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这些行为体可以将人工智能用于各种目的，此外，人工智能还会引发新的超越国界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因此，剔除传统的非国家行为体可以充分运用 AGI 技术带来的新问题外，就 AGI 大模型而言，模型本身就是一个以往未有和非传统规范意义上的新型非国家行为体。“它”在与全球用户互动过程中不仅传递特定标签、知识与价值观，同时 AGI 大模型平台本身还可以大量生成目标言论，模拟用户发言，并在用户基数庞大的互联网社交网络上进行舆论攻击。不仅如此，AGI 大模型还可以通过深度伪造技术编造信息，并辅以各种迷惑性材料，生成虚构事件和虚假信息，使得“信息何以为真”的问题被进一步放大。值得重视的是，现实中的 AGI 已经导致和创造了各种新型的安全问题。因此，新一代人工智能给国际治理带来的新难题是，对于 AGI 大模型这种在法律意义上“非人格化”的新型非国家行为主体，应该如何进行管理？当发生问题时又该如何处罚？因此，当 AGI 脱离“赋能”和“使能”工具性意义，进而变成一种“它和他”灰色状态时，全球人

工智能技术治理在统一规范无从达成的前提下，将很难面对 AGI 的自我蔓延和野蛮生长。

五、结语

回顾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历程，无数技术天才为“机器通过图灵测试”进行了不懈地探索尝试。而今天所展示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大模型技术，包括其取得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和所展示的 AGI 特征，使人类社会看到了一个通用人工智能时代的逐步开启，带来了技术进步主义者与技术规范主义者之间的激烈争论。而就当“马斯克们”的担忧与“比尔·盖茨们”的欢呼并存，进而引发人类开发工具与工具脱离人类控制悖论命题出现时，我们不仅要关注现代社会在人工智能技术作用下的解构与重构等宏大命题。同时，更为现实且不可忽视的问题是，与人类主体性并存的是民族国家的主体性存在，国家在发展人工智能技术中所获得的额外力量，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带来无限的可能，使得国家可以通过人工智能技术手段进一步塑造与强化自身的国际权力。在人工智能快速塑造国际权力而产生的新角逐中，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带来国家间的综合能力差距的急速扩大，不仅将影响和加快既有国际关系塑造方式的改变，同时，国际关系也会在超强和以往未知的技术力量作用下，进行符合未来生产力发展变化而引发的重塑与重构。

【责任编辑：宁因辉】

拜登经济民族主义：形态、根源及影响

□ 刘飞涛

〔提 要〕拜登政府执政以来，其经贸政策在淡化特朗普民粹主义色彩的同时，继承特朗普经济民族主义内核，通过制度性强化和战略性推进，使贸易保护主义、产业保护主义、技术保护主义和投资保护主义四种形态的经济民族主义政策得到了全面和系统扩张。拜登政府推行经济民族主义的根源是美国社会持续涌动的反全球化思潮、对新自由主义的失望以及对美国制度衰落的担忧，同时美国全力推进大国战略竞争也需要凝聚新共识。拜登经济民族主义政策归根结底是为维护美国霸权地位服务的，但由于相关政策的狭隘性，其必将加剧大国竞争对峙，冲击美国与盟伴缔结同盟的利益基础，并最终损害美国霸权地位。

〔关键词〕拜登政府、经济民族主义、保护主义、新华盛顿共识

〔作者简介〕刘飞涛，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F17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2 8832 (2023) 4 期 0082-23

拜登政府自 2021 年上任以来，对内出台“21 世纪美国产业战略”，对外提出“以工人为中心的贸易政策”，并以“拜登经济学”（Bidenomics）、

“新华盛顿共识” (New Washington Consensus)^[1] 理念为上述政策提供理论支撑。这些理念和政策涉及对全球化利弊、政府与市场关系、增长与公平等基本经济学命题的回答，反映出美国主流经济思潮正在经历从经济自由主义向经济民族主义/保护主义的大幅度转型。该转变由特朗普政府发起，拜登政府对其进行了系统化和战略化推进。美国经贸政策因而跨越党际和政府更迭保持了极大的继承性和延续性，意味着“特朗普和拜登都把自己定位为经济民族主义者，自觉地放弃了旧秩序的戒律”^[2]。当然，拜登经济民族主义和特朗普经济民族主义并非同一版本，但以保护主义为主要形态的经济民族主义无疑为认识和解读拜登政府内政外交政策尤其是经贸政策提供了一个更加宏观的视角和更具解释力的底层逻辑。

一、经济民族主义的内涵及界定

在西方学界，经济民族主义一词最早出现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其经典定义通常有政策取向和动机取向两种视角，前者强调国家经济与外部世界的疏密关系，而后者强调国家经济政策的民族主义动机。就政策取向而言，经济民族主义是指旨在减少一国境内经济活动与境外经济活动之间有机联系的一系列经济政策的总和。^[3] 因此，经济民族主义概念通常与特定的政策联系起来，要么是那些专注于限制全球一体化和外国影响的政策，要么是那些旨在增强本国公司竞争力的贸易政策、补贴政策或投资限制等措施。^[4] 在这

[1] The White House, “Remarks by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Jake Sullivan on Renewing American Economic Leadership at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April 27, 2023,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3/04/27/remarks-by-national-security-advisor-jake-sullivan-on-renewing-american-economic-leadership-at-the-brookings-institution/>.

[2] Franklin Foer, “The New Washington Consensus,” May 9, 2023, <https://www.theatlantic.com/ideas/archive/2023/05/biden-economics-industrial-policy-trump-nationalism/673988/>.

[3] Michael A. Heilperin, *Studies in Economic Nationalism*, Librairie E. Droz & Librairie Minard, 1960, p.27.

[4] Monica de Bolle and Jeromin Zettelmeyer, “Measuring the Rise of Economic Nationalism,” August 2019, <https://www.piie.com/publications/working-papers/measuring-rise-economic-nationalism>.

一范畴意义上，经济民族主义虽与国际经济自由主义在涵义上相互对立，但它既不排除国内经济自由主义政策也能容纳国家中心主义，因而成为经济民族主义的广义定义。

就动机取向的狭义定义而言，经济民族主义则强调国家的权力和利益优先，“政策制定者不是单纯地追求增加资本的机会，而是以团结和加强民族国家为目的做出经济决策”^[1]。罗伯特·吉尔平 (Robert Gilpin) 认为，经济民族主义与国家中心主义一致，其核心理念是经济活动应当从属于国家建设目标，为国家利益服务。^[2] 经济民族主义纯粹或主要指向保护主义和重商主义政策，强调尽管随着全球化的深度发展，国家日益接纳通过经济一体化实现财富增长的方式，但奉行经济民族主义的国家比较注重自身自主权的维护，不愿参与会增加对外依赖的合作，尤其是对战略物资或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国家的依赖。

在西方，狭义范畴的经济民族主义通常被视为是与经济自由主义相对立的一组概念，二者围绕全球化与主权国家的博弈形成兴衰流变的互动关系。经济民族主义追求国家权力与财富的动机是恒定的，且总是把与某种时代背景的全球化相抗争为使命。欧洲古典重商主义的兴起意味着封建王权对中世纪普世主义的反动，美国以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Alexander Hamilton) 为代表的新重商主义旨在对抗英国殖民主义，后来亨利·克莱 (Henry Clay) 主张的“美国体系”成为对抗英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形式，该对抗一直持续到一战、二战时期。二战以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手，尤其是 20 世纪 90 年代到 21 世纪初，以世界贸易组织为载体的新一轮全球化获得高速发展。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反全球化思潮涌动，经济民族主义逐渐回潮，并进一步导致了以特朗普为代表的美国民粹主义的强势崛起。拜登政府延续并强化前任特朗普经贸政策的做法，无疑印证了美

[1] Rawi Abdelal, “Na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in Eurasia,” in Eric Helleiner and Andreas Pickel, eds, *Economic Nationalism in a Globalizing World*,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5, <https://www.hbs.edu/faculty/Pages/item.aspx?num=13532>.

[2] *Ibid.*

国经济民族主义政策的延续和发展。

就概念范畴而言，国内学界一般不太认可西方将经济民族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相对立的做法，而是依照重商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对立和结合来定义经济民族主义，如重商主义的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的经济民族主义、重商主义和自由主义相结合的经济民族主义。^[1]另有学者主张将经济民族主义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种类型，前者借“自由贸易”和“公平竞争”为名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后者则是强调控制本国自然资源和经济命运的发展主义。^[2]

但基于对经济民族主义经典含义的理解，尤其是从突出经济民族主义与全球化的互动关系考察，本文倾向于从狭义上定义拜登经济民族主义，用以特指政府干预主导的以维护美国经济利益和霸权地位为目的的去全球化的一系列行动，在政策上直接体现为“以牺牲外国经济利益为代价促进国内经济利益（国内生产者、消费者和工人利益）的政策”^[3]，包括贸易、产业、技术、投资等四种形态的保护主义政策。

二、拜登经济民族主义的形态表现

特朗普由于高调推行“美国优先”原则而成为当美国粹主义的典型代表。拜登是打着“反特朗普主义”的旗号赢得选举的，然而拜登政府任期已过大半，外界期待的“去特朗普化”的经贸政策并没有出现，相反，拜登经贸政策更多体现了对特朗普保护主义政策的继承、强化和发展，主要表现为以下四种形态。

（一）贸易保护主义：持久化的关税战

拜登政府承袭特朗普政府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的原则，继承并延续关

[1] 王春风：《经济民族主义研究述评》，《广西民族研究》2012年第3期，第174-181页。

[2] 同上。

[3] Monica de Bolle and Jeromin Zettelmeyer, “Measuring the Rise of Economic Nationalism,” August 2019, <https://www.piie.com/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wp19-15.pdf>.

税战。2018年特朗普援引《1962年贸易扩张法案》第232条款，以国家安全为由，宣布对所有贸易伙伴征收25%的钢铁和10%的铝关税。^[1]但事实上《1962年贸易扩张法案》并未对国家安全进行明确定义，特朗普政府仅依据国内钢铝产业受到进口冲击的模糊表述即挑起贸易争端，将行业和产业安全泛化成了普遍的国家安全。拜登政府上台后，全盘接受特朗普的钢铝关税政策，并重申特朗普政府一再强调的“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这一极具经济民族主义色彩的国家安全原则。2021年3月，拜登政府发布《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指南》称：“在当今世界，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2]

拜登政府的选择明显背离了拜登的选举立场。在2020年总统选举期间，拜登曾明确声称“特朗普对中国商品加征进口关税将弄巧成拙，因为美国人将为此付出高昂代价”^[3]。然而，拜登政府就任伊始，其经贸政策立场便发生了急剧转变。戴琪（Katherine Tai）作为美国贸易代表提名人在参议院任命听证会上被问及是否应当把消除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列为签订双边贸易协定的目标，她明确作出了否定回答。^[4]2021年10月，戴琪在全面评估中美经贸关系基础上公开表示，美国将启动对华定向关税排除程序，并保证确保现有执法架构最符合美国经济利益。^[5]这实际上确认了拜登政府将会保留特朗普对华关税政策，打消了企业界和学术界对拜登政府取消对华关税的期待。

拜登政府还把关税视为撬动对华经贸磋商的杠杆。2022年，由于乌克兰危机爆发以及新冠疫情对全球供应链的干扰，美国通胀水平创下四十年历史新高，拜登政府内部主张通过削减对华关税抑制通胀的呼声高涨，财政部长

[1] Jeremy Diamond, “Trump Says US Will Impose Steel and Aluminum Tariffs,” March 1, 2018, <https://www.cnn.com/2018/03/01/politics/steel-aluminum-trade-trump-chaos/index.html>.

[2] The White House, “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Guidance,” March 3,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1/03/NSC-1v2.pdf>.

[3] James Bacchus, “Biden and Trade at Year One: the Reign of Polite Protectionism,” April 26, 2022, <https://www.cato.org/policy-analysis/biden-trade-year-one#polite-protectionism>.

[4] *Ibid.*

[5] Katherine Tai, “New Approach to the U.S.-China Trade Relationship,” October 4, 2021, <https://china.usembassy-china.org.cn/ambassador-katherine-tai-outlining-the-biden-harris-administrations-new-approach-to-the-u-s-china-trade-relationship/>.

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公开主张取消对中国商品征收的一些“不太具有战略意义”进口关税^[1]。但耶伦的主张遭到戴琪的公开抵制：“对华关税是一个重要杠杆，而贸易谈判代表永远不会放弃杠杆。”^[2]戴琪尤其强调，美国“现在所做的事情不能削弱其提高自身竞争力的需要，不能削弱其在全球体系中捍卫自身经济利益的需要”^[3]。言下之意，对华关税不仅是寻求所谓“公平贸易”的杠杆，更重要的是撬动制造业回流和保护国内就业的杠杆。就此而言，特朗普挑起的贸易战，事实上已经演变成美国产业战略的配套措施，也就是说，特朗普以古典重商主义借口（贸易赤字）挑起的贸易战，被拜登政府以新重商主义（产业保护）的理由保留并延续下来，高关税已经成为拜登政府对华贸易关系的常态化元素。

（二）产业保护主义：战略产业的扶持和保护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里根经济学为代表的经济自由主义始终占据美国经济学思潮的主流地位，克林顿政府和奥巴马政府虽然保持着民主党“大政府”的理念和施政传统，尤其是后者还曾提出“美国永续发展的蓝图”^[4]，希望通过税收优惠和扩大基础设施投资等措施鼓励制造业回流和实现美国的再工业化。至特朗普执政时期，在民粹主义和反全球化思潮影响下，特朗普政府曾发布“买美国货雇美国人”^[5]行政命令，但未出台约束性细则和激励性政策，其促进制造业回流和复兴的政策多处于零散状态。比较而言，拜登政府不仅明确提出了现代美国产业战略概念，还升级、更新“买美国货”规

[1] David Lawder, “Yellen Confirms She Is Pressing Biden for Some China Tariff Reductions,” May 18, 2022, <https://money.usnews.com/investing/news/articles/2022-05-18/yellen-confirms-she-is-pressing-biden-for-some-china-tariff-reductions>.

[2] Bradley Laas, “Tai Calls Tariffs a ‘Significant Piece of Leverage’,” June 22, 2022, <https://www.americanmanufacturing.org/blog/u-s-trade-representative-katherine-tai-calls-tariffs-a-significant-piece-of-leverage/>.

[3] *Ibid.*

[4] Matt Compton, “The Blueprint for an America Built to Last,” January 24, 2012,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blog/2012/01/24/blueprint-america-built-last>.

[5] Donald J. Trump, “Remarks on Signing an Executive Order on ‘Buy American and Hire American’ in Kenosha, Wisconsin,” April 18, 2017, <https://www.presidency.ucsb.edu/documents/remarks-signing-executive-order-buy-american-and-hire-american-kenosha-wisconsin>.

则并将其写入相关法案，体现了拜登政府“大政府”和产业保护主义理念的全面扩张。

一是为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提供强制性市场保护，推动国内制造业及基础设施建设复兴。2021年11月，《基础设施与就业法案》签署生效，授权联邦政府在未来十年内投入1.2万亿美元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改造或更新，其中未来五年新增5500亿美元支出，用于改善地面交通网络（2840亿美元）和社会核心基础设施（2660亿美元）。^[1]保护主义色彩浓厚的《建设美国购买国货法案》（BABA）作为上述法案的组成部分同时生效。根据BABA，由联邦财政资助的基础设施项目中使用的所有钢铁、制成品和建筑材料必须在美国生产；判定美国生产的门槛标准依据终端产品的价值实行梯次升级，自2021年1月起，把1954年以来一直沿用的50%的标准提高至55%，从2022年10月25日起提高到60%，其后将在2024年提高到65%，在2029年增加到75%。^[2]《建设美国购买国货法案》还在国际市场价格基础上，大幅提高国产建筑材料的采购价格，其中针对大企业优惠20%，针对中小企业优惠30%。^[3]此举意味着，外国产品如果不能提供低于美国产品20%-30%的价格，将难以进入美国市场。通过上述市场管制和价格干预，拜登政府围绕万亿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形成了一个近乎封闭的国内市场。

二是以战略性产业为导向推动高端制造业回流和经济发展的绿色转型。拜登政府“供应链韧性评估报告”^[4]罗列了四类关键产业：半导体制造和先进封装；大容量电池，如电动汽车用电池；关键矿物和材料；药品和活性药

[1] Justin Badlam, Tony D’Emidio, Adi Kumar, Sara O’Rourke and Rob Dunn, “The US Bipartisan Infrastructure Law: Breaking It Down,” November 12, 2021, <https://www.mckinsey.com/industries/public-sector/our-insights/the-us-bipartisan-infrastructure-law-breaking-it-down>.

[2] Amy Conant Hoang, Stacy J. Ettinger and Erica L. Bakies, “Final Rule Changes Buy American Requirements for Federal Contractors,” March 7, 2022, <https://www.natlawreview.com/article/final-rule-changes-buy-american-requirements-federal-contractors>.

[3] *Ibid.*

[4] The White House, “Building Resilient Supply Chains, Revitalizing American Manufacturing, and Fostering Broad-Based Growth,” June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1/06/100-day-supply-chain-review-report.pdf>.

物成分。其中半导体封装和大容量电池涉及保持战略科技产业优势和实现低碳经济转型的关键环节,因而也成为拜登推动产业政策立法的重要发力方向。

《芯片与科学法案》是美国公开挑起规模性补贴战的标志性法案,该法案于 2022 年 8 月生效,授权政府未来十年投入 2800 亿美元用于科研和芯片生产,其中约 2000 亿美元用于科学研发和商业化,约 527 亿美元用于半导体制造、研发和劳动力培训,另有 240 亿美元的税收抵免用于芯片生产。^[1] 该法案以国家安全为由,要求接受政府补贴的企业或其附属公司不得参与涉及外国半导体制造能力实质性扩张的任何重大交易。^[2] 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Gina Raimondo)在进行细则解释时表示:“受资助企业在获得资金后的 10 年内,必须限制它们在受关切国扩大半导体制造产能”,且“不得在知情情况下与受关切国实体进行涉及敏感技术或产品的任何联合研究或技术许可工作”^[3]。该毒丸条款在打压竞争对手的同时,也绑架了赴美投资的外国企业,实质上是变本加厉的“美国优先”原则。

三是打着减碳旗号推行绿色壁垒。拜登政府倾向于将《通胀削减法案》标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支柱性法案,该法案拨款 3690 亿美元用于能源安全和气候投资,包括 430 亿美元用于税收抵免以刺激电动汽车、节能电器等低碳消费,计划到 2030 年实现碳排放减少 40% 目标,十年内削减预算开支 3000 亿美元。^[4] 法案规定从 2023 年开始,符合条件的电动汽车将分别获得最高 7500 美元和 4000 美元的新车和二手车税收抵免;符合低碳要求的家庭装修将获总成本 30% 的税收抵免,上限为每年 1200 美元;对于热泵,每年的抵免

[1] Justin Badlam, Stephen Clark, Suhrid Gajendragadkar, Adi Kumar, Sara O'Rourke and Dale Swartz, "The CHIPS and Science Act: Here's What's in It," October 4, 2022, <https://www.mckinsey.com/industries/public-sector/our-insights/the-chips-and-science-act-heres-whats-in-it>.

[2] 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 "Preventing the Improper Use of CHIPS Act Funding," March 23, 2023, <https://www.federalregister.gov/documents/2023/03/23/2023-05869/preventing-the-improper-use-of-chips-act-funding>.

[3] Anton Shilov, "U.S. Govt Outlines Requirements for CHIPS Act Subsidies," March 1, 2023, <https://www.tomshardware.com/news/us-govt-outlines-requirements-for-chips-act-subsidies>.

[4] Arturo Conde, "Biden Signs \$740 Billion Inflation Reduction Act. Here's What You Could Get," August 18, 2022, <https://smartasset.com/financial-advisor/inflation-reduction-act>.

额上限为 2000 美元。但获得上述补贴必须满足法案规定的工资和用工标准并全面适用 BABA 法案要求，比如，为了获得电动汽车消费信贷，电池中一定比例的关键矿物必须在北美回收利用，或者在与美国有自贸协定的国家提取或加工，电池也必须在北美制造或组装。^[1] 由于严格的限制条件，包括法国、德国和韩国在内的许多美国贸易伙伴因没有与美国签订自贸协定或不符合组装地要求而被排除在税收优惠的范围之外。因此，如果说《芯片与科学法案》的主要目的还在于吸引高端制造业回流美国本土，那么，《通胀削减法案》显然是从原材料、零部件、组装、销售的整个链条着眼，试图推动全产业链的“在岸回流”、“近岸外包”或“友岸外包”。

（三）技术保护主义：从保持相对优势到追求绝对优势

技术保护主义是一种新的重商主义思维，它将技术创新能力直接与国家安全、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联系起来，因此，国家必须通过干预对奉行敌对立场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加以防范，同时为利益相关者获取本地和全球竞争优势，借以谋取地缘政治利益。^[2] 对比拜登政府和特朗普政府的科技保护政策可以发现，拜登政府在推行技术保护主义方面比特朗普政府走得更远、更甚。

其一，拜登政府全面提升科技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地位，视其为事关 21 世纪地缘政治竞争的关键。2022 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称，“技术是当今地缘政治竞争的核心，也是影响国家安全、经济和民主未来的核心因素”，“在未来十年，关键和新兴技术将重构经济，变革军事，重塑世界”。^[3] 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杰克·沙利文 (Jake Sullivan) 直言科学技术的进步将决定 21 世纪的地缘政治格局，在出口管制方面，过去美国只要求保持几代人

[1] Justin Badlam, Jared Cox, Adi Kumar, Nehal Mehta, Sara O'Rourke and Julia Silvis, "The Inflation Reduction Act: Here's What's in It," October 24, 2022, <https://www.mckinsey.com/industries/public-sector/our-insights/the-inflation-reduction-act-heres-whats-in-it>.

[2] Alex Capri, "Techno-Nationalism: What Is It and How Will It Change Global Commerce?," December 20, 2019, <https://www.forbes.com/sites/alexcapri/2019/12/20/techno-nationalism-what-is-it-and-how-will-it-change-global-commerce/?sh=17f1f094710f>.

[3]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ctober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11/8-November-Combined-PDF-for-Upload.pdf>.

的领先，但面对今天所处的战略环境，美国“必须尽可能扩大领先优势”^[1]。事实上，沙利文此言意味着，美国的科技竞争战略已从过去保持相对领先，转向追求绝对领先，从追求相对优势转向追求绝对优势。

其二，出口管制领域持续扩大，制裁清单不断加长。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出口管制体系曾长期以防扩散和反恐为目标，但自特朗普政府重新挑起大国战略竞争以来，美国出口管制体系再度成为服务地缘战略竞争的主要工具。美国《2018年出口管制改革法》要求总统设置跨部门机制，以确定“对美国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新兴技术和基础技术，以及《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FIRMA)中‘关键技术’定义未涵盖的技术”。^[2]《出口管制改革法》未对“新兴技术”和“基础技术”进行明确区分，但提及“基础技术”适用更加严格的管制措施，实际上指向的是最终军事用途或军事用户。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商务部工业安全局(BIS)还曾试图据此制定“新兴技术”和“基础技术”两份清单，但拜登政府蓄意利用这一法律灰色地带，模糊军民两用技术的界限，明确不再作“新兴技术”与“基础技术”的区分，而是采用“1758条款相关技术”^[3]这种笼统说法，从而大幅度扩大了需要严格管制的“新兴技术”的范围，包括将某些先进和高性能计算芯片和计算机商品添加到商业控制清单中。^[4]

其三，出口管制手段日趋严厉，升高技术管制门槛，并向人员和服务

[1] The White House, “Remarks by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Jake Sullivan at the Special Competitive Studies Project Global Emerging Technologies Summit,” September 16,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2/09/16/remarks-by-national-security-advisor-jake-sullivan-at-the-special-competitive-studies-project-global-emerging-technologies-summit/>.

[2] Paul K. Kerr and Christopher A. Casey, “The U.S. Export Control System and the Export Control Reform Act of 2018,” June 7, 2021, <https://crsreports.congress.gov/product/pdf/R/R46814>.

[3] Nicholas Weigel and Maryrose McLaughlin, “Commerce Department Plan to Nix ‘Emerging’ and ‘Foundational’ Technologies Distinction in Export Controls,” January 24, 2022, <https://www.mofo.com/resources/insights/220624-emerging-and-foundational-technologies-distinction>.

[4] Bureau of Industry and Security, “Commerce Implements New Export Controls on Advanced Computing and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Items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October 7, 2022, <https://www.bis.doc.gov/index.php/documents/about-bis/newsroom/press-releases/3158-2022-10-07-bis-press-release-advanced-computing-and-semiconductor-manufacturing-controls-final/file>.

领域延伸。在提高技术管制门槛方面，要求非平面晶体管结构 16/14 纳米或以下的逻辑芯片、半间距为 18 纳米或更小的 DRAM 存储芯片、具有 128 层或更多的 NAND 闪存芯片对中资企业执行“推定拒绝” (Presumption of denial)，跨国公司则须执行一案一审，事实上造成了高端芯片的对华禁运。在人员和服务管制方面，《2018 年出口管制改革法》授权商务部工业安全局监管美国人支持外国“军事、安全或情报活动”时的服务和其他活动，^[1] 拜登政府将此扩大至高科技领域并推动落实实施。2022 年 10 月，商务部工业安全局首次利用这一流程，通知相关美国公司和个人，他们直接或间接支持在中国研发或生产先进节点半导体的活动需要申请许可证。该要求直接导致美资关闭在华设立的研发中心，美籍研发人员被迫撤离中国。

（四）投资保护主义：“泛安全化”“泛政治化”倾向日趋严重

美国投资审查制度的变化往往是投资保护主义走势的重要风向标。20 世纪 90 年代至 21 世纪初，随着冷战结束、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生效以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开放型世界经济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掀起新一轮高潮。在此背景下，2007 年美国《外国投资与国家安全法》 (The Foreign Investment & National Security Act of 2007, FINSAs) 生效，其立法意图是让投资审查“只关注真正的国家安全问题，也就是由于兼并、收购和接管等商业行为可能导致外国控制美国企业而造成的安全关切”^[2]。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投资保护主义情绪持续升温。2012 年，三一重工并购俄勒冈风电项目被奥巴马总统否决，美国国会则以“国家安全”为由开始重点关注华为、中兴在美投资。与此同时，反自由贸易和反全球化的民粹主义思潮涌动，并

[1] Kevin J. Wolf, Shiva Aminian and Anne E. Borkovic, “BIS Has New Authorities to Impose Controls over Activities of US Persons in Support of Foreign Military, Security, or Intelligence Services,” January 5, 2023, <https://www.akingump.com/en/insights/alerts/bis-has-new-authorities-to-impose-controls-over-activities-of-us-persons-in-support-of-foreign-military-security-or-intelligence-services>.

[2] The Department of Treasury, “CFIUS Reform: The Foreign Investment & National Security Act of 2007 (FINSAs),” November 14, 2008, <https://home.treasury.gov/system/files/206/Summary-FINSA.pdf>.

以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为标志进入高潮。

2018年生效的《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展现了与《外国投资与国家安全法》显著不同的投资保护主义倾向。一是“泛安全化”倾向。审查范围由过去针对控股性外国投资进行审查，向非控股性投资审查扩展，涉及关键技术、关键基础设施和敏感信息三大领域；把房地产交易纳入重点审查项目，主要是靠近涉及国家安全敏感性的军事设施、美国政府设施或财产。^[1]二是“泛政治化”倾向。《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首次将“特别关注国”概念纳入投资审查制度，用以特指以获取关键技术和基础设施为战略目标进而可能危及美国国家安全的国家，法案不要求制定“特别关注国”清单，但要求针对中国发布专门评估报告，矛头的指向性非常明显。三是降低强制审查门槛，把外国政府拥有“实质性权益”作为启动强制性审查的标准。所谓“实质性权益”是指外国政府投资者在美国关键技术、关键基础设施或涉敏感信息的企业中获得25%或以上有表决权的股份，或者是外国投资者有超过49%的表决性股权由单一外国政府或地方政府持有。^[2]借此规定，美国投资审查的重点进一步向主权性投资聚焦。

如果说特朗普政府通过立法为美国推动投资保护主义大开绿灯，那么拜登政府则让投资保护主义政策全面落地。2022年9月，拜登政府发布《关于确保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对不断变化的国家安全风险进行充分考虑的行政命令》，对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开展外国投资风险评估提供细则指导，在从严把握尺度的同时，进一步拓展的风险审查的范围和内容。一是明确将供应链安全列为审查重点。《行政命令》要求委员会应酌情考虑所涉交易对国防工业基础内外供应链弹性和安全的影响，包括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制造

[1] Cathleen D. Cimino-Isaacs, “CFIUS Reform Under FIRRMA,” February 21, 2020, <https://crsreports.congress.gov/product/pdf/IF/IF10952>.

[2] Cathleen D. Cimino-Isaacs, “CFIUS: New Foreign Investment Review Regulations,” May 28, 2020, <https://crsreports.congress.gov/product/pdf/IF/IF11334#:~:text=On%20January%2013%2C%202020%2C%20the%20Department%20of%20the,in%20the%20United%20States%20%28CFIUS%29%20%28under%20P.L.%20110-49%29>.

能力、服务、关键矿产资源或技术，尤其强调需要关注“商业价值不大但对供应链有实质性影响的因素”^[1]。二是扩大“技术领先地位”适用的行业范围，事实上确认美国在任何行业的“技术领先地位”都可以被视为国家安全问题。三是增加对行业投资趋势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审查，强调威胁评估要从个案审查转向行业和系统审查。^[2]四是制订了涉及网络安全的审查细则，重点指向以干涉美国选举为目的的投资、关键基础设施的运行或通信的保密性、完整性或可用性、或涉及获取美国人或亚群体敏感信息等。^[3]另外，在对外技术投资方面，拜登政府业已迈出关键性一步，由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约翰·科宁（John Cornyn）和民主党联邦参议员鲍勃·凯西（Bob Casey）提出的《对外投资透明法》以修正案的方式塞入2024年《国防授权法》并于2023年7月在参议院获得通过，要求美国实体对“受关切国”敏感技术领域投资须向财政部报备，并由财政部和商务部联合处置。^[4]2023年8月9日，拜登签署《关于解决美国在受关注国家的某些国家安全技术和产品投资的行政命令》，^[5]严格限制美国人从事对华半导体与微电子、量子信息和人工智能三大领域的直接和间接投资，包括并购、私募股权、私募资本以及合资企业和融资安排等形式，极力防范资本转移带来技术转移。

[1] The White House, “Executive Order on Ensuring Robust Consideration of Evolving National Security Risks by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September 15,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presidential-actions/2022/09/15/executive-order-on-ensuring-robust-consideration-of-evolving-national-security-risks-by-the-committee-on-foreign-investment-in-the-united-states/>.

[2] *Ibid.*

[3] *Ibid.*

[4] John Cornyn (R-TX) and Bob Casey (D-PA), “Cornyn, Casey Outbound Investment Amendment Passes Senate,” July 25, 2023, <https://www.cornyn.senate.gov/news/cornyn-casey-outbound-investment-amendment-passes-senate/>.

[5] The White House, “Executive Order on Addressing United States Investments in Certain National Security Technologies and Products in Countries of Concern,” August 9, 2023,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presidential-actions/2023/08/09/executive-order-on-addressing-united-states-investments-in-certain-national-security-technologies-and-products-in-countries-of-concern/>.

三、拜登经济民族主义的认知根源

拜登政府步特朗普政府后尘续推经济民族主义有其深刻的社会认知根源，主要体现为美国主流社会对经济全球化的负面看法顽固难移，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失望情绪仍在蔓延，对制度衰退的深层焦虑挥之不去。同时，美国长期聚力于大国战略竞争也需要进一步凝聚新共识。

（一）对经济全球化的负面认知日趋成为主流

拜登政府决策层承袭民粹主义反全球化倾向，无视美国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巨大获益。美国学界研究结果显示，国际经济相互依存为 2018 年美国 GDP 增加了 2.2 万亿至 4.0 万亿美元，占 2018 年 20.5 万亿美元 GDP 的 11% 至 19%；全球供应链使美国生产商能够专注于生产率最高的任务，使美国长期垄断全球供应链高端优势；全球化还为美国提供巨大创新动力和优势，全球 25 家最有价值的上市公司中有 65% 是科技公司，这些公司总市值的 82% 由美国科技公司拥有。此外，55% 的美国“独角兽”是由移民企业家创立的，其中 80% 以上的公司也由移民担任关键管理人员。^[1] 上述事实表明，美国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绝对获益超过世界其他国家。

但经济全球化的负面效应却被美国主流社会蓄意放大，尤其是夸大经济全球化对制造业转移和就业流失的作用。戴琪称，在推动构建全球自由市场的理论下，当效率和低成本成为唯一激励因素时，生产就会转移到国外。^[2] 戴琪所说的产业转移或许具有一定的客观性，但这不是导致美国制造业岗位减少的主因。美国一项研究显示，从 2000 年到 2010 年，美国制造业总就业

[1] Peter A. Petri and Meenal Banga,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Globalis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January 2020, <https://www.eria.org/uploads/media/discussion-papers/The-Economic-Consequences-of-Globalisation-in-the-United-States.pdf>.

[2] Katherine Tai, “Remarks at the National Press Club on Supply Chain Resilience,” June 15, 2023, <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speeches-and-remarks/2023/june/ambassador-katherine-tais-remarks-national-press-club-supply-chain-resilience>.

人数减少了 564.77 万人，净进口增加占这一变化因素的 13.4%，而生产率提高占 87.8%。^[1] 另一个被有意忽视的事实是美国用更少的工人却创造了更大的产出，2015 年美国工厂产出是 1984 年的两倍，但工人却减少了三分之一。^[2] 也就是说，技术进步是导致美国制造业就业减少的最大原因，但在美国的主流政治话语中，这一因素也被掩盖。美国主流叙事的选择性失明造成公众无法了解事实全貌。皮尤研究所的调查显示，有 81% 的美国人知道美国制造业就业在过去 30 年里总数有所减少，但只有 35% 的人知道美国制造业的产出在同一时期有所增长，更有 47% 的人认为产出下降了。^[3]

民众的认知一旦被扭曲性事实塑造，就为政客转移国内矛盾提供了空间。就此而言，“制造业空心化”一说从经济意义上讲本身就是“空心化的”，但作为政治口号，却正好迎合了“铁锈地带”选民的心理和需求，也合乎逻辑地再次把国内问题的矛头指向经济全球化。2022 年 11 月，拜登在密歇根州州长赢得连任的庆祝仪式上称，“由于海外劳动力便宜，美国公司选择把工作而不是产品转移到海外，致使作为美国经济支柱的制造业被掏空。”^[4] 戴琪在 2023 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表示，由于造成收入不平等，当前的全球化“呈现出一定的局限性”，世界需要转向一个旨在促进包容性、弹性和可持续性的新贸易体系。^[5] 归根结底，在美国主流社会看来，美国制造业流失、贫富差距拉大等社会经济问题很大程度上都要归于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原罪”。

[1] Katherine Tai, “Remarks at the National Press Club on Supply Chain Resilience.”

[2] Rex Nutting, “Think Nothing Is Made in America?,” March 28, 2016, <https://www.marketwatch.com/story/us-manufacturing-dead-output-has-doubled-in-three-decades-2016-03-28>.

[3] Drew Desilver, “Most Americans Unaware That As U.S. Manufacturing Lobs Have Disappeared, Output Has Grown,” July 25, 2017, <https://finchannel.com/most-americans-unaware-that-as-u-s-manufacturing-jobs-have-disappeared-output-has-grown/66822/jobs/2017/07/>.

[4] Bradford Betz, “Sending Manufacturing Jobs to China,” November 29, 2022, <https://www.foxbusiness.com/politics/biden-accuses-us-getting-lazy-sending-manufacturing-jobs-china>.

[5] Yuka Hayashi, “U.S. Trade Chief Says Globalization Is Running into Limitations,” January 20, 2023, <https://www.wsj.com/livecoverage/davos2023/card/u-s-trade-chief-says-globalization-is-running-into-limitations-tBbMH6HDNtAnJ6He30Yu>.

（二）对新自由主义的失望情绪持续扩散

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对新自由主义的质疑趋于一致，反映了美国主流社会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普遍失望。拜登政府执政以来，提出了服务“中产阶级的外交”“21世纪美国产业战略”“以工人为中心的贸易政策”等一系列政策概念并被媒体和学界冠以“拜登经济学”之名，其核心理念是自里根政府以降民主、共和两党政府一致遵奉的新自由主义涓滴经济学理论(trickling-down economics)已经过时，该理论支持为富人和大公司减税，减少政府公共投资，支持自由贸易。^[1]拜登政府宣称，美国已经进入一个“自下而上、由内向外建设经济(middle-out economics)的时代”，中产阶级将取代企业和资本成为国家经济建设的中心，其三大支柱政策是：“明智的公共投资；促进中产阶级发展；促进竞争，帮助创业家和小企业蓬勃发展”^[2]。“拜登经济学”实质是主张政府主导的产业发展战略及其与之配套的保护主义政策，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将其称为“拜登式的经济民族主义”^[3]。

然而，正是在经济民族主义这点上，共和党右翼与拜登民主党政府找到了共同话语。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马克·卢比奥(Marco Rubio)早在2019年就公开呼吁施行“21世纪亲美产业政策”，强调市场并不知道什么样的结果更符合国家和公共利益，但决策者的“核心责任是国家利益，而不是经济增长”^[4]。2022年7月，美国众议院表决《芯片与科学法案》，由于获得了24名共和党议员支持，该法案最后以243票对187票的显著优势获得通过。

[1] The White House, “Bidenomics Is Working: The President’s Plan Grows the Economy from the Middle Out and Bottom Up—Not the Top Down,” June 28, 2023,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3/06/28/bidenomics-is-working-the-presidents-plan-grows-the-economy-from-the-middle-out-and-bottom-up-not-the-top-down/>.

[2] *Ibid.*

[3] Paul R. Krugman, “Wonking Out: Economic Nationalism, Biden-Style,” June 11, 2021, <https://www.nytimes.com/2021/06/11/opinion/economic-nationalism-biden-trump-trade.html>.

[4] Marco Rubio, “American Industrial Policy and the Rise of China,” December 9, 2019, https://www.rubio.senate.gov/public/_cache/files/5922cc54-2966-48a1-8e88-f7b511bbeca06/D0E7312935012E45F20C67A3450DDAFD.ndu-china-industrial-policy.pdf.

2023年6月，美国保守派智库“美国指南针”发布由美国前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前司法部长塞申斯（Jeff Sessions）等领衔编写的《重建美国资本主义：保守派决策者手册》，马克·卢比奥、汤姆·科顿（Tom Cotton）、J.D. 万斯（J.D. Vance）、托德·扬（Todd Young）等共和党参议员纷纷为报告背书。该手册的主导思想是“高薪制造业工作”外包是导致“铁锈地带”中产阶级衰落的根源，美国需要制定强有力的国家经济政策，通过产业和基础设施大规模投入、加大政府补贴、征收关税、保护国内市场以及加强工会等措施把就业机会带回美国。^[1]显然，共和党保守派的政策议程与拜登政府高度雷同，这让拜登政府庆幸已经抢占推行经济民族主义、特别是产业政策议程的先机，同时也感受到了来自共和党的话语权竞争。考虑到失业率和通胀率等显性经济指标好于预期，“拜登经济学”似乎有理由感到“自治”，所以拜登在启动连任竞选后高调宣称，他很乐意将其经济计划称为“拜登经济学”，因为“拜登经济学正在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2]。

（三）制度衰落的焦虑挥之不去

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的研究发现，自亚当·斯密（Adam Smith）贸易自由主义学说流行以后，“重商主义思想通常在两种情况下重新出现：崛起和发展中的大国将其作为加速政治和经济发展的途径偶尔接受这一信条；被认为正在衰落的大国将其作为扭转衰落的可能手段也乐于接受这种想法”。^[3]事实上，“美国衰落”是当前美国社会的政治敏感话题，但不可否认的是，从2011年占领华尔街运动到2021年国会山骚乱，美国社会对美国民主制的信心一再遭受冲击。拜登公开警告“绝大多数美国人认为美国民主正处于危险之中，美国民主正受到威胁”^[4]。沙利文称美国面临着不平等及其对民主

[1] American Compass, “Rebuilding American Capitalism: A Handbook for Conservative Policymakers,” June 14, 2023, <https://americancompass.org/rebuilding-american-capitalism-provides-the-agenda-for-conservative-economics/>.

[2] The White House, “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on Bidenomics.”

[3] Daniel W. Drezner, “Mercantilist and Realist Perspectives on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December 22, 2017, <https://doi.org/10.1093/acrefore/9780190846626.013.260>.

[4] The White House, “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on Standing up for Democracy,” November 3,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2/11/03/remarks-by-president-biden-on-standing-up-for-democracy/>.

构成的挑战，造成不平等的原因复杂，但主要还是诸如递进减税、大幅削减公共投资、不受限制的企业集中、以及削弱劳工运动等政策导致。^[1]这种危机意识在民间则体现为对国家发展方向的迷茫，美国“真清晰政治”网站2012年至2022年间的民意跟踪调查显示，认为美国发展方向错误的民众始终超过50%以上，最高达到76%。^[2]这说明无论过去奥巴马政府、特朗普政府还是当前的拜登政府，都没有有效提振美国民众对于美国发展前途的信心。与此相对应，2023年6月的一项民调显示，72.5%的美国大选潜在选民认为美国正处于衰退状态，按党派计算则有50.7%的民主党人、91.7%的共和党人和71.5%的独立人士认为美国正在衰落。^[3]美国社会的这种衰落焦虑通常会被政客用来煽动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为一系列面临党争障碍的政策议程清除障碍。特朗普“让美国再次伟大”和拜登“重建更美好世界”等政治标语都是这一逻辑的产物。

（四）为推行大国战略竞争打造新共识

拜登政府抛出“新华盛顿共识”概念，意图为全面推进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竞争凝聚国内和国际共识。“华盛顿共识”一词是1989年由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杜撰，指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美国、欧洲经济学家为应对拉美债务危机而提出的一套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念，主张自由贸易、浮动汇率、自由市场和宏观经济稳定。^[4]20世纪90年代，伴随冷战结束，“华盛顿共识”

[1] The White House, “Remarks by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Jake Sullivan on Renewing American Economic Leadership at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April 27, 2023,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3/04/27/remarks-by-national-security-advisor-jake-sullivan-on-renewing-american-economic-leadership-at-the-brookings-institution/>.

[2] Realclear Politics, “Direction of Country,” July 23, 2023, https://www.realclearpolitics.com/epolls/other/direction_of_country-902.html.

[3] Hannah Nightingale, “73% of Voters Say United States Is in Economic and Cultural Decline: Poll,” January 29, 2023, <https://thepostmillennial.com/73-of-voters-say-united-states-is-in-economic-and-cultural-decline-poll>.

[4] Douglas A. Irwin (PIIE) and Oliver Ward (PIIE), “What Is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September 8, 2021, <https://www.piie.com/blogs/realtime-economic-issues-watch/what-washington-consensus>.

成为私有化和放松政府监管的代名词，实质上也是里根经济学的国际版。^[1]对比沙利文在布鲁金斯学会有关美国国际经济政策的演说，“新华盛顿共识”具有显著不同的理念和政策内涵。

一是如同“拜登经济学”宣告了“里根经济学”的终结，“新华盛顿共识”则宣告了“华盛顿共识”的终结，这也意味着新自由主义经济理念在国内、国际层面的没落。沙利文在演说中明确诟病“正统”经济学的三个假设：一是“市场总是高效配置资本”；二是“深度贸易自由化将帮助美国出口商品，而不是就业和产能”；三是“所有增长都是好的增长”^[2]。上述假设衍生的政策正是市场化、贸易自由化和减少政府干预等“华盛顿共识”的核心主张，然而在沙利文看来，正是上述“正统”经济政策主张导致了美国产业基础的空心化、制造业及就业外流、经济脱实就虚、供应链脆弱、贫富差距拉大等一系列问题，就此而言，沙利文抛出“新华盛顿共识”实际上宣告了“华盛顿共识”的终结。

二是大量注入零和竞争和地缘政治元素，使“新华盛顿共识”成为经济学掩盖的地缘政治陷阱。沙利文认为，过往美国国际经济政策是以经济一体化将使各国更加负责任和开放、全球秩序将更加和平与合作等假设为前提的，但美国目前面临的现实是“一个庞大的非市场经济已经以一种构成相当大挑战的方式融入了国际经济秩序”^[3]。沙利文将矛头直指中国，称中国对传统产业和未来关键产业的大规模补贴政策，不仅冲击美国的制造业，也蚕食了美国在关键技术领域的竞争力。沙利文还称“经济全球化并没有阻止中国的地区军事扩张野心，也没有阻止俄罗斯入侵邻国”，在这种条件下，“相互依赖关系有可能被用作经济和地缘政治杠杆”，美国必须适应“以地缘政治

[1] 吴易风：《西方经济学中的新自由主义》，《红旗文稿》2014年第5期，第10-14页。

[2] The White House, “Remarks by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Jake Sullivan on Renewing American Economic Leadership at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April 27, 2023,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3/04/27/remarks-by-national-security-advisor-jake-sullivan-on-renewing-american-economic-leadership-at-the-brookings-institution/>.

[3] *Ibid.*

和安全竞争为特征的新环境”。^[1]

三是实施以“中产阶级外交”为总体框架的对外战略。“中产阶级外交”战略包含五个政策支柱：制定并实施现代美国产业战略，通过大规模公共投入，重振美国制造业和战略性产业；联合盟友伙伴共建关键商品、技术和矿物供应链，确保美国供应链、产业链安全；绕过传统自贸协定，推动构建“印太经济框架”等所谓高标准经贸伙伴关系框架；扩大对发展中经济体投资，继续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进行投资竞争；构筑“小院高墙”，通过强化出口管制，牢牢掌握尖端技术和战略科技优势。

四是致力构建以重振美国霸权为目标的“新经济秩序”。沙利文称“世界需要一个服务于美国工薪阶层、服务于美国产业、服务于应对气候变化、服务于美国国家安全和服世界上最贫穷和最脆弱国家的国际经济体系”，其关键是要“回归80年前美国首次倡导的核心信念：美国应该处于一个充满活力的国际金融体系的核心，使世界各地的合作伙伴能够减少贫困，促进共同繁荣”。^[2]沙利文此言赤裸裸地流露了维护美国经济霸权的图谋。

概言之，“新华盛顿共识”不是单纯的经济学概念，而是以维护美国霸权为内核的地缘政治陷阱，其强烈保护主义色彩的产业政策受到包括美国盟友在内的国际社会的质疑和批评，因此，它并非是美国与国际社会的发展共识，充其量也只能是美国民族主义分子的霸权共识。

四、影响分析

拜登政府的经贸政策在淡化特朗普民粹主义色彩的同时继承其经济民族主义内核，通过制度性强化和战略性推进，把以保护主义为主要形态的经济民族主义政策推向了新的高度。同时，从认知根源看，拜登推行经济民主义

[1] The White House, “Remarks by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Jake Sullivan on Renewing American Economic Leadership at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2] *Ibid.*

的目标是重振美国实体经济，重建美国的民族自信，服务于选举政治并助力美国开展大国战略竞争。总之，维护美国霸权地位是拜登推行经济民族主义的应有之义，但经济民族主义有其固有的狭隘性，其持久推行必将加剧大国竞争对峙，冲击美西方缔结同盟的利益基础，并最终损害美国的霸权地位。

（一）蚕食美国经济霸权根基，削弱美国作为全球经济体系中心的地位

战后美国全球经济霸权地位是由以关贸总协定（GATT）、世界贸易组织（WTO）为先后框架的国际贸易体系和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金融体系双轮驱动的，它们的功能和运转机理都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理念的产物。但无论“拜登经济学”还是“新华盛顿共识”都是从否定新自由主义经济假设为起点的，所以由“拜登经济学”和“新华盛顿共识”所规定的贸易、产业、科技、投资保护主义政策必将冲击美国主导建立的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体系。从贸易层次上讲，拜登延续特朗普关税战并持续瘫痪世贸组织争端上诉机制的做法事实上是打着改革的旗号对世贸组织去功能化，使美国日趋严重的经贸保护主义行为不受世贸组织规则的约束，是美国例外主义在国际经贸领域的最新体现，势必损害美国的国际信誉和规则议定权。从国际金融层次上讲，美元体系已经形成相对独立生态系统，美元作为储备货币客观上造成国际市场美元相对稀缺，而国际市场对美元的需求推高了美元的价值，这使得美国出口产品更加昂贵，并减少了海外对它们的需求，从而导致制造业和就业流失。拜登政府推行经贸保护主义政策推动制造业回流，美元流向国际市场的渠道将会收窄，美元为国际市场提供流动性的职能将会受到削弱，同时由于科技保护主义及投资保护主义日益严重，美元回流美国阻力同样加大。若美元国际循环双向受阻，美元作为国际流通手段和国际储备货币的作用将会持续削弱，最终损害美元霸权地位。质言之，拜登续推经济民族主义政策实质上意味着美国在国际贸易、国际金融领域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意愿或能力仍呈下降趋势，但美国维护其全球经济霸权地位和利益的野心未减。

（二）改变同盟关系原则，削弱美国构建同盟体系的利益基础

拜登经济民族主义政策仍然奉行“美国优先”原则，其《建设美国购买

国货法案》原则对来自美国盟友和非盟友国家的商品同样具有排斥性，其钢铝关税的加征对象包括盟友和非盟友在内的所有国家，其产业补贴因执行严格的本土化标准而主要流向美国企业或美国本土生产企业。拜登经济民族主义还奉行国家安全至上、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的“泛安全化”原则。正如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所言，“国家安全在美国对外关系上具有至高无上的重要性”，“美国愿为安全关切牺牲必要的经济利益”，^[1]但问题在于美国将该原则套用到盟友身上就成了“国家安全至关重要，需要盟友作出必要的经济牺牲”，使“泛化国家安全”成为西方跨国毒瘤。事实上，美国胁迫盟友禁用华为设备正是这一逻辑的体现。此外，拜登经济民族主义是以反全球化为时代主题的，认为以降低关税为标志贸易自由化时代已经结束，一荣俱荣的增长逻辑转变为“我赢你输”的零和博弈，所以拜登政府完全搁置以效率和增长为宗旨的自贸协定期程，转向以“安全”和“公平”为导向的产业链供应链协作和规则制定。总之，在美国经济民族主义政策的主导下，美国对盟友的索取日趋增多，同盟关系的不平衡性仍将持续累加。

（三）分裂全球经济体系，加剧全球治理碎片化趋势

当前，在美国将中国定义为“最主要竞争对手”和“最重大地缘政治挑战”的政策框架下，经济民族主义无疑会加大美国对华竞争的强度和烈度。从美国的社会认知看，中国发展奇迹尤其是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成功是刺激美国经济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主要外源性因素，在美国经济民族主义者看来，“中国威胁论”是具象化的，中国不仅是象征意义的“最主要竞争对手”和“最重大地缘政治挑战”，更是与美国制造业外流、就业机会流失、贫富差距拉大等一系列问题关联的根源，中国也因此成为美国经济民族主义情绪向外投射的主要目标。随着美国社会对华非理性氛围日益聚积，理性发声和理性决策的空间受到严重挤压。在此氛围之下，美国对华贸易保护、产业竞争、科技

[1] The U.S. Department of Treasury, “Remarks by 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 Janet L. Yellen on the U.S.-China Economic Relationship at Johns Hopkins 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 April 20, 2023, <https://home.treasury.gov/news/press-releases/jy1425>.

竞争、投资限制愈演愈烈，对华竞争打压不断突破底线。近来，随着美国新一届总统选举揭幕，以前总统特朗普为代表的共和党候选人甚至抛出了中断与中国一切经贸往来的极端言论，两党争相对华示强的局面或将愈演愈烈。受此影响，美国对华脱钩断链和科技打压或将继续升级，全球经济体系面临分割的风险，全球治理碎片化亦将更加严重。

五、结语

当前，经济全球化遭遇挫折，逆全球化潮流和反全球化思潮短期内仍难退去，但世界发展历程中的经济全球化本身就是一个起伏兴衰的进程，经济全球化在波折中递进发展的大趋势没有改变。拜登经济民族主义既是对逆全球化潮流的呼应同时也以全面的保护主义政策对逆全球化潮流予以加持，其本质上是反全球化的，因而也是没有历史前途的。拜登经济民族主义还蕴含对美国国运并连带美国霸权衰落的担忧，这也是民主、共和两党一致拥抱经济民族主义政策的共同心理。未来无论民主党政府继续执政还是共和党上台，经济民族主义政策都将以某种形式继续存在，在挫折失望叠加、政治极化进一步加剧的情况下，不排除美国经济民族主义走向更加极端化的可能。

【责任编辑：姜志达】

乌克兰危机下美西方与俄罗斯的 舆论战及其启示*

□ 林斯娴

〔提 要〕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美西方国家抱团合作，操控其主流媒体发动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对俄舆论战。俄罗斯则绝地反击，与美西方国家及其主流媒体在国际舆论场激烈交锋。在这场国际舆论战中，双方为抢占道义制高点，竞相综合运用各类传媒新技术及舆论战技巧，尽可能打击、唱衰甚至抹黑对手，鼓舞己方士气。美西方与俄罗斯的舆论交锋显示出 21 世纪“混合战争”场景下国际舆论战的一些新特点，这些特点将可能持续相当长时间。

〔关键词〕舆论战、乌克兰危机、美西方、俄罗斯、混合战争

〔作者简介〕林斯娴，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G206；E8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2 8832（2023）4 期 0120-15

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美西方国家^[1]将俄罗斯开展对乌“特别军事行动”定义为一场“大规模战争”，甚至称之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欧洲发生

* 本研究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共产党形象全球传播与认同研究”（21&ZD314）的阶段性成果；本研究亦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名称：“战略竞争背景下美西方对华舆论战研究”（2023JJ037）。

[1] “美西方”在本文中指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要包括美、英、加、澳、新五个英语系国家及法、德、意、西、葡等欧洲国家。部分东亚国家如日、韩等，根据其政治体制、意识形态及其对国际事务的基本立场，也被列入“美西方”广义范畴。

的一场规模最大的战争，^[1]并操控各自主流媒体以俄方为对手，发动了一场多手段、全方位、规模巨大的国际舆论战。^[2]俄方则针锋相对，积极反制。研究美西方与俄罗斯围绕乌克兰危机展开的舆论对抗，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国际舆论战在 21 世纪“混合战争”场景中的表现形式、特点及重要性，对中国应对他国舆论战有一定启示意义。

一、美西方对俄舆论战的手法与特点

自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美西方国家根据与俄方进行“混合战争”^[3]的定位，企图通过开展大规模、全方位的对俄舆论战，短期为声援乌军、打击俄军造势，长期则配合其政治、经济等多方位制裁手段，达到消耗、削弱甚至瓦解俄罗斯的终极目标。美西方国家对俄舆论战的手法具有以下特点。

（一）精心进行议程设置

所谓议程设置，是指媒体通过对新闻报道的频率、视角、侧重点等进行选择，从而操纵公众舆论，也可理解为给事件“铺垫”和“定调”。^[4]且定调手法可以多种多样，如掐头去尾剪辑事实、集中大量信息进行“轰炸”、利用“权威”信源或“雄辩论据”等，以求达到控制国际、国内舆论的目的。^[5]这种议程设置通常与一国战争目标具有正相关性。在乌克兰危机下，美西方

[1] Boris Johnson, “We Will Never be Secure if We Turn Our Backs on Valiant Ukraine,” *The Times*, June 18, 2022, <https://www.thetimes.co.uk/article/boris-johnson-we-will-never-be-secure-if-we-turn-our-backs-on-valiant-ukraine-education-commission-9sd5z2bxq>.

[2] 根据国内学者朱金平的定义，“舆论战”作为国家间直接或间接斗争的重要手段之一，从广义上可以理解为“对立双方为了各自的利益而就共同涉及的事件、现象、问题进行舆论对抗”；狭义上则可理解为“敌对双方围绕某场战争而调动一切手段进行舆论对抗”。具体参见朱金平：《舆论战》，中国言实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6-7 页。

[3] Joseph S. Nye, Jr., “Eight Lessons from the Ukraine War,” *Project Syndicate*, June 15, 2022,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russia-war-in-ukraine-eight-lessons-by-joseph-s-nye-2022-06>.

[4] 马克斯韦尔·麦库姆斯：《议程设置：大众媒介与舆论》，郭镇之、徐培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49-162 页。

[5] 李衍玲：《国际舆论战法解析》，《新闻界》2012 年第 8 期，第 16-17 页。

实际是以乌国土为“棋盘”、乌民众和乌现政府为“棋子”，针对俄方打一场“代理人战争”。^[1]其战争目标包括：尽可能削弱甚至摧毁俄、阻止中俄继续靠拢、压制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国家和平发展，从而最终达到维护美西方全球霸权的根本目标。^[2]

美西方这一系列实体战目标为其对俄舆论战起到了“定调”作用，为其议程设置了大框架，具体又可划分为：抢占舆论制高点，将俄对乌“特别军事行动”定义为侵略，指责其破坏“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破坏欧洲及世界和平；^[3]对普京及其他俄领导人进行“污名化”“妖魔化”宣传；^[4]指控俄军造成大量平民伤亡、甚至“种族灭绝”；^[5]唱衰俄军、夸赞乌军，预测俄军必败、乌军必胜，从而打击俄士气、鼓舞乌士气；^[6]挑拨俄与中国及其他非西方国家关系，贯彻其对俄孤立策略；^[7]号召美西方国家团结一致，共同对抗俄，并借势巩固、扩张“西方联盟”。

（二）大量传播虚假信息

俄罗斯开展对乌“特别军事行动”后，美西方就不断通过广播、电视、新闻报刊以及网络视频等多种媒体散播虚假信息。2022年3月，美国《外交

[1] Christopher Caldwell, “The War in Ukraine May Be Impossible to Stop. And the U.S. Deserves Much of the Blame,” *The New York Times*, May 31, 2022, <https://www.nytimes.com/2022/05/31/opinion/us-ukraine-putin-war.html>.

[2] Ivo H. Daalder and James M. Lindsay, “Why Putin Underestimated the West and How to Sustain Its Newfound Unity,” *Foreign Affairs*, April 7, 2022,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russian-federation/2022-04-07/why-putin-underestimated-west>.

[3] Tom Balmforth, Pavel Polityuk and Terje Solsvik, “As Russia Intensifies Push for Donbas, Ukraine Rules out Ceasefire,” *Reuters*, May 21, 2022, <https://www.reuters.com/world/europe/russia-advances-ukraines-donbas-mariupol-steelworks-siege-ends-2022-05-21/>.

[4] William Hague, “Putin’s Next Move? A Truce to Split the West,” *The Times*, May 21, 2022, <https://www.thetimes.co.uk/article/putins-next-move-a-truce-to-split-the-west-bp6q95w60>.

[5] Phil Stewart, “Exclusive: U.S. Assesses up to 60% Failure Rate for Some Russian Missiles, Officials Say,” *Reuters*, March 24, 2022, <https://www.reuters.com/business/aerospace-defense/exclusive-us-assesses-up-60-failure-rate-some-russian-missiles-officials-say-2022-03-24/>.

[6] Eliot A. Cohen, “Why Can’t the West Admit That Ukraine Is Winning?,” *The Atlantic*, March 21, 2022, <https://www.theatlantic.com/ideas/archive/2022/03/ukraine-is-winning-war-russia/627121/>.

[7] Eugene Rumer and Richard Sokolsky, “Russia’s National Security Narrative: All Quiet on the Eastern Front,”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May 23, 2022,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files/Rumer_Sokolsky_Russia_NatSec_1.pdf.

政策》网站载文称，据北约官员估计，冲突一个月来，俄军伤亡及被俘已高达4万人，有7名俄将领阵亡；又称美国《政治报》援引多位西方官员的话报道，俄某旅指挥官被士兵杀害，原因是所属部队损失惨重，士兵沮丧至极。^[1]该文微妙之处就在于使用“北约官员估计”、“美国《政治报》援引多位西方官员的话”等真真假假、虚实不明的消息来源，既能满足传播虚假信息、唱衰俄军的舆论战需求，又不必对信息可靠性直接承担责任。实际上，俄军伤亡数远低于美西方舆论估计，而乌军伤亡率则较俄军高得多。英国《独立报》网站2022年6月披露，在一系列战俘交换以后，乌方关押的俄军人数从4月份的900人减至550人，而俄关押的乌军战俘达5600人。这实际上能表明乌军被俘人数是俄军战俘数的10倍左右。^[2]尤要指出，《独立报》作为一家相对权威、知名的媒体，其披露的这些数据应能反映俄乌各自战损率的真实状况，而《独立报》发表这篇文章的意图是为了说明乌面临困境、亟需美西方大量提供军援。这从侧面反证美西方主流媒体不少有关俄方损失惨重、远超乌方损失的报道脱离事实依据，甚至自相矛盾。

为破坏俄国内政治社会稳定，美西方国家及其主流媒体大量传播有关俄国内关系紧张、民众反战情绪强烈等虚假信息。比如，俄开展对乌“特别军事行动”仅过几天，美西方媒体就宣称因战事不利，普京解除了国防部长绍伊古的职务。不久之后，绍伊古在媒体露面，职务并无变动，直接戳破了美西方捏造的谎言。^[3]

此外，为直接、急速增大其虚假信息的传播效果，美西方国家及其主流

[1] Amy Mackinnon, Jack Detsch and Robbie Gramer, “Experts Outline Five Ways Russia’s Bloody Invasion of Ukraine Might End,” *Foreign Policy*, March 28, 2022,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2/03/28/russia-ukraine-putin-war-what-happens-next/>.

[2] Kim Sengupta, “Ukraine Forces Outgunned up to 40 to One by Russian Forces, Intelligence Report Reveals,” *The Independent*, June 8, 2022, <https://www.independent.co.uk/news/world/europe/ukraine-war-intelligence-russia-kyiv-military-b2096715.html>.

[3] Andrei Soldatov and Irina Borogan, “Could the Siloviki Challenge Putin?,” *Foreign Affairs*, April 11, 2022,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russian-federation/2022-04-11/could-siloviki-challenge-putin>.

媒体还依据所谓“符号政治”逻辑，^[1]大量炮制用以增强虚假信息传播效果的各类新名词、新符号、新话语、新故事，如“蛇岛十三勇士”^[2]“基辅幽灵”^[3]“布恰事件”^[4]等半谎言、半猜测故事，以期更有效地实现污名化俄罗斯、唱衰俄罗斯与俄军等媒体议程。

（三）打舆论场上的“代理人战争”

一方面，美西方利用乌方媒体及平台对俄开展舆论战，并从旁为乌提供大量支持。美西方不但向乌提供钱财、人力、技术、网络平台等支持，帮助乌组织规模庞大的反俄“网军”，还在乌方网络遭黑客攻击时，通过“星链”计划免费向乌提供以小型卫星为架构的新网络，使之能持续对俄开展网络战、舆论战。^[5]另一方面，美西方及其主流媒体也亲身下场，常常以赞美乌的反俄表现来“破题”，进而“包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美西方国家来说，在当下以情感为主要驱动力的社交媒体时代，公众舆论变化无常，乌要获胜，就必须获得全球关注、使全球舆论站在它一边。据此逻辑，它们在“污名化”普京及俄罗斯的同时，更聚焦包装泽连斯基。俄乌开战以来，泽连斯基获得了在美西方国家议会轮流进行视频演讲的待遇。美西方主流媒体更是集中宣传乌军表现“棒极了”；泽连斯基是“一位英勇无畏的英雄”。美国《外交事务》网站评论说：“这样的叙事弧线就像好莱坞剧本。”^[6]

[1] “符号政治”是一个西方政治学术语，简单地说，就是通过技巧性地运用符号，“改写”政治和政治形势、塑造新闻人物。按照“符号政治”逻辑，美西方国家的“政治传播”工作就是“精心策划，运用各种符号手段，达到塑造形象的目的”。而这一运用符号塑造形象的过程，也被认为是政治传播和战略传播的重要手法。参见兰斯·班尼特：《新闻：幻象的政治》，杨晓红、王家全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55-156页。

[2] Dustin Siggins, “When it Comes to PR, Russia and Ukraine Aren’t Fighting the Same War,” *Newsweek*, March 14, 2022, <https://www.newsweek.com/when-it-comes-pr-russia-ukraine-arent-fighting-same-war-opinion-1686902>.

[3] Morgan Meaker, “How Ukraine Is Winning the Propaganda War,” *Wired*, June 13, 2022, <https://www.wired.com/story/ukraine-propaganda-war/>.

[4] Jeremy Herb, “Exclusive: Zelensky Says Ukraine Won’t Give up Territory in the East to End War with Russia,” *CNN*, April 17, 2022, <https://www.cnn.com/2022/04/17/politics/zelensky-russia-war-tapper-interview-cnntv/index.html>.

[5] Joseph S. Nye, Jr., “Eight Lessons from the Ukraine War.”

[6] Liana Fix and Michael Kimmage, “What if the War in Ukraine Doesn’t End?,” *Foreign Affairs*, April 20, 2022,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russian-federation/2022-04-20/what-if-war-ukraine-doesnt-end>.

（四）采用“狼群战术”抱团发声

在对俄舆论战中，美西方从一开始就拥有数量优势。截至 2023 年 2 月，全球包括美国和 27 个欧盟成员国在内的共计 49 个国家参与了对俄制裁，^[1] 这些国家各自的媒体也成为对俄舆论战的主力。它们在对俄舆论战过程中相互援引，互为信源，密切配合。比如，2022 年 3 月 30 日，《华盛顿邮报》网站发表一篇报道，主题是唱衰俄军。该文援引多个信源，按其叙事，先是英国情报机构在推特上披露俄军存在后勤补给困难；而后是美国一名高级防务官员称俄士兵因“缺乏御寒装备而冻伤”；接下来援引《纽约时报》称，一些俄罗斯士兵携带的食物 2002 年就已过期；转引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中两名“知情人士”的话称，俄提出向中国购买口粮；一名北约官员估计，俄罗斯已有 7000 ~ 15000 名军人丧生，还有更多的人受伤；转引《福布斯》文章中一名五角大楼官员的话称，俄制导弹“似乎”处于落后状态；援引路透社报道称，俄导弹的故障率高达 60%。最后《华盛顿邮报》总结说：俄“入侵”以来已损失 2000 多辆车辆，俄抛锚车辆比例“似乎很高”。^[2] 在这篇报道的舆论造势流程中，直接或间接参与者包括“英国情报机构”、一名美国“高级防务官员”、两名“知情人士”、一名北约官员、一名“五角大楼官员”以及《纽约时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路透社、《福布斯》杂志等主流媒体，最后由《华盛顿邮报》收官。如此多的美西方国家官员、知名媒体相互援引、印证，造成了足以扰乱视听、唱衰俄军的所谓证据链和舆论信息源。

（五）集中打击俄“国家媒体”

美西方国家在对俄舆论战中充分发挥己方媒体的资金、技术、平台优势以及参与者数量优势，着重压制俄罗斯主流媒体及同情俄方的国际媒体、平台。据英国《卫报》报道，俄开展对乌“特别军事行动”后，英国有个名叫乔治·加

[1] Bhavan Jaipragas, “Ukraine War, One Year on: Have Sanctions against Russia Served Their Purpos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February 24, 2023, <https://www.scmp.com/week-asia/opinion/article/3211269/ukraine-war-1-year-have-sanctions-against-russia-served-their-purpose>.

[2] Bonnie Berkowitz and Artur Galocha, “Why the Russian Military is Bogged down by Logistics in Ukraine,” The Washington Post, March 30, 2022,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2022/03/30/russia-military-logistics-supply-chain/>.

洛韦的“普京崇拜者”仍然在其推特个人主页上表示同情普京，因而受到打压。推特“确认”他的账号是“俄国家附属媒体”，他只得仓促删除细节。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收视率最高的主持人塔克·卡尔森一直在自己的一档节目中播放克里姆林宫的“谈话要点”，附和俄有关美国为在乌生物武器实验室提供资金的说法，这名主持人由此也受到美主流媒体压制。《卫报》这篇报道并非要劝阻对俄媒及同情俄的媒体的打压，而是主张美西方及其主流媒体要“清理内部”，在对俄舆论战中统一行动。^[1]此外，美西方还在世界各地招募黑客组成“影子大军”，利用加密应用软件发布目标名单，鼓动对俄进行网络攻击。这支“影子大军”干扰了多家俄电视频道的节目播放，并使俄电视频道播放起禁放的前线画面，敦促俄民众“反战”。^[2]

（六）发挥新媒体技术及网络平台的舆论造势功能

据《华尔街日报》网站报道，俄对乌“特别军事行动”开始不久，英国海格特咨询公司就利用社交媒体发起“抵制俄罗斯运动”。该公司副总裁列里亚·梅尔尼丘克号召公众“切断与俄一切关系、切断俄所有资金来源，以阻止俄对乌进行‘残暴’战争”。仅隔几周，“抵制俄罗斯运动”的推特账户就超过4500名粉丝、其通讯软件“电报”（Telegram）的账号超过1.1万名粉丝，且从世界各地招募了大约7000名志愿者参与。2022年3月23日，该“运动”在推特上发文威胁在俄仍有业务的雀巢公司，称“继续资助‘战犯’会损害你的公司”。乌网军也通过社交媒体向强生、欧尚、麦当劳等欧美知名公司施压，要求“停止与‘侵略国’做生意”。乌网军得到来自美西方的资金、技术、人力资助，据称其志愿人员有30万，每天通过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能接触1亿用户。亦有知情者披露，乌网军其实是“美西方网军”。其依据是，乌网军的志愿者经常使用相同的文本和图像，“错也一样错”，像“机

[1] Jonathan Freedland, "Putin Still Has Friends in the West – and They're Gaining Ground," The Guardian, April 8, 2022, <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22/apr/08/vladimir-putin-viktor-orban-eu-marine-le-pen>.

[2] Shlomo Kramer, "Russia and Ukraine are Only the Beginning of Modern Warfare Being Waged Online," USA Today, March 14, 2022, <https://www.usatoday.com/story/opinion/columnists/2022/03/14/russia-ukraine-cybersecurity-cyberattack/6984487001/?gnt-cfr=1>.

器人”一样工作，而乌方人员并不擅长使用“机器人”技术。^[1]

二、俄罗斯对美西方舆论战的应对

面对美西方舆论攻势，俄罗斯一方面迅速采取反制措施，将美西方国家的一些反俄媒体逐出俄罗斯，包括：关闭“德国之声”莫斯科分社，以回应德国禁止“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播出节目；要求脸书网站对某些帖子进行地域封锁或隐藏，等等。^[2]另一方面，不断加强与美西方进行舆论战的顶层设计，并采取各种积极举措，尽可能争取主动权，创造更有利的舆论环境。

（一）与美西方议程针锋相对

俄方设计的议程主要包括：其一，极力谴责美西方国家是乌克兰危机持续升级的罪魁祸首，同时谴责乌当局推动乌克兰危机升级；^[3]其二，宣传乌克兰危机揭开了“第三次世界大战”序幕，把危机不断升级、欧洲及世界和平被破坏的责任归于美西方国家；^[4]其三，宣传乌克兰危机催生国际大变局，探讨为什么出现国际大变局、国际变局将如何“变”，评价美西方国家、非西方国家以及俄罗斯在国际变局中的利益得失；^[5]其四，宣传美西方及乌方必败、美西方衰落不可避免；^[6]其五，宣传俄是受欺侮一方、是为生存而战，

[1] Patience Haggin and Suzanne Vranica, “Ukraine Forms ‘Internet Army’ to Pressure Western Firms in Russia,”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pril 19, 2022, <https://www.wsj.com/articles/ukraine-forms-internet-army-to-pressure-western-firms-in-russia-11650380704>.

[2] Hannah Murphy et al., “Big Tech Caught in Information War between West and Russia.”

[3] Надежда Алексеева and Полина Духанова, “«Поддерживают нацистов и убийц»: Азаров — о стратегии Запада на Украине и перспективах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я кризиса,” *RT на русском*, March 6, 2022, <https://russian.rt.com/ussr/article/972112-azarov-ukraina-intervyu>.

[4] Константин Сивков, “Украина – только начало.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м последствием спецоперации станет изменение всей нынешней картины мира,” *E-News*, March 29, 2022, <https://e-news.su/mnenie-i-analitika/420060-ukraina-tolko-nachalo-konstantin-sivkov.html>.

[5] Сергей Караганов, “Мы наблюдаем появление нового мира в момент его создания,”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October 26, 2022, <https://rg.ru/2022/10/26/osypavshijsia-mir-uroki-na-budushchee.html>.

[6] Сергей Аксенов, “Спецоперация на Украине: 100 дней, которые потрясли мир - Мариуполь взят, Херсон и Мелитополь под нашим контролем, «котел» на Донбассе замыкается,” *Свободная пресса*, June 3, 2022, <https://svpressa.ru/war21/article/335946/>.

号召俄罗斯人民、军队在“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的旗帜下，树立“敢打必胜”的信心，争取最后胜利。^[1]综合来看，俄有些议程与美西方的议程针锋相对，有些甚至超越了美西方的议程，从更广阔的背景与视角出发，为俄与美西方在乌克兰危机之后进行更深远、更长期的博弈进行国际舆论造势。

（二）反制美西方虚假信息

面对铺天盖地的反俄虚假信息，俄难以直接用炮制、传播虚假信息的方式回击。这不仅是俄政策导向问题，更因为作为舆论战对手的美西方国家及其主流媒体惯于相互引证、相互帮腔、“众口烁金”。相反，俄方“独此一家”，缺乏这种“便利”。因此，俄罗斯及其主流媒体常常通过给美西方国家贴“新标签”的方式对其各类反俄虚假信息进行反击，并尽量与俄在舆论战中的议程保持一致。具体来说：一是集中塑造和传播“集体西方”“深层西方”“盎格鲁—撒克逊对手”“金融恐怖主义”等标签，揭露美西方祸害全世界的殖民历史和霸权罪恶；二是集中塑造和传播“代理人战争”“新纳粹”“核乌克兰”“种族灭绝”“亚速营”“雇佣兵”“外籍军团”“乌克兰陷阱”等涉乌“新标签”，以期打击乌方声誉、士气、民心，打击美西方国家的援乌决心与信心、步伐与节奏；三是集中塑造和传播“俄罗斯母亲”“俄罗斯世界”“太阳普京”“单极世界结束论”“转向东方”“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等涉俄“新标签”，以宣扬俄罗斯必胜、美西方必败，鼓舞俄民心士气。俄方通过大量塑造、传播这类“新标签”，一方面有力回击了美西方及其主流媒体炮制和传播的虚假信息，更有效地推进俄方的议程设置，澄清事实、辨明是非曲直；另一方面，因这些“新标签”观点性强、具象生动，且有一定的背景事实为根据，可信度高，从而与美西方明目张胆地炮制、传播虚假信息的舆论战模式划清了界限，维持俄及其媒体的公信力。

（三）充分利用美西方国家及其媒体固有的内在矛盾

美西方阵营并非铁板一块，其内部各国均有不同利益诉求；即便同一国

[1] Петр Акопов, “Ни шагу назад — на всех трех фронтах,” РИА Новости, March 1, 2022, <https://ria.ru/20220301/rossiya-1775677680.html>.

内，其政府、媒体、民众之间亦存在一定分歧和矛盾。俄从这一现实出发，寻找、揭露美西方的战略弱点，“攻其所必救”。一是抓住美英等国的“殖民历史”“侵略历史”，进行大力宣扬，激化其与广大非西方国家的“新仇旧恨”，使其孤立于非西方世界，为俄争取更广泛的同情与理解。二是抓住美西方国家之间固有的利益与观念矛盾等战略“痛点”，揭穿“美西方国家团结一致”的虚假说辞，包括：分层次揭露并放大匈牙利、土耳其等美西方集团“边缘国家”与主流国家的矛盾；^[1]放大所谓“集体西方”内部法德等“老欧洲”国家与美英等“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内在矛盾；^[2]指出美是乌克兰危机的“最大受益者”，而其余西方国家都是受害者。^[3]三是揭露美西方国家在援乌问题上的矛盾及其与乌当局的矛盾，宣称乌是美欧等西方国家的战略“耗材”。^[4]俄罗斯主流媒体积极塑造和传播的“新纳粹”“核乌克兰”“种族灭绝”“乌克兰陷阱”“亚速营”“雇佣兵”“外籍军团”等有关乌方的各种“新标签”，也是在有意放大、传播乌当局与“集体西方”之间的矛盾。四是抓住美西方内部朝野矛盾、民众与政府的矛盾等，以期动摇美西方国家长期“援乌打俄”的政治社会基础。^[5]五是利用美西方国家内部反战、反主流、反精英的非主流媒体与主流媒体间的矛盾，实现“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国际舆论战效果。^[6]

[1] Ирина Таран and Елизавета Комарова, “«Единый фронт против Кремля»: как на Западе постепенно признают провал стратегии по изоляции России,” RT на русском, July 25, 2022, <https://russian.rt.com/world/article/1029393-zapad-izolyaciya-strategiya-rossiya>.

[2] Валерия Вербинина, “В Европе начали догадываться об устроенной США и Украиной ловушке,” Взгляд.

[3] Юрий Зинин, “Европа и расплата за авантюру США на Украине,” Новое Восточ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 November 21, 2022, <https://ru.journal-neo.org/2022/11/21/evropa-i-rasplata-za-avantyuru-ssha-na-ukraine/>.

[4]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Совещание о мерах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поддержки регионов,” Президент России.

[5] Валерия Вербинина, “В Европе начали догадываться об устроенной США и Украиной ловушке,” Взгляд.

[6] “Западные СМИ: в США и Великобритании беженцев с Украины ждет бюрократический кошмар,” Новые известия, March 14, 2022, <https://newizv.ru/news/2022-03-14/zapadnye-smi-v-ssha-i-velikobritanii-bezhentsev-s-ukrainy-zhdet-byurokraticheskij-koshmar-350959>.

（四）利用非西方国家以及同情、理解甚至支持俄罗斯的媒体来构建国际舆论战统一战线

为最大程度争取国际舆论支持，俄及其主流媒体专门塑造和传播“友好的沉默”“同路人时代”等“新标签”，^[1]以示对广大非西方国家在乌克兰危机期间的“中立”立场表示理解和欢迎。俄罗斯《观点报》网站发表文章称，在特定时间和特定议题上，利益一致的国家就是“同路人”，俄完全可以接受土耳其成为“同路人”，伊朗、印度、中国也可以成为“同路人”。^[2]俄还利用非西方国家媒体、政要及知名人士替俄发声。俄东方新观察网站借助中东国家的报纸、网站、自媒体提供的大量数据、事实和观点，揭露美西方国家“援乌打俄”的战略实质，尤其着重谴责美国为维护其霸权利益牺牲欧洲，让欧洲人替美国火中取栗。^[3]

（五）充分发挥俄国家媒体的先锋和主力军作用

俄强大的国家媒体主要包括塔斯社、俄新社等新闻社，《俄罗斯报》《观点报》《生意人报》《共青团真理报》《新消息报》及其网站，克里姆林宫网站、俄罗斯总统网站，今日俄罗斯电视台、俄罗斯卫星电视台等。这些媒体担当了与美西方进行舆论交锋的主力军和主要平台。俄政府高度重视相关媒体的舆论引导作用，俄军政要员和知名学者经常在关键节点在这些媒体发表讲话、访谈或撰文，引领俄主流媒体开展针对美西方国家的反击。普京的历次重要讲话、文章，大多数都由克里姆林宫网站发表，其他一些俄罗斯国家媒体转载并发表有正面引导效用的相关评论。为保障在国际舆论交锋中赢得主动权，俄主流媒体也充分利用网络新媒体，尤其是社交媒体的快速和超量传播效果，反制美西方在网络上的反俄舆论及种种虚假信息，大力传播俄在重大问题上

[1] Елена Егорова, “Лидеры постсоветских республик испугались использовать слова «военная операция»,” Московский Комсомолец, February 25, 2022, <https://www.mk.ru/politics/2022/02/25/lidery-postsovetских-respublik-ispugalis-ispolzovat-slova-voennaya-operaciya.html>.

[2] Геворг Мирзаян, “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политике настает эпоха попутчиков,” Взгляд.

[3] Юрий Зинин, “Европа и расплата за авантюру США на Украине,” Новое Восточ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

的观点和主张。其舆论造势的重点之一是在网络平台上以受害者身份争取更多的国际同情与理解，如在 TikTok 平台上集中发布以“俄罗斯的命也是命”为标签的批量视频等。^[1]

三、从美西方与俄主流媒体的较量看国际舆论场趋向

美西方国家与俄罗斯主流媒体在乌克兰危机场景下的交锋，展现了国际舆论场博弈的新趋向。这些新趋向预示了国际舆论场的新变局。

（一）美西方及其主流媒体在国际舆论场仍将长期拥有实力优势

俄开展对乌“特别军事行动”以后，参与对俄制裁的国家占全球 1/4 左右，主要是美西方国家，多数非西方国家并未参与对俄制裁。在美西方对俄舆论战中，非西方国家大多持观望态度。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一些非西方国家在联合国投票支持谴责俄，并不反映其真实立场，而是为情势及美西方舆论压力所迫。俄在这场舆论战中虽然攻守交替，甚至设置了不少独立议程，如：谴责“亚速营”在顿巴斯奉行新纳粹主义、搞“种族灭绝”；谴责乌有意开发核武器、准备对顿巴斯地区搞“先发制人”进攻；披露美在乌进行生物战实验、以乌军人做试验品等，但国际上应者寥寥。^[2]

美西方及其主流媒体之所以在这场舆论战中享有一定优势，一是有数十个美西方国家及其主流媒体相互呼应的数量和规模优势；二是财力雄厚，其总人口虽仅及全球八分之一左右，但其经济总量仍占全球一半左右，有足够的财力支持其传媒业发展及支持对俄舆论战；三是其传媒产业历经数百年发展，有进行国际舆论战的丰富经验；四是率先开发、应用各类新媒体及网络技术，如多媒体、全媒体、融媒体等，享有网络、平台和技术优势。未来一

[1] Sarah E. Needleman and Deepa Seetharaman, “TikTok Influencers Get Spotlight in Information Battle over the Russia-Ukraine Wa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March 13, 2022, <https://www.wsj.com/articles/tiktok-influencers-get-spotlight-in-information-battle-over-the-russia-ukraine-war-11647185447>.

[2] Jonathan Freedland, “Putin still Has Friends in the West – and They’re Gaining Ground.”

代人甚至更长一个历史时段，美西方国家及其主流媒体仍将保持在国际舆论场的综合实力优势。这意味着在未来国际舆论较量中，美西方仍将拥有较强的主动权和攻击力。

（二）舆论战在“混合战争”中的功能将继续增强

所谓“混合战争”，是指在战争过程中，军事对抗手段与经济战、金融战、舆论战等非军事对抗手段混合使用，互为补充，其中非军事对抗的场景不断增多、作用不断增大。^[1]乌克兰危机具有典型的“混合战争”特点，双方在进行军事对抗的同时，也全面开展了各类非军事对抗，其中舆论战的作用显著增大。小约瑟夫·奈也认为，在乌克兰危机中，舆论战发挥了重要作用。^[2]在21世纪，由于军事技术进步及武器的超强毁灭性、国家间相互依存不断增强、人们对高质量生活水平及水电能源等相关条件的高度依赖、对痛苦承受力的明显下降以及观念上的变化等，使得类似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的超大规模实体战争很难重演，未来战争将更多地采用“混合战争”模式，战争结局不仅取决于谁的军队获胜，还取决于“谁的故事获胜”。^[3]据此，总结和深入分析俄罗斯及其主流媒体在乌克兰危机场景下与美西方国家及其主流媒体进行舆论较量的经验与教训，从中寻求教益，无疑有助于广大非西方国家在未来“混合战争”场景中争取国际舆论战先机。

（三）高新传媒技术在国际舆论战中的作用明显增大

在美西方国家及其主流媒体开展的对俄舆论战中，除这些国家的主要报刊及其网站外，脸书、推特、优兔等美西方操控的网络平台，马斯克公司提供的“星链”技术等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以“电报”通讯软件为例，其在对俄舆论战中异军突起，担当了最活跃的角色。^[4]该软件“几乎没有内容审核

[1] Joseph S. Nye, Jr., “Eight Lessons from the Ukraine War.”

[2] *Ibid.*

[3] *Ibid.*

[4] 数据来自国际统计网站 Statista, “Number of Telegram App Downloads Worldwide from January to August 2022, by Country,”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1336855/telegram-downloads-by-country/>。

及算法推送，并在架构上允许无限的群组”，可向数以百万计的、没有选择权的“粉丝”释放信息。美外交政策研究所专门研究虚假信息的研究员克林特·沃茨评论说，“在这里，你能在一定程度上看到正在发生什么，以及战斗如何发展。谁能在‘电报’上维持他们的信息战，谁就最可能影响世界对乌克兰局势的看法。”^[1] 对于广大非西方国家而言，要在未来“混合战争”场景下的国际舆论战中立于不败之地，就要采取积极举措，主动适应高新传媒技术。目前包含社交媒体、短视频、全媒体、融媒体等在内的新媒体技术及形式在信息传播中的作用不断增强，未来可能出现以云计算、AI（人工智能）、VR（虚拟实境）等技术为引导的新趋势，广大非西方国家更应未雨绸缪，思考如何应对美西方国家及其媒体在这方面的先发优势。

（四）虚假信息可能大量出现、传播并产生战略性后果

在以社交媒体、短视频、全媒体、融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体技术大发展的新条件下，在国际舆论场如何识别及应对虚假信息已上升到战略高度，成为国际战略问题。中国古人向以“清者自清”教育人们坦然面对恶意攻击、诬蔑等。然而，在国际舆论战中，面对各种污名化、妖魔化宣传及各类虚假信息，“清者自清”这一消极姿态无异于自我解除武装。较之节奏较慢的报刊、印刷品等传统媒体，新媒体技术具有覆盖面极广、传播速度极快、传播量极大的特征。对受众而言，短期内受到超大规模的快速舆论“轰炸”极可能改变其心态、认知，颠覆事实真相，扭曲事件进程。由于现代社会节奏加快，一场战争可能几个月、几个星期甚至仅仅几天内就结束。即使人们事后明白了真相，但事件进程甚至战争进程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被扭曲。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传播节奏加快和虚假信息盛行造成的所谓“后真相时代”。^[2] 俄罗斯在乌克兰危机场景下的国际舆论战中针对美西方及其主流媒体铺天盖地的虚假信息宣传，主要以塑造、传播“新标签”方式应对，起到了一定的反制作用，但很难从根本上消除大

[1] Vera Bergengruen, “How Telegram Became the Digital Battlefield in the Russia-Ukraine War,” Time, March 21, 2022, <https://time.com/6158437/telegram-russia-ukraine-information-war/>.

[2] 赫克托·麦克唐纳：《后真相时代》，刘清山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9年版，第1页。

量虚假信息传播造成的危害。在未来的国际舆论战中，各种谎言、阴谋论、假新闻等大量涌现，且传播速度加快、覆盖面极广，不会给受攻击方任何“清者自清”的时间和机会。面对铺天盖地的虚假信息及其由新媒体技术引发的传播规模和速度变化，不但需要采取坚定灵活的反击战术，还需要掌握与先进传媒技术相适应、科学性与灵活性兼备的新传播手段。

四、结语

在乌克兰危机期间，美西方对舆论战的重视程度达到新的高度。为了抢占国际舆论制高点，打击俄斗志，破坏俄坚持斗争的政治社会基础，美西方及其主流媒体竭力利用自身掌握的国际传播技术、装备、资金、平台及人力资源，施行“狼群战术”，对俄进行舆论“围殴”，甚至不惜背弃其一向自我标榜的客观、独立、公正等“新闻专业主义”规范，炮制、传播大量虚假信息，不断对俄“强化沮丧、幻灭、挑拨离间”。^[1]俄罗斯及其主流媒体则配合其军事战，在国际舆论场上以寡敌众，以牙还牙。美西方与俄之间在这场“混合战争”中的舆论交锋空前激烈，极具战略性，也极具“生存竞争”性质，堪称开辟了军事战之外的“第二战场”。

未来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美西方国家为阻止其衰落进程、阻击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国家的和平发展进程，也为维护其世界霸权及其相对于非西方国家的军事、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优越感，必然要进行“最后的挣扎”。此次乌克兰危机场景下的美西方与俄舆论战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非西方国家提供了重要警示与启示。面对美西方及其主流媒体的优势及各种花样翻新的舆论战手法，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非西方国家要做好准备、未雨绸缪，争取立于不败之地。

【责任编辑：肖莹莹】

[1] 赫克托·麦克唐纳：《后真相时代》，第173页。

Abstracts

Implications of the Global Security Initiative for Human Rights

Governance

LIU Qing

The Global Security Initiative (GSI) is essential to China's global security governance in the new era. It manifests the security field in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The GSI extends from military security into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Consistent with the UN principles, the GSI is committed to addressing the root causes of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believing that lasting peace and prosperity can only be achieved by upholding a common, comprehensive, and sustainable security concept.

Core Elements and Approaches of the Global Civilization Initiative

WU Zhicheng

With great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and profound adjustments in globalization, there is more frequent convergence, collision, and even conflict among different civilizations. However, history shows coexistence is the theme of cultural development. Mutual learning is vital for the vitality of all civilizations. China then proposes the Global Civilization Initiative. Countries need to uphold the principles of equality, mutual learning, dialogue, and inclusiveness among civilizations to safeguard the diversity of civilizations.

Politics of Rights: Trans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with Modernity

XU Jian

In a world of chang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s sinking into the moral dilemma of power politics and the power dilemma of moral politics. People have long confused the major difference between pre-modern and mod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former is power politics, and the latter is rights politics.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are increasingly manifested as conflicts of rights, which may be transformed into conflicts of power. Power politics may be hidden under the package of rights. The politics of rights reflects the direction of theoretical breakthroughs in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he Rise of the Global South and the Evolution of World Structure

XU Xiujun & SHEN Chen

In the current context of sluggish global economic growth, the ongoing Ukraine crisis and significantly intensified geopolitical competition among major powers, the Global South has accelerated its all-round rise in terms of economy,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status, showing unprecedented influence, and has become one of the key variables determining the direction of the evolution of world structure. In the process of profound adjustment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world structure, the Global South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as a game player, a balancer and an indicator. The Global South still faces contradictions between excessive external interference and insufficient anti-interference capability, rising demand for capacity integration and lack of institutional platforms, and safeguarding common interests and pursuing diversified preferences. As a natural member of the Global South, China firmly upholds the common interests of

the Global South, actively participates in and leads South-South cooperation, and will continue to provide strong impetus into the 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on of the Global South in the future, and promote the Global South to be a more important force in the future world structure.

Impact of the New Generation 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YU Nanping

The breakthrough of 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 (AGI) technology, represented by ChatGPT, heralds the opening of the AGI era. Unlike the impact of weak AI technology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era of dataism, AGI is no longer a mere tool of empowerment. The human-machine integration will rapidly and deeply embed itself in socio-political and economic fields. It will reshape the mode of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affec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geopolitics through its transformation of national strength. But it also brings new challenges. Recognizing the impact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AGI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s no longer a technological imagination nor a vague technical description. The AGI-driven underlying changes in productivity are bound to produce a disruptive reconfigura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orms, Roots and Implications of Biden's Economic Nationalism

LIU Feitao

Since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took office, its economic and trade policies have inherited the economic nationalism while downplaying Trump's populism. Through institutional strengthening and strategic promotion, the economic nationalist policies

of trade protectionism, industrial protectionism, technological protectionism, and investment protectionism have been systematically expanded. Biden's promotion of economic nationalism is rooted in the ongoing anti-globalization trend in American society, frustration with neoliberalism, concern about the American system's decline, and the need for a new consensus in the United States to promote great power strategic competition. Biden's policy of economic nationalism serves to maintain the hegemony of the United States, but it is precisely because of the narrowness of his economic nationalism that his economic and trade policy will inevitably aggravate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impact the interest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allies, and ultimately damage its hegemonic status.

The Battle for Public Opinion on the Ukraine Crisis and Its Implications

LIN Sixian

Since the outbreak of the Ukraine crisis, the U.S. and the West have worked together and manipulated their mainstream media to launch a public opinion war against Russia on an unprecedented scale. Russia, on the other hand, has counterattacked with them in the international public opinion arena. The two sides are competing to make comprehensive use of new media technology and discourse techniques to combat, discredit, and even smear their opponents to boost their side's morale and seize the moral high ground.